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双月刊·2024年第5期(第35卷)

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任：黄龙杰

副主任：何文钜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鸿 方素梅 刘菊香 许立坤 李小宁 杨保筠 杨绪强
沈桂萍 张淑瑛 张献生 郑好 祝远娟 覃彩銮 谢茂松
廖国一 潘宏纹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

双月刊

(1996年创刊)

第35卷 第5期

2024年10月18日出版

主管、主办单位: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主 编:何文钜

副 主 编:杨绪强

编辑部主任:杨绪强

地 址: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村大道6号

邮政编码:530007

电子信箱:GXSYXB@163.com

访问网址:<http://www.gxsy.org>

电 话:0771-2381657,3891622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033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250/D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人

发 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印刷单位:广西明园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10.00元

目 录

学习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耦合关系的三维探赜

..... 褚尔康,孙 磊(5)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理论基础、作用机理与实践理路

..... 余 慧,刘纯明(13)

特别策划·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人民政协研究

..... 张 山(20)

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形态探究

..... 杨绪强(2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 赵峻敏(34)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逻辑与建构理路——基于“古今中西之争”视角

..... 曹嘉辰,吴文新(41)

统战理论与实践

契合性与启示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战工作耦合探析

..... 孔 聪(48)

政党制度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路径与运行机制

..... 许奕锋,曹 璐(54)

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

..... 方 烨,刘艳云(62)

民族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实践论:鉴往与开来

..... 李富强,吕文涵(69)

南岭走廊民族迁徙互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 颜 洁,赵明龙(76)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
与路径

..... 胡海燕(85)

中华文化与文明互鉴

中华文化符号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 武雯宇,努力曼·依米提(91)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海外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研究——以文莱中华中学华裔新
生代为例

..... 马莉莉(98)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三维探析

..... 姜 敏(107)

本期执行编辑:杨绪强

封面设计:梁新建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Bimonthly

(started in 1996)

Vol.35 No.5

Published on Oct 18th 2024

Administrator and Sponsor: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or and Publishe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Editor-in-Chief: HE Wen-ju
Deputy Editor-in-Chief: YANG Xu-qiang
Editorial Director: YANG Xu-qiang
Add: 6 Xincun Rd. Xixiangtang District.
Nanning.

P.C.: 530007
E-mail: GXSYXB@163.com
URL: <http://www.gxsy.org>
Tel: (0771)2381657, 3891622

ISSN: 1009-0339

CN: 45-1250/D

Distribution Area: P.R.China

Distributo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Printing: Guangxi Mingyuan Fenghuang
Printing Co.Ltd

Price: ¥10.00



英文翻译:陆姝彤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Main Contents

Tr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CHU Er-kang, SUN Lei(5)
Empower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Mechanisms of Ac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YU Hui, LIU Chun-ming(13)
Research on the United Front Theory of Marxism-Leninism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ZHANG Shan(20)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s of Consensus Building within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YANG Xu-qiang(29)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s of Chinese-Path to Modernization	ZHAO Jun-min(34)
Historical Logic and Constructive Pathways of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bate o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China and the West"	CAO Jia-chen, WU Wen-xin(41)
Compatibility and Enlightenment: An Analysis of the Synergy betwee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United Front Work	KONG Cong(48)
Practical Pathway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China's New Part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XU Yi-feng, CAO Lu(54)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s for China's New Party System: Intrinsic Logic,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FANG Ye, LIU Yan-yun(62)
On the Practice of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Guangxi: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LI Fu-qiang, LV Wen-han(69)
Ethnic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Nanling Corridor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YAN Jie, ZHAO Ming-long(76)
Logic and Pathways of Guangxi Universities to Create a Stronger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U Hai-yan(85)
Research on the Shaping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through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WU Wen-yu, NULIMAN Yi-mi-ti(91)
Study on the Chinese Culture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ak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Descent in Brunei Chinese High School as an Example	MA Li-li(98)
Tr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Building a China-Vietna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JIANG Min(107)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耦合关系的三维探赜

褚尔康, 孙磊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2)

摘要: 科技创新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两个耦合性命题联系起来的“纽带”。以科技创新为主线,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在理论维度上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在制度维度上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的实践转换;在路径维度上表现出以科技创新为中枢的领导体制、资源配置、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的完善方向。以上三个维度呈现出一条逻辑链条,即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科技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能。

关键词: 新型举国体制;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01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05-08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1]在新型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创新主体、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环境的任务,上升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要求的背景下,学界对于新型举国体制的讨论颇为热烈,特别是在围绕新型举国体制的生成逻辑、核心概念和时代价值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究,为将新型

举国体制与新质生产力这两个关联性命题的结合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从理论、制度和实践等三个维度探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的耦合关系,以期为推动新型举国体制和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马克思主义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决定了社会关系的耦合。当生产力达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会因生产力的发展或“桎梏”而不断更新。生产力与生产

收稿日期:2024-07-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3FZZB008)。

作者简介:褚尔康,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治理理论;孙磊,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新中国科技史。

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为从本质上认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的耦合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一定的社会形态呼唤新的生产力的出现

马克思从生产力出发分析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社会形态作为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的辩证运动逐步被推动。在这一过程中,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之间本身就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即生产力决定社会形态的进程,一定的社会形态呼唤新的生产力的出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定的社会形态”并没有涉及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从某一低级形态到某一高级形态的演进,在一个社会形态的某个阶段内部仍然存在以量变性为特征的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这也佐证了马克思“两个绝不会”论断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即是说,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一个阶段。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成就和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新历史方位的最突出标注和现实依据。以科技领域为例,科技创新实践的进步和一定科技成就的达成呼唤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球组网、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在轨运行、“墨子号”实现量子通信、“天眼”FAST落成运行、“永磁高铁”通过运行实验考核、“天机芯”芯片研制成功、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一大批科研技术实现成果转化和应用。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标志,科技成果的取得是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最直接、最显著的体现,科技成果的转化也最能表现出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动态的、内部的互动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2]技术革命性突破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和突出表征,上述科技成果都是技术创新和技术突破的结果,一些是从无到有的技术跃进性变革,一些是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渐进式创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表现为以往的偏向要素和投资规模驱动转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具体而言,创新驱动是人才和科技驱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相较于传统产业而言的,以突出数智、绿色等新技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广泛应用为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科学技术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科技要转化为物质的、现实的生产力,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同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为内容的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社会形态下科技进步带来的落后生产力向先进生产力的转化,且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前,在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命题提出的其中一条理论逻辑便是新时代科技创新实践呼唤新的生产力产生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3]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表现在众多方面,这里以科技领域为视角对社会形态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进行梳理,在于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新质生产力需要新型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马克思认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4];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5]。列宁进一步指出,为了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要“把社

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而且应“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⁹,即著名的“两个归结”思想。简言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且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决定作用下,生产关系的总和凝结成了经济基础,作为构筑社会基础框架的经济基础为观念上的上层建筑提供了现实基础。上层建筑的根基依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上,当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发展和变化时,上层建筑也必然会或快或慢地随之改变。此时,变革以经济基础为根基的上层建筑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型举国体制是制度、体制、机制以及三者之间关系基础上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属于生产关系的认识范畴。具体而言,举国体制的运行机理和工作体系是组织和集中国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和各种资源及要素以实现某一个战略任务或目标。其独特表征可以概括为在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方面实现对科技生产关系和科技上层建筑的调整,以创新基础之上的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达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在于“新型”,相较于传统举国体制,在体制环境、资源配置、目标导向上展现出巨大的创新及创新带来的组织和运行优势。在资源配置上,新型举国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依靠政府组织协调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强调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也要重视政府作用的高效发挥,即“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在目标导向上,新型举国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即“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领域,“以体制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¹⁰。新型举国体制强调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之下的目标选择,也就是国家最需要什么,新型举国体制就服务于什么;国家需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就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新型举国体制的提出展现出了一个体制机制健全完善的动态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国体制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和作用上呈现出多种形式的变迁,从农业、国防等举国体制的实践到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实施,再到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的转变,在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愈加具体的同时,其应用场景框定在科技工作领域的方向也愈加明确。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过程本质上是新型举国体制动态完善过程的映射,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对创新要素的合理整合、对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各要素系统性的调整和适应。这里不仅是简单地将制度归结于生产关系的认识范畴,更是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放在一个动态的、渐进的、系统的考察过程中,并与伴随生产力进步而不断变化的生产关系对应,从而在本质上认识新型举国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本质上是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¹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的结合下的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本质上的研究视域和基本的方法论原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与上同理,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形成决定了新型生产关系的产生,新型生产关系要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方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在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于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但归根结底要服务于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变革生产关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3]

二、制度维度:新型举国体制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能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十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明确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为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制度优越性的维度下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

新型举国体制的属性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即动员、调配国家一切力量为完成某一目标服务,其在我国最早的实践可追溯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重要思想上。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不同时期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而不断丰富和扩展。时至今日,关于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体系正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被逐步构建。在计划经济时代,以举国之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推动“两弹一星”工程、构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都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但“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9]。新型举国体制在制度安排层面对传统举国体制展现出了传承性、超越性和先进性。以创新主体为例,新型举国体制强调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和多元元素参与的“协同”:企业是创新主体,政府居主导地

位,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是重要的创新源,在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下实现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价值链嵌合与功能性互补。根据《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三大R&D活动执行主体的经费分别为23 878.6亿元、3 814.4亿元和2 412.4亿元,其中企业对R&D经费增长的贡献达到84.0%^[10],这说明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主体地位。新型举国体制对传统举国体制的继承和超越有基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深层次的制度层面的根源。换言之,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上的决定地位的变化决定了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的转变,即传统举国体制对应计划经济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则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外,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所反映的不仅是这一制度本身的变革,也是作为支撑和保障作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制安排,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下,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叠加对创新秩序和创新板块带来巨大震荡。以三次工业革命与国家实力的关系为考察,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18世纪成为世界强国;美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19世纪末至今都位居世界第一。反观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错过了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表现为先进技术与经济、社会、军事和国防等方面的严重“脱钩”。显然,能否通过科技创新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事关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大计。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任务就是在制度设计和考量的层面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行合理安排。所谓关键核心技术,主要包括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的基础技术、通用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先进工艺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涉及精密电子生产、军事国防、航天科技、医疗健康等众多关系我国安全与发展的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11]从新型举国体制以解决“卡脖子”难题作为问题导向和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为目标需求的视域下考察制度与时俱进的完善过程是从微观、局部、特殊的部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过程也是动态的实践过程。

习近平在谈到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时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12]“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新型举国体制的运行机理和工作策略,也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优势的重要法宝。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为参照,我国的一些桥梁大坝、高铁等基建项目能够高效完成得益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制度能够合理高效利用资源和统筹调度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社会主义制度在以往实践中表现出的制度亮点最能说明自身的优越性,也为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经验。同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在制度效能转化为治理效能路径上的发力逻辑就是调动一切创新主体,合理利用创新资源、配置优良创新环境,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核心理念,通过科技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以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新的治理效能。

(二)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以往“高速增长”的提升,是同时兼顾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的发展质态。“高质量发展”的表述最先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3]。习近平强调:“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14]这不仅映射出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更是将高质量发展摆在了强国建设和

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高质量发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把握新发展阶段特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一脉相承、互促共生。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表现出前者到后者的理论进路。首先,科技创新在二者中的“联结”。一方面,科技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劳动资料为视角,科技进步首先带来的是产业的转型升级,而产业的转型升级本身就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物质载体。科技创新对于生产力的强大推力体现在物质生产的方方面面。诚如列宁所说,技术进步是“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15]。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之一。例如,在高质量发展中所呈现的以量子通信、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为标志的新产业都离不开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发展的质量高低。其次,绿色发展在二者中的“联结”。“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6]人与自然的统一是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理论命题的逻辑前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旨归。从本质上理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本身就是一场绿色的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一大突出特征就是要降低能源和资源的损耗,科技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趋势与绿色发展的总体走向是并行不悖的,并且最终都要落到“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这一基础理念上。最后,人才与教育在二者中的“联结”。2012年,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这是最有竞争力的。”^{[16]107}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人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最终要落实到人,科技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力。人才、教育、科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不可分割、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有机统一体。在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条逻辑链条上,科技创新是根本驱动力,绿色发展是方向性要求,人才和教育是动力性保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方向。正如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3]

综上所述,对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制度上结合点的梳理结果是,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创新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更为优良的创新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新产业、新模式、新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人才和教育方面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耦合性。其中,科技创新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将新型举国体制、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三个命题联系起来的纽带。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科技创新是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科技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最终都要回到“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上,这也为上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认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关系提供了佐证。

三、路径维度: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一)资源配置: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经济体制基础,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问题的前提。首先,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一结构为新型举国体制在把握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各种经济活动关系、促进科技生产要素的组合与畅通、提升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

效率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新型举国体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源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新型举国体制的“调动一切创新主体”源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新型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其次,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上形成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不仅依靠“政府干预”的资源配置强度,更要注重“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效力。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当“市场创新力”失灵时,“政府强制力”要及时补充,二者相辅相成。科技是创新的核心,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必然要求。最后,在市场规模及资源配置上,要注重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双循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并不矛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国际科技竞争可以转变为市场规模超大规模的竞争优势,从而赋能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创新资源的利用、创新要素的组合、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体系构建: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生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中国特色创新生态的属性是“生态”,关键在于“创新”,具体表现为以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创新资源和政策、市场、文化等创新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生态,首先要联通各类市场经济主体角色之上的科技创新主体,形成政府、生产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应用与用户等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上的集成与耦合:创新平台的共建、创新技术的共商、创新服务的共享、创新风险的共担等。“政产学研用”在优势互补中系统发展,其中生产企业是创新主体,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人财物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创新成果更快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6]70}。其次要高效整合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创新资源。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生态不仅是对人才、资金等投入和其他创新资源的简单利用,而是要更加注重技术、信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协同效能,寻找众多创新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机理。最后,建设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环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重视创新、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形成良好创新生态,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中国特色创新生态之“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就是走中国特色创新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既不是把“自主”理解为关起门来与外界断绝联系,也不是完全的开放,而是“要搞清楚哪些是可以引进但必须安全可控的,哪些是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哪些是可以同别人合作开发的,哪些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的”^[1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动员力、组织力和执行力的优势下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要聚焦于破除关键核心技术壁垒和解决“卡脖子”难题,以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三)产业创新: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现形式和重要载体。现代化产业在诸如劳动者、劳动工具、技术水平、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表现出对传统产业的迭代升级。具体到科技创新的形式和过程,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算力算法等新型技术为标志的现代化产业随着科技创新范式的转变推动并重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一是推动新型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加快推进数智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等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产业的新型技术含量,在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中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二是依靠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基础研究和关键核

心技术。科技创新的源头在基础研究,加强基础研究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一个新产业的产生往往是从一类基础研究的突破开始的,要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以基础研究的创新突破支撑和赋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三是推进绿色产业创新发展。可持续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应有之义,“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9]。所谓绿色产业创新发展,不仅包括对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进行绿色产业改造和升级,还应注重绿色产品开发、绿色产业园区建设、绿色供应链打造等一整套绿色与现代化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四)问题导向:瞄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表现为关键核心技术驱动下的数字生产力、蓝色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的产生、应用及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的驱动是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当前,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点就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这也是我国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现实之需。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特别是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16]44},要根据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加快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例如,支持重点学科发展、培育新兴学科发展,推动包括跨学科研究在内的学科交叉融合,加快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创新中心、科学中心等创新平台。另一方面,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并重,注重关键核心技术的成果转化。技术成果转化同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实现人才储备、资金投入、技术设备更新等具体创新要素的升级,更需要“政产学研用”等创新主体参与的“研究—产业”的高效联通,即一条完整创新链条的形成不能忽略创新成果的应用。处在应用层面的技术转化不仅仅是简单地被归结于创新的一方面,更涉及其作为创新链末端的技术应用效果对技术研究与实践创新的推动作用,即

以技术应用推动技术创新的问题导向。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2]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中央财办最新解读[EB/OL].(2023-12-18)[2024-03-28].<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1218/c1004-40141533.html>.
- [3]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1.
- [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 [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EB/OL].(2021-12-24)[2024-03-28].https://www.ndrc.gov.cn/fggz/fzllgh/gjzgh/202112/t20211224_1309258.html.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17.
- [10]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龙解读《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2023-09-18)[2024-03-28].https://www.stats.gov.cn/sj/sjd/202309/t20230918_1942919.html.
- [11]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
- [1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N].人民日报,2022-

09-07(1).

-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8.
- [14]习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4(2).
- [15]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0.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11.

责任编辑:祝远娟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理论基础、作用机理与实践理路

余慧,刘纯明

(重庆理工大学,重庆400054)

摘要: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赋能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能够在政治层面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在经济层面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在文化层面推进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在生态层面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新时代新征程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要从科技赋能、信息共享、生态引领和人才保障等四个方面着力,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打破地域隔阂与资源限制,推进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理论基础;作用机理;实践理路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02

[中图分类号]F323;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13-07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2]。对乡村振兴的推进机理进行再审视,深刻研判乡村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更具创新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对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乡村产业资源合理配置、乡村产业体系协同完整和乡村产业链提质增效都起着重要驱动功能^[4]。基于此,本文通过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进而提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理路,以资借鉴。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经

收稿日期:2024-07-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DJ026)。

作者简介:余慧,女,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质生产力;刘纯明,男,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史党建、新质生产力。

典理论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凝练。

(一)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5]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推动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一方面,“农为邦本”“以农为本”等思想观念。《尚书·五子之歌》提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只有农业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定。农业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重视和发展农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当前,乡村振兴作为不断完善农业产业链、培育农业产业新业态、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的重要战略举措,肩负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的引领作用,将推动新质生产力向农业农村领域延伸,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国。另一方面,“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不仅体现了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深刻理解,还指导着人们如何以一种和谐的方式与自然共处。新质生产力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能够有效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增强绿色产业创新的动力,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生态低碳农业的农产品生产功能,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具有绿色发展理念的高素质农民及专业经营主体等新要素。

(二)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具有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生产力理论和城乡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理论渊源。从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来看,新质生产力赋能乡

村振兴所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立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是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乡村振兴作为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足的、提升农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战略举措,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的吸收、继承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来看,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中的“新质生产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生产力有助于构建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7]这揭示了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的新质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将产生的必然影响,意味着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先进生产力”,能对构建更先进的社会发展形态起到重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来看,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振兴”,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出,城乡关系能否由对立走向融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8]185},所谓城乡对立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8]308},需要通过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来实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作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所具有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功能,能够有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

(三)经验凝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把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壮大革命根据地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促进农业生产等措施重塑了乡村秩序。无论是井冈山根据地所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还是1929年赣南闽西根据地所形成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减租减息政策和大生产运动,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以及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兴修农田水利。1952年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当时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成为土地的主人和独立的个体经营者。这一系列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相关举措,令这一时期的农村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的农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积极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大量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大量流向城市。为此,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国家全面发展战略构想中的“五个统筹”的首位,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建设“三大部署”等发展乡村产业经济重要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工作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顾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农村政策,积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带领亿万农民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之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新时代新征程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推进乡村工作,充分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把握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是科学探索其实践理路的必要前提。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综合分析,系统把握新

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一)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9]。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要发挥新质生产力对提高农村社会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促进作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乡村治理方式创新。在个别地方,传统乡村治理方式还存在难以满足群众充分参与村民事务治理需求等情况。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使得乡村治理方式更加注重市场化、法治化和社会化。譬如,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能够有效激发农民的产权意识,促进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可以为乡村治理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可以丰富乡村治理手段。当前,我国的乡村治理还存在政民联通碎片化、服务供给碎片化和事务管理碎片化等亟需解决的难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为创新乡村治理手段带来新机遇。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各基层治理单位能够逐步实现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乡村治理的感知智能化、治理过程数字化、服务智慧化等,从而提高乡村治理的协同性和精准性。

(二)优化和调整乡村产业结构

乡村产业结构作为乡村生产系统中各产业部门的组合构成,是乡村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4月,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着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10]。优化和调整乡村产业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优化和调整乡村产业结构的积极作用,有效赋能乡村振兴。

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乡村传统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增强乡村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催生新的乡村产业和业态,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 market 需求的不断变化,乡村旅游、农村电子商务、智能农业等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新兴产业和业态逐渐涌现,这不仅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也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此外,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乡村发展还能够实现生产过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增长方式集约化、经营循环市场化、生产绩效高优化等重要转变,实现农村传统生产方式、交易流通方式和融资方式的革新,并催生以高质量、低消耗、高效益为特征的相关新兴生产业态。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和协同效应。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还存在传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乡村产业体系发展滞后、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等障碍性因素。产业融合发展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可以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和互动发展,实现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还可以推动农村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加快乡村产业振兴步伐。

(三)推进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14]。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要发挥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积极作用,从文化层面赋能乡村振兴。

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传承和发展两个方面。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和保护。当前,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发展并在各领域广泛应用,为挖掘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带来了新机遇。通过数字化技术对乡村古籍、民间技术和传统手工业等进行数字化保

存、对乡村文物古迹和历史遗产进行全息拟态处理,能够将诸多铭刻于青铜器、誊录于丝帛、书写于简牍上的文化形态转化为数字形态,使其得以永久传承。从发展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乡村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还为乡村文化创新提供了条件和平台。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和特色旅游业、特色农业的融合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乡土味、彰显地域特色、做强产业链,而这些融合大多需要借助数字技术来实现。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下,广泛引入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能够更好地实现乡土特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文化事业与乡村产业的互利共赢。

(四)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

习近平指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15]优良的生态环境、生产环境和人居环境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基本条件,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现实要求。新质生产力基于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的新生产力观,具有绿色低碳等属性,其在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能够有效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新质生产力在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提高乡村资源利用效率。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具有生产效率更高、技术优势更突出等显著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生产过程中,应用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技术,能够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智能制造技术,可以优化生产流程,推动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实现废物资源化,从而提高乡村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乡村生态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关注度的不断提高,生态服务业在乡村地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提出:“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13]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乡村生态旅游、有机农产品销售等将实现提质升级,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并推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理路

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理可知,新质生产力能够赋能乡村振兴。新时代新征程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可从科技赋能、信息共享、生态引领、人才保障等四个方面着力。

(一)科技赋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1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科技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9]。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扮演着主导作用。

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等先进科学技术的赋能下,农业生产能够实现智能化、精细化和高效化的重要突破,进而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与质量。一方面,可以利用科技推进乡村“精准农业”的发展。作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根据空间变异,定位、定时、定量地实施一整套现代化农事操作与管理的系统,精准农业是科技赋能农业的典型应用,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实现优质、高产、低耗和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农业。2018年9月,习近平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时,特地参观了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体现了对精准农业的高度重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可以利用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监测农田环境参数、土壤养分含量等信息,再利用大数据平台等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对农业生产开展精确施肥、精确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等工作。这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精确监测和管理,而且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支持,进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科技推进乡村“农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指的是先进的信

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种发展模式。它不仅能够优化乡村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产品质量,还能够推进农业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率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15]。这进一步明确了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的突出重要性。要充分利用农业信息化这一高效的信息化平台,通过农业物联网实现信息的实时传输和共享,通过农业大数据揭示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规律,通过农业电子政务实现农业管理部门的政务信息化和便捷化,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农产品的线上交易和物流配送,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中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二)信息共享:打破地域隔阂与资源限制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其中,信息共享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够促进信息的流通,加强各部门、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协作,打破地域隔阂与资源限制,是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方式为信息共享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持,并为乡村信息的共享和流通带来更多可能性。

最大程度地发挥信息共享对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要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乡村旅游人次从近8亿跃升到30亿,年均增速超过20%,乡村旅游已成长为万亿级收入规模的新兴产业。2024年‘五一’假期,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1.72亿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收入518.17亿元,分别同比增加8.9%和12.3%。”^[15]通过搭建乡村旅游信息服务平台、发布乡村旅游攻略、景点介绍、住宿餐饮等信息共享平台,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乡村的旅游景点、民俗文化和特色美食等,吸引游客深度体验,从而激发乡村经济活力。二要优化农产品产销对接。农产品产销对接是促进农产品供需平衡、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

品供给质量、增加农民收益的重要途径。在传统的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农产品“卖难买贵”、供给质量和效率低等难点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如何优化产业链、畅通新销路成了一大难题。通过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实现信息共享,农民能够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和价格信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从而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三要推动农村电商发展。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农村电商也迎来了新机遇。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超过3亿人,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2.17万亿元;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313.8亿元^[16]。可见,农村电商的不断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新引擎。

(三)生态引领:推进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生态环境关系乡村居民的民生福祉、关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结合点。习近平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7]这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意蕴和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属性。由此,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属性,充分发挥其生态引领作用,能够有效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在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能够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其一,要加强宣传教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必须充分认识到乡村居民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主体力量。开展针对乡村居民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有利于正确引导广大乡村居民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开展环保知识讲座、制作宣传资料、举办环保活动等方式,让乡村居民了解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在生产活动中参与度。其二,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18]。要采取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以

及加强对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等举措,加快建设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其三,要保护和修复乡村生态系统。乡村是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保护和修复乡村生态环境、构建可持续的乡村生态系统能够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要持续加强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维护和提升乡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

(四)人才保障: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

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19]。当前,我国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着乡村人才规模总量不足、乡村人才供求矛盾突出、专业队伍欠缺、乡村人才“引育用留”机制运转不畅等问题,这使得乡村人才振兴成为我国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任务。2024年3月,李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培养用好乡村人才”^[20]。基于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特征,做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可以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做好新时代乡村人才工作,需要在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四方面下功夫,全链条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各类人才在乡村沃土汇聚扎根。”^[21]从“引才”角度来看,要加强对乡村人才的引进工作。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大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招才引智力度,通过实施“乡村人才回流计划”“三支一扶”“西部志愿者”“特岗教师”计划等方式促进人才向农村地区和乡村一线流动,从源头上为乡村振兴提供长效人才支撑,为乡村建设持续赋能。从“育才”角度来看,要稳妥有序开展人才培育工作。高效的乡村人才培养工作能够不断提升乡村人才队伍综合素质。各级党组织可以通过打造乡村人才学习平台、搭建农业产业与教育合作平台,探索“产业+市场”的本地化人才培养路径等方式,促进乡村人才培训服务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乡土人才的综合素质。从“留才”角度看,要积极改善乡村的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改善交通、通信、水利等条

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以吸引人才;要重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资源配置,提升乡村生活质量,解决人才及其家庭的后顾之忧。从“用才”角度看,要促进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用得其所。用好乡村人才,是最大程度发挥乡村人才效益、实现乡村人才价值,进而高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要坚持“因事择人、因材施教”的原则,完善人才发挥机制以及搭建干事创业平台等举措,根据不同阶段人才的实际情 况实施动态管理和跟踪服务、为各类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让乡村人才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及时完善和 提升自我,从而形成具有乡村振兴特色的人才优势。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2]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求是,2019(11).
- [3]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09-09(1).
- [4]张志飞.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功能作用、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
- [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强调 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N].人民日报,2014-09-25(1).
- [6]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9.
- [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5.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
- [10]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8-04-29(1).
- [11]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求是,2024(8).
- [12]习近平同志《论“三农”工作》主要篇目介绍[N].人民日报,2022-06-07(2).
- [1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17-02-06(1).
- [14]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2022(1).
- [15]王珂.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文化中国行)[N].人民日报,2024-05-19(2).
- [16]陈晴.农村网民超 3 亿人 农村电商迎来新机遇[N].中国商报,2023-09-14(4).
- [17]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
- [18]农业农村部等 6 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EB/OL].(2021-09-08)[2024-05-21].http://www.moa.gov.cn/jg/leaders/lingdhd/202109/t20210908_6376011.htm.
- [19]习近平.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J].求是,2021(24).
- [20]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四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24-03-13(1).
- [21]毛维娜,曾凡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N].科技日报,2024-01-15(8).

责任编辑:祝远娟

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人民政协研究

张 山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400)

摘 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及其劳动人民谋解放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建立中国人民政协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人民政协的理论基石。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为指导,科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及其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关键词: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政协制度;人民政协理论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03

[中图分类号]D613;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20-09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及其劳动人民谋解放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着重阐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并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实现与其他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最高文明形态的远大目标。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1]。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人民政协理论是“源”与“流”的关系,创新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深化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

设,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寻找理论依据和力量源泉。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人民政协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战略策略,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的重要条件;要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必须加强团结;要发展壮大统一战线,必须争取和团结非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和带领广大工农群众、各族各界人士以及海外同胞共同建立的统一战

收稿日期:2024-09-25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特别委托项目(GD23WTB0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重大项目(GD23ZD15)、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2023年跨年度课题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山,男,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部主任、《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省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基地专家,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政协理论。

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创造,其建立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一)要完成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必须组织和领导统一战线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问世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于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同盟的纲领,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解放斗争的胜利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对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做了这样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公社瓦解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阶段上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为要摆脱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0]毛泽东在1950年3月接见参加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部分同志时把上述思想进一步概括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21],并指出这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这一命题深刻地解释了统一战线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要完成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必须组织和领导统一战线,组织起胜利的合唱,否则就会成为孤鸿的哀鸣,要胜利是不可能的。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必然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共产党宣言》发出了“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22]。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针对东方各民族、国家被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事实,提出东方受压迫民族、国家要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必须建

立联合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之后,列宁又提出了要尽最大努力联合同盟军、建立与非党的联盟、实行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重要原则,并以之指导中国革命。1920年9月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是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系列文件后直接领导东方革命的一次具体行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首次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4]。显然,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既保持了连续性,又结合俄国和东方国家革命的实际情况实现了新的发展。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经历了从排斥与别的党派合作到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并最终建立民主战线、实现国共合作的过程。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改变了中共一大纲领和决议作出的不与其他党派有任何联系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5]。1923年初,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并取得胜利,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并在8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明确提出“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的统一战线策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24年1月,国共合作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为标志正式建立。

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到列宁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再到中国共产党推动“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丰富和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内涵。在中国,“国民革命者”不仅包括无产者,

也包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有产者。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中国人民逐步从一盘散沙走向众志成城,汇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必须实现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

实现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总是力图分裂无产阶级,总是联合起来对付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分散的斗争只会导致共同的失败,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宣言》强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主要条件之一。”^[24]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实现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没有能够建立起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没有得到巴黎以外的农民的支持。他认为,农民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和领导者,而无产阶级如果能把农民争取过来,“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25]。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建立第三国际和帮助各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过程中,比较全面地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联合工农的思想,并且首次提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概念。1921年12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和关于对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人以及对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提纲(“十二月提纲”),明确提出“工人统一战线,应该理解为一切愿意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的统一”^[26]。在这里,列宁讲的工人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的问题。列宁这样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这一科学概念,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增添了一块基石。同时,列宁深刻地阐发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指出必须“弄清楚从我国整个革命

和一切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中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而“整个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问题”^[28]。列宁关于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根本问题的论断,直接来源于对俄国社会矛盾的实证性分析。在俄国,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是革命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无产阶级只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俄国,农民只有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撼动封建统治制度。因此,只有与农民建立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才能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十分清醒。他说:“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得到一部分最先进最觉悟的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29]如何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呢?列宁认为,应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生产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同农民交换,建立同农民的经济合作,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建立合作社,奖励参加合作社的农民。他强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30]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争取农民这一天然同盟军以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思想,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始终坚持把“工农联盟”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工农联盟,革命政权才有坚实根基。因此,中国共产党依靠工人和农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革命力量不断巩固和壮大。

(三)要发展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必须争取和团结非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团结非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是统一战线的又一基本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要取得最终胜利,在实现无产阶级内部团结的同时,还必须争取和团结非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如何争取和团

结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如何处理与同盟军的关系等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要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进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城市中的重要力量,在城市居民中拥有广泛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所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12]“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应与进步的资产阶级联合共同抵抗封建势力,共同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指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基本上有三种根本的主要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4]。他认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首先取决于小生产者的政治行动。”^[15]只有当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和平和自由的事业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顺利、和平、迅速、平静地获得胜利”^[16]。列宁把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提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其重要问题的高度,因为小资产阶级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既有作为劳动者的一面,又有作为私有者的一面。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在是否支持革命的问题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劳动者,深受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欺压和剥削,不少小资产阶级也因此最终沦为无产阶级,因而他们有革命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私有财产的占有者,他们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往往把资产阶级当作自己的努力方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资产阶级,因而其革命性是不够彻底的,常常

在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缺乏独立的阶级立场。事实上,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小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长期受资产阶级的打压,最终会沦为无产阶级。因此,小资产阶级最终会丢掉幻想,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得到自身真正的解放,这使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可能。所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联合小资产阶级。他指出:“我们不会远远地离开广大的小资产者群众,劳动群众,因为他们能够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不幻想妥协,不迷恋于小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巩固,不放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15]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团结非无产阶级、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决定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并最终以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团结非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得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继续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载体,建立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复存在,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非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理论发展成为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范围的联盟,即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创新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政协制度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团结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了胜利后的形势,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政协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人民政协的建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政治创造

中国共产党在提出统一战线策略之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逐渐赢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族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1948年4月30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6]。这一主张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关于尽最大努力联合同盟军、建立与非党的联盟、实行多党合作等原则,集中反映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和平建国的心声,因而迅速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力合作,共同协商筹备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标志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胜利。正如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的,“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7]。周恩来于1949年9月7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大革命运动,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和最近三年来的人

民解放战争,才形成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组织,可以说这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也可以说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体表现。”^[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所主张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建立之初就实行“大团结、大统一、囊括一切代表人物”的方针,极大地团结了一切积极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夺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同年12月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了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此后,人民政协为巩固和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推动下,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出席会议代表的构成来看,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中国各个革命政党和各族的大团结。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解放军、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共622名,代表的构成具有广泛性,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非无产阶级理论变为中国的现实实践取得的伟大成果。从会议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果来看,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的广泛性、多样性。会议制定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经协商后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和有关组织机构,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决定国旗、国徽、国

歌、国号等重大事项,这些成果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正确指引下取得的。这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有了更广泛的民主权利,使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完备和固定下来。人民政协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组织的功能作用,始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带领各族各界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最新理论成果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9],并以之作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统一战线所面临的时和势,在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发展脉络、深刻总结统一战线工作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对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安排,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深化发展,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又一次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以“十二个必须”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需不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和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等统一战线的重大原则。这些理论、原则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

论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统一、建立同盟军、团结非无产阶级等理论观点,又紧密结合新时代新任务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21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最新成果。

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形势任务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认识,创造性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围绕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列重要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以“十个坚持”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1],深刻阐明了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命、实践要求,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指明了发展方向。

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指导人民政协工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一)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把“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一条重要经验^[20]。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人民政协要把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一,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理论体

系,并以之教育全党和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巩固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的“十个坚持”的首要规律性认识。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要始终坚持这个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守人民政协成立之初心,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1],助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作出人民政协的贡献。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并不断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最新的创新理论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掌握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之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并转化为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武器,转化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本领,转化为提高履职尽责能力的科学方法,“切实担负起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22],以增进最大的团结统一,形成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认识、统一的行动,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人民政协为人民,夯实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

2019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着力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抓住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做好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23]这是习近平在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治国理政方针在人民政协的具体化要求。坚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列宁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政协要在协商议政、建言资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等各项工作中坚持这些思想原则,以赢得人民对党的信任支持,发挥好统一战线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作用。

(三)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作为人民政协的中心工作内容,落实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责任与使命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奋斗目标。围绕这个目标,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24]。围绕中心服务是统一战线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也是检验统一战线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在人民政协章程的总纲中也明确提出了人民政协“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要求^[25]。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扣时代主题,紧紧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心任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民意、开展协商式民主监督,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平台众多、资源丰富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智力优势、资源优势,“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议政建言”,“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推进协商议政”^[26],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

(四)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发挥人民政协争取和团结的优势作用,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习近平指出,人民政协要“着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1]。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坚持团结各党派、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以及海内外爱国人士。把“建言资政”作为政协工作的主题,把“凝聚共识”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主线,贯穿人民政协工作的全过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进入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统一战线争取并团结更加广泛的力量共同致力于这一伟大事业。如何争取、团结两个范围的联盟力量,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有利于最大限度把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2]人民政协具有联系广泛、资源众多、人才汇聚、界别众多等优势,只有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作用,才能最大限度把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因此,人民政协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努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交往。要发挥人民政协外交和界别委员的作用,争取和团结更多的知华友华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朋友圈,画出最大同心圆。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才观,加强人民政协两支队伍建设,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人才支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才是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和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20]。

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关键是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政协队伍。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习近平强调:“选人用人必须把好政治关,把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21]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其“两支队伍”建设的首要标准是要坚定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成为政治上引领委员、界别群众的楷模。

习近平指出:“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是人民政协高质量履职的重要保障。”^[22]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体,也是人民政协各个界别的代表性人士,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高的参政议政能力。政协委员队伍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政协履职能力水平。因此,要坚持把懂政协作为重要标准摆在突出的位置,按照习近平提出的“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总体要求,加强委员队伍建设,以高素质的队伍保障人民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六)坚持理论指导实践,深化人民政协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理论支持

要发挥各级政协理论研究会的作用,建设一支“懂政协、爱政协、研政协”的政协理论研究队伍,对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行学理性、系统性的阐释,把握其中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其发展规律,指导政协工作的实践创新,并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持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理论基础、提供理论支撑。要着力开展构建人民政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深化人民政协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等研究,为丰

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要着力总结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规律、精选人民政协故事,科学运用现代化传播手段,传播人民政协精神,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人民政协故事,更好地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认识了解人民政协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制度。要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树立中华民族的良好形象,扩大知华友华力量,推动形成最广泛支持中国建设的统一战线。

(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巩固党在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认为,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余年来实践历史经验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长期以来,中国统一战线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成为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各项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为党的事业发展进步提供坚强的保障。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要求,也是人民政协建立时的初衷和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人民政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以人民政协各级党组织建设、党员委员队伍建设为主要抓手,着力加强政治、思想、组织、制度、作风、纪律、队伍建设,使政协党组织在政协工作中领导有力、引领有方,党员队伍有影响、有示范、有带动,使党的决策主张在人民政协理解到位、贯彻到位、宣传到位,进而巩固党在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人民政协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厘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人民政协的逻辑关系、理论关系、学理关系,对于人民政协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创新发展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更好地科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蕴含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政协报,2024-09-21(2).
-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乔冠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
- [3]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EB/OL].(2021-07-26)[2024-06-25].https://m.thepaper.cn/baijiaao_13756432.
- [4]王泽壮,喻方洲.论共产国际巴库大会召开的背景[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5).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9.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9.
- [7][匈]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M].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432.
- [8]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8-129.
- [9]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4.
- [10]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69.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9.
- [12]列宁.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1-192.
- [13]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1.
- [14]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84.
- [15]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1.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83-284.
- [1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3.

(下转第68页)

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形态探究

杨绪强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聚焦党和政府中心任务,通过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凝心聚力形成相对一致意见的有机互动过程,是实现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一中心三主要”职能体系的中心环节,是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集成体现。人民政协75年的发展实践表明,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履职工作一以贯之的中心环节。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协商性共识,是一种“求大同”的相对一致的共识。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形成的格局形态为“同心圆”形态,呈现的效果形态为“最大公约数”形态。

关键词: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理论逻辑;民意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04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29-05

人民政协为协商成立新中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人民政协75年的发展实践表明,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一以贯之的中心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将人民政协工作纳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并多次强调要做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不断推动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站在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和显著政治优势,并将“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纳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①。可见,在“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下,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其凝聚共识的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愈显重要。因此,深化对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理论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为助推人民政协有效凝聚共识提供理论借鉴。

一、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基本内涵

所谓“共识”,就是共同的认识^②,即在特定的时代和框架体系下,各领域各方面的人们,对相同的事物形成的互相都认同的看法。世界是多样的,事物是矛盾发展的。共识与分歧就是认知事物客观存在的思维矛盾体。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在不同的运行

收稿日期:2024-09-25

基金项目:中央社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ZK20220227)。

作者简介:杨绪强,男,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副主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学报副主编,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人民政协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框架内,特定的人们存在着基于自身利益出发的所谓正确认知,不同的人群依据这些分散的正确认知,往往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多元的认知引发多元的行动方案,进而产生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凝聚共识越充分,人们行动的方向就愈一致,产生的社会力量就越强大。

人民政协是奠基协商成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主题,最大限度实现民意聚合和凝结,这是人民政协发展的重要理论逻辑。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也体现了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工作的天然状态。因此,目前学界自觉地、专门针对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内涵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什么”的问题来展开的。这实际上是专家学者就“凝聚共识是不是人民政协职能”展开的讨论。学者们通过对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历史发展、统战特点等多面向进行分析,基本上认同了“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的职能”的观点。但应注意到,专家学者在“凝聚共识”的具体表述上还存在差异。比如,有学者认为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能,但其是否能作为人民政协的第四项职能有待斟酌;有学者提出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的基础性职能;有学者指出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的综合职能;有学者直接将凝聚共识作为第四项职能与人民政协其他三项职能并列表述。此外,学界还分析了凝聚共识的内涵和必要性,如有学者探讨了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内涵,指出人民政协广泛凝聚的共识是具有统一战线特色、围绕圆心和主轴所形成的从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再到文化认同,从执政党引领力、中华民族凝聚力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逐步扩大的公约数。有学者指出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的需要、是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需要。还有学者指出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与生俱来的职责,是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内在要求。

在实践领域,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时俱进回答了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凝聚多元民意的重大课题,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索。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发挥更加突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人民政协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首次提出“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3]。2019年9月,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对凝聚共识进行专门论述,并明确“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写入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4267]。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健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5]。2019年2月,在《全国政协协商议政质量评价工作办法(试行)》中将“形成共识”作为评价指标内容。2020年9月,全国政协围绕凝聚共识工作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总结制定了《关于加强和促进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以“三个面向”为主要内容的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的指导思想^①,为进一步做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提供了指引。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水平”^[6]。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7]。2024年7月,中共二十

①“三个面向”的主要内容为:面向委员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委员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面向社会传播共识,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厚植政治基础、社会基础;面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广泛汇聚正能量,画出最大同心圆,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参见《关于加强和促进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的意见(摘发)》,《人民政协报》2020年12月14日,第1版。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制度机制系统集成的高度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8]。可以说,新时代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实践,是实现“党—国家—社会”力量有效整合的重要体现,在推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此,笔者认为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聚焦党和政府中心任务,通过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凝心聚力,形成相对一致意见的有机互动过程,是实现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一中心三主要”职能体系的中心环节,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集成体现。

二、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主要特征

(一)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协商性共识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协协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凝聚基本共识。比如,政协各参加单位、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就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开展协商的过程,体现了凝聚共识;党委、政府、人大积极采纳政协协商成果并反馈采纳落实情况,体现了凝聚共识;政协委员就党和政府重点工作和重大工程开展民主监督,提出批评和改进建议,体现了凝聚共识;人民政协通过广泛调查研究,广泛联系群众等方式开展政协基层协商,解难题、解民忧,体现了凝聚共识。协商已经成为人民政协开展工作的基本原则,成为人民政协协调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行为方式。因此,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本质上是一种协商性共识,其采取的形式一般是和风细雨的、润物无声的,比如“神仙会”的方式、读书活动等。

(二)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一种“求大同”的相对一致的共识

人民政协凝聚共识,首先是承认差异的,是要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的。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实际是一种差别共识,也是一种有限共识。从内容来看,体现为政治共识、价值共识、决策共识、行动共识、情感共识的差别;从地区来看,体现为不同

地区共识内容的差异,比如我国东西部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关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议题自然也不一样;从形式来看,凝聚共识的形式是多样态的,可以是间接听取、收集信息,可以是直接参与实践,可以是会客厅、议事厅,可以是工作室,也可以是委员联络站等。

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属于有限共识。近年来,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质效进一步提升。从凝聚共识的程度来讲,一般存在两种状态:一种是积极的共识状态,也就是共识度特别高,参加者有高度的共鸣;一种是消极的共识状态,即虽然有一定共识度,但是很大一部分意见为不支持、不反对,或存在保留意见,形成共识的漠然情绪状态。但是,不管是以上哪一种状态,这个过程都使得人们养成了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讨论、争辩和妥协,适应这种“商量着办事情”的方式,容忍不同意见存在,做到克己、理性。为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人民政协要坚持守正创新,既要尊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敢于面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用历史的观念和辩证的思维去看待和理解问题,这个过程客观上就是凝聚共识的过程。由于不同的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认知不同,形成绝对一致共识的情况就比较少。可以说,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一种提倡“求大同存小异”的有限共识,应该将其作为一种考量凝聚共识的程度的理性状态,正确分析和对待不同的意见建议,并将其中的合理性转化为推动做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的积极力量。

(三)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一中心三主要”职能体系的中心环节

人民政协成立75年来的一个重要实践创新,就是在探索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逐步形成了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职能体系,即“一中心三主要”职能体系。“一中心”就是将凝聚共识作为人民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三主要”就是指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个主要职能。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人民政协的职能内容有不同,逐步形成了人民政协的三个主要职能。当前,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视野回望人民政协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政协在以往每个历史时期履行职能之时,都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实现民意的聚合和凝结,增进各方面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明确强调,人民政协要“把加强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4]267},进而逐步构建起人民政协“一中心三主要”的职能体系。在这个职能体系中,凝聚共识为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个主要职能提供目标指向;三个主要职能为凝聚共识提供路径和形式。人民政协“一中心三主要”的职能体系相辅相成,是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生动体现。从现实看来,随着人民政协“有事来协商”等协商品牌在全国各地开展并切实发挥积极作用,人民政协“一中心三主要”的职能体系既接“地气”,又接“天线”。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人民政协凝聚共识与人民政协三项主要职能的关系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因此,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一中心三主要”职能体系的中心环节,是对人民政协履职实践经验的重要总结。

(四)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集成本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时刻改变着统一战线内部构成,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具体利益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特别是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更加多元的新群体新阶层。人民政协委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士,智力密集、包罗万象。习近平指出:“政协委员社会知名度大、关注度高,一言一行都具有影响力和示范性。”^{[9]7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凝聚的所有共识,都会聚合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这种聚合,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层级各方面。具体来说,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在宏观层次的表现是“政协共识+社会主义制度+中

国现代化实践”的治理效能的彰显;在中观层次的表现是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在微观层次的表现是“民意有效表达+民众广泛参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效应。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将“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相互融通,进而实现全社会同心向党、追求美好生活的“集体行动”。

三、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形态

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制度框架中,是专门的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覆盖面广,主要包括对政协委员、社会和海内外的“三个圈层”,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圆心的“同心圆”形态、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底线的“最大公约数”形态。这是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分别在格局层面、效果层面形态的具象表现。

(一)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格局形态为“同心圆”形态

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客体主要为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以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人民政协凝聚共识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中心环节,能够促成民意形成向心凝聚的格局,最终形成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同心圆”形态。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同心圆”形态的圆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圆心固守住,党的领导越坚强,人民政协工作影响力越大,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同心圆”就越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人民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4]264-265}。人民政协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有效汇聚中国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力量,形成真正的、广泛的、紧密的大团结^[10]。人民政协凝聚共识通过面向政协委员加强思想政治引领、面向社会传播共识、面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圆心的三个“同心圈层”^[11]。为此,要善于把凝聚共识融入人民政协各项工作当中,引导政协委员体悟践行“国之大者”,立足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立足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协商的天然优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起来。

(二)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效果形态为“最大公约数”形态

“最大公约数”形态,是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效果的独创形态,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智慧。统一战线是同与异的统一体。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我们既面对着一些有利于大团结大联合的客观差异,也要直面一些不利于团结奋斗的异质现象。找到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关键在于努力做到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的思维升级,在不断巩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政治的基础上,在政协协商民主中充分尊重包容差异、加强思想引领、增进政治认同。但是,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9]561-562}。比如,政协全国委员会从建立之初,就积极团结各民主党派作了大量工作。当时民主党派分别联系和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些阶级、阶层的思想、要求,通过民主党派反映到人民政协之后,经过广泛协商,不同的思想认识,不同的意见和要求,有些趋于一致,有些经过采取或调整某些具体的政策或措施后得到解决,最终实现了凝聚共识、增强团结的目的^[12]。此后,人民政协逐步探索了包括“双周协商座谈会”“神仙会”“加强委员联络工作”“双周协商讲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委员视察,开展智力支边,成立政协学习委员会以及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等形式,不断找到解决问题、办好事情的最大公约数。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得到有效衔接,“政协委员下沉一线”,委员联络站、委员议事厅、议事亭等协商于民,并运用互联网议政协商的方式,倾听、吸纳和整合民意,更好地让政协委员立足岗位和工作特长,一线体悟民意的脉动,实现建言献策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21(2).
- [2]阮智富,郭忠新.现代汉语大词典: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413.
- [3]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1).
- [4]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13(1).
-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8]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4:34.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0]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在京开幕[N].人民日报,2022-03-05(1).
- [11]全国政协办公厅负责人就《关于加强和促进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N].人民政协报,2020-12-14(2).
-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96.

责任编辑:张淑瑛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

赵峻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东广州 510545)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远的文明性赓续了中华文脉,以现实的可行性印证了中国方案,以民族的自主性凝聚了中国力量,擦亮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化的实践方式、发展模式和文明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以马克思主义为叙事内核,以中华文明为叙事底蕴,从多维度出发,在世界场域和中国实践互构中强调主动叙事、历史叙事和全球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门关于现代化的新科学,内蕴了中国创新和文明追求,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图景,实现了对现代化和文明形态的反思与建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叙事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05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34-07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关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型文明叙事范式提供了根本遵循。理解现代文明必须置身于“比较学视野”中,以整体性眼光分析总结和归纳特性,在文明问题上切不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在“两个结合”中拓新了社会主义文明叙事,展现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图景。

一、探寻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徜徉历史长河,中国式现代化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破解了“大规模发展”的世界性难题,粉碎了

“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格局,走通了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重塑了国际格局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类本身和谐”的统一,建设“美好中国”和“美好世界”的统一,尽显“超越型现代化”的时代进步性和价值正义性。

(一)文明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祖先们依托大河农业耕种,并通过人口聚集等优势,共同创造出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创造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精准画像”,包括治国理念、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民风民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在人类文明版图上,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国在现

收稿日期:2024-09-03

基金项目:2022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22WTSCX167)。

作者简介:赵峻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

代化进程中,农业、畜牧业、医药、天文地理、制造工具、科技发展、城市建设、国家治理、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华文明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历史终结论”的狭隘偏见,中国道路给其他国家探索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究其根源,中华文明蕴含“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兼爱非攻”“和而不同”“人心向善”等理念,倡导“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伦理情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用两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塑造了“温文和平”“能屈能伸”“和合而非分裂”“中庸而非极端”“宽容而非狭隘”的精神特质以及“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生命态度。实践证明,在家国天下的大集体意识和情怀下,集体主义价值倾向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血脉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鲜明体现。

(二)文明之魂: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引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文明”是表征人类进步的历史性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对文明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将其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实现了对以往人类文明思想的根本革新。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阐明文明的内在逻辑、从社会形态中把握文明形态,揭示根本动力、演进规律及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人们科学看待和解决文明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为人类谋求发展进步和开创全新文明形态开辟了巨大的历史空间。

一是文明实践与社会进步。近代西方文明研究深受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求打破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禁锢,强调关注人本身,站在人的视角而非神的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确证了人类社会从“自然蒙昧”状态走向“文明开化”状态是依靠人的“理性力量”。这一研究一直延续到马克思的时代,并衍生出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当中既有以基佐为代表的历史学研究,也有以摩尔根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等。这些研

究驳斥了“神学史观”,主张人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展现了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些研究在确证了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却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人”概括为人的一切“共性的抽象”,从抽象的人出发把握文明。于是,对人的研究变成了对人思想观念、内在本性和自我欲求的研究,对文明进程的求索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泥潭。

区别于“抽象的人”的逻辑进路,马克思把人的本体性存在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联系在一起,将对文明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实践观”的范畴中。如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文明归根结底要融入社会关系、融入社会实践。实践促进了文明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内源动力,其中物质生产实践起到根本性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内在矛盾运动,促使了整个社会发展呈现出辩证否定的“自我扬弃”过程,这就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为文明繁盛增添了活力、注入了动力,创造了必要的物质财富,构成了文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是“直线式”的坦途,也会出现曲折、停滞、顿挫或后退现象,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会因此改变,这也意味着文明会在实践的发展中不断汲取动力。马克思把实践视为表征“人的类特性”的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按照自身的尺度去塑造外部世界,使对象的本然性状朝着符合人的审美和需要的方向转化,人的本质力量得到生动演绎,创造出灿烂生动的文明成果。就此而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源于实践,从中淬炼生成文明的独特内质。

二是人的发展与文明尺度。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文明形态,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文明面”,肯定了西方文化对推进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重要历史贡献。如资本主义把各个封闭的地区串联起来,有效地开拓了世界市场,打破了相互隔绝的状态,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使世界融为一体。在此过程中,拓宽了人们的交往范围,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丰富了人本身的内涵。同时,资本主义以先进的生产力,打破了以

往人类对自然界的被动依赖状态,使人不再匍匐于自然脚下,“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3]93}。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文明面”,认为那是一种虚假的“文明表现”,西方只是编织了有关文明形态的神话。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弊病就在于“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3]268}。这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现代文明形态,资本乃是文明的导控力量,这就注定了一种命运,即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最终都是用于献祭资本增殖。首先,资本家不断“吮吸活劳动”,即通过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榨,以实现无限式的资本增值,这是以戕害人的生命和扼杀人的发展为代价的“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其次,机器大工业发展,人沦为机器的“附庸”,人的创造力在周而复始的社会分工中被湮灭,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畸形的发展;最后,资本主义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文明形式,“物”的主体性张扬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遮蔽与消解,人被彻底“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而沦为“物”的奴隶^[4],成为资本财富的狂热角逐者。人充其量是资本家牟利的“牺牲品”和“垫脚石”,而非文明的尺度和价值归宿。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逐渐演变为帝国主义“文明”,并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种建构中,蕴含着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和逻辑,“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成为广受诟病和批判的宏大叙事。回顾历史,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的先天性弊病,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以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以人的现代化为衡量尺度,以独立自主为鲜明特征,尽显突出优势,从而形成新的文明形态。

三是共产主义与文明追求。马克思研究人类文明,其最终的价值导向是为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必须把人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人享有充分自由。在此基础上,人可以摆脱劳动奴役,拓展更高层次的发展空间,注重创造力和精神层次的

跃迁,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涵养人的文明素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这是共产主义文明阶段的鲜明特征。这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的发展得到了充分保证,个人的发展并不以挤压他人的发展为代价。共产主义作为根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文明阶段,能够令人自主地从事符合自身发展的需要的劳动,“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6],共产主义是每个人的才能和潜质全面发挥的文明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和价值定向是美好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奋斗的目标,要积极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文明理想。“文明理想的要义是让人性重新完满起来,实现途径就是不断重建人的有机团结与联合。”^[7]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区分了“虚假(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而区分之标准主要在于“共同体”是否代表每一个成员(个人)的利益以及代表的程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成员间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即在经济上,是利益共同体;在政治上,是命运共同体;在社会上,是治理共同体;在文化上,是价值共同体;在生态建设上,是生命共同体,这符合人类文明的基本法则与追求。

二、领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涵

文明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展现了社会的精气神。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文明高度赋予了现代化以文明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呈现的文明样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统一。中国倡导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反对文明隔阂和文明冲突。这一主张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是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宣言”。历史和实践表明,我们要在团结奋斗中创造新历史,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守正创新,让“真善美”的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一)求真,锻造发展内核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中国坚持现代化发展的“多维性”,而非“一维性”,要创造一种“超越”与“革新”的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摆脱了西方民粹化和对立思维的缺陷,用社会主义文明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人的现代化”冲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迷雾。社会主义文明并不沉溺于“修昔底德陷阱”,不追求博弈和对抗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布局上,中国共产党汇聚了人民的力量和发展合力,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深度推进中诠释了发展新面貌,塑造了立体的“文明范式”,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比翼双飞,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彰显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国式现代化要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要在把握历史主动中统筹规划、创新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并以新形态的“中国版本”有效回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课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证实科学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并使之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聚焦现实议题,赋予科学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底色与时代内涵。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异质性及其发展的差异,要立足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从多维视角深刻理解现代化意涵。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的历史坐标中实现理论创新、道路创新和形态创新,更好地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与本质,以全新文明范式的“连续”实现文明鸿沟的“突破”与“跨越”。

(二)为善,彰显主体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朝向终极之善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将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出个体与人类所需要的终极之善。”^[9]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既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又有效地遏制了资本的无序扩张,弥合了人的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分裂。如通过提高生产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夯实了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全面依法治国,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了人民主体性地位;通过教育提升了人民能力和素养,激发了创造活力;通过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通过改善民生,保证了人们的生活品质;通过推进国家安全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证

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等。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重视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也要注重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包括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中心论”将导致不计后果的非理性行为。习近平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9],强调中华文明创造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10]。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天人合一”理念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仁爱之心,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审美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先声。天人合一的目的性,最根本的表现在构建人与自然的友好善良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人类中心论”的怪圈,厚植于伦理情怀,经得起历史尺度的考量和道德尺度的评价。

(三)向美,锚定美好生活

新发展理念对美好生活具有引领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言:“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11]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创新发展驱动美好生活,通过协调发展推进美好生活,通过绿色发展厚植美好生活,通过开放发展拓宽美好生活,通过共享发展保障美好生活。一是通过创新推动人类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12]美好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创新,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治理创新。二是协调发展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要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和谐安定的文明社会。三是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要立体化、全方位推动宜居环境的构建。四是开放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塑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仅惠及本国人民,也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与包容。中国式现代化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五是共享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突出特质。要建立共同富裕共享的现代化,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机制,促使城乡之间良性互动,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形成各地区新的增长点,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擘画“富强美”的现代化建设新画卷。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光明、任重道远。要始终坚守初心,自信自强,找到得当的方法,付诸有力的行动。自信的底气源于自强,正如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说:“小民族经常是悲惨的,他们之所以悲惨,并非因为其小,而是因为弱;大帝国之所以繁荣发达,并非因其大,而是因其强。”^[13]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有勇气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从具体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断地提出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把正确的道路走实走坚定,不因风险和挑战就自我设限、改弦更张,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三、在新型文明叙事范式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囿于理论哲学的局限性,并没有脱离认识论窠臼,割裂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文明的生成、演化归因于神正论或自然法,抑或是纯粹的自我意识等精神力量,这种从思维出发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是带有虚幻色彩的外部反思和主观臆断,远离了文明的真正质态,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文明叙事和幻象。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4],体现了命运与共的理念与现代化的文明憧憬,以负责任的态度从根本上超越了狭隘文明观,超越了传统西方主导的叙事模式,在新型文明叙事范式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

(一)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

西方现代化变革深度影响现代文明。“文明等级论”萌发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盛行时期十分流行。它将西方文明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广大的非西方地区归属于“半文明”或“不

文明”。这种论调把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合法化”,把殖民活动美化为“文明”对“不文明”的教化。“文明等级论”在压缩和剥夺其他文明生存空间中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探究其由,要追溯到古希腊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学传统。这种思维模式有着惯性的思维,习惯于将事物引向一个抽象的、至高无上的“在者”,从而在认识论中构建一个本体论“预设”,使之限定在固有的思维框架中。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将“中心”的意义推向极致,指出首要存在者就是其他存在者的原则。在形而上学的追思下,西方文化追求一种对确定性“中心”的执着,即万事万物都源于一个中心原点,不断向外散发与辐射,而他物不外乎是“中心原点”的“分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受这种所谓“福音”的影响,西方文明不断地将自身的文明“果实”以强加或植入的方式扩散到世界各地。历经漫长的中世纪洗礼,西方文明最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改革,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西为主”“以西为尊”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可见,现代西方文明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古典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内核以及绝对神学的教义精神,因而势必限制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话语方式,霸占着世界历史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唯有突破这种文化霸凌,才能回归科学的、符合历史进程的文明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了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21世纪的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于中国文明的“自我主张”和“自我创造”,为建构中国文明话语体系提供了概念,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奠定了基础。

(二)构建符合规律的文明叙事

揭示文明兴衰规律,擘画文明发展路径,需要树立大历史观,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从历史的长河、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寻规律的秘密、提出有效策略,在理论确证中构筑中国式现代化新型文明图景。

世界历史理论是针对世界历史演变的一种理论

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历史”并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自由和解放的“哲学范畴”,包含着对人类文明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理解,传递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方向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历史理论的“唯物史观范式”,对“理论”与“现实”展开了深刻的思考。这是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开启了全新的世界历史叙事方式。哲学是“改变世界”的,不是“事后思索”的产物,要基于物质力量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世界历史的形成实质是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现了对历史主体的“颠倒”,确立了世界历史的主体是人类本身,而不是他物,即“大自然”和“绝对精神”等。换言之,人类建立自身存在的意义只能从感性的“现实的人”的实践中去寻找,而不能从“理性”和“大自然”中寻找。马克思主义批判了单纯抽象的目的论,开启了对世界历史的建构性探索。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深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影响,是因为它在超越西方先验理性主义文明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图景”^[15],同时形成了独特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叙事主题:世界历史是一种趋势,是符合规律的,也是合乎目的的,是“人类自身向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回归”的过程^[16]。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有利于进行科学的、符合历史进程的文明叙述,促进人类觉醒,让各民族文化回归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特性,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指出光明的前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这如同把“三原色”叠加组合,产生新颜色,不断丰富文明的色彩。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背景下,“人类命运何去何从”被提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日程,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世界历史观”问题。新的历史理论是对“冷战思维”的超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突破。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呼唤着全新的文明形态。这就要求我们重新确立反思历史的“自我意识”,积极主动思考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叙事,创造人类和谐共生、文明共存的文明形态。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世界文明叙事必须正视各国的历史和文化,

科学评判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形成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话语体系。人类的文明叙事需要科学综合地分析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探究其背后的发展规律。

一是形成科学的文明叙事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文明进程的观察和对文明进步的揭示,建构了基于科学实践观的文明史阐释模式。马克思对文明的探讨,不仅表现在对单体文明及其规律的揭示上,也从不同文明体的交流互鉴中,揭示出世界文明发展走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视野中,文明不是既成的状态,而是生成的状况;不是给定的目标,而是实践的产物。”^[17]话语的生成与叙事体系的构建是鲜活且动态的,是通过不同主体间的沟通和交流来实现的。正是由于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各自特点和标识的文明,才共同塑造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繁荣图景。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以此为中华文明叙事体系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摆脱孤立狭隘的分析方法,立足实际,实事求是。

二是构建新型的文明发展观。文明发展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叙事模式,打破西方编织的文明神话,梳理清晰东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整体脉络,重新审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和各自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自信”瓦解“文明优越”,成功打破了“特殊主义普遍化”的“一元现代化模式”,也必将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话语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是坚持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相统一的现代化,突出体现了人民主体地位的鲜活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在推动实现从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的转换中,不断生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虽然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但并没有陷入西方现代化中“见物不见人”的异化困境,而是走出了一条以人为中心、体现人的发展逻辑、现代化发展的文明之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达,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表现和文明路向。

三是促进人类觉醒和新文明传播。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根本力量,要以全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促进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觉醒,跳出固有思维的“陷阱”,摆脱“历史虚无主义”,重撰蕴含“中国风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世界文明叙事要契合民族发展的文明内核,符合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尊重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类社会指引和谐光明的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虽在中国大地上生成,但与世界紧密相连。要在世界场域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构建与话语传播,在国际化语境中通过“他塑”和“自塑”整体互构中传播新文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框架与内容建构体现出理论与实践、民族与世界、个体与集体的统一,是相对于“虚幻”文明表达的真正的文明叙事。随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创造,这样的文明叙事逻辑更加清晰,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建构的世界文明意蕴亦更加突出。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正当其时。中国叙事体系旨在用中国文化、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是一个复杂、系统且有别于西方叙事的思想 and 行为体系。构建中国叙事体系,核心要义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阐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在此进程中,需要把握好叙事立场、叙事逻辑和叙事策略,切实找准中国叙事体系着力点,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不断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9:9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4.

[7]刘晨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文明观[J].贵州社会科学,2024(1).

[8]晏辉.追问和追寻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基础[J].理论探讨,2023(3).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71.

[10]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7.

[11]习近平.谋求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7(1).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67.

[1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62-163.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4.

[15]李艳艳.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超越性的四重维度[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16]吴宏政.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J].中国社会科学,2021(5).

[17]李艳艳.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的超越对象与超越路径[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5).

责任编辑:陆姝彤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逻辑与建构理路

——基于“古今中西之争”视角

曹嘉辰, 吴文新

(山东大学, 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文化层面的主体特性。中华文化主体性自在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并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而动态发展,大体经历了自在生发、动摇与调适、重新建构与巩固等三个阶段。“古今中西之争”作为中华文化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成为探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视角。历史地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着重处理好古与今、中与西、根脉与魂脉的辩证关系。立足当下,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塑造主体交往新范式,在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中筑牢主体性根基,以“第二个结合”熔铸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

关键词:中华文化主体性;古今中西之争;第二个结合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06

[中图分类号]D6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41-07

习近平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化主体性”这一时代命题,并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主体性确立于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主客体交流碰撞之中,能够彰显民族文化的独特标识与本质特征,凸显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中华文化主体性,即中华民族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性在文化层面的表征。中华文化近代以来遭遇的文明交往与自身迭代,使得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成为探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视角。有学者认为,不同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实际都围绕着文化主

体性这一问题而展开^[2]。近年来,有关“文化主体性”的研究成为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鲜有基于五千多年文明演进的“大历史观”与“古今中西”结构的整体视野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回溯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发展脉络,将中华文化主体性置于“古今中西”的整体时空场域中进行分析,探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路径,以资借鉴。

一、历史回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与流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3]中华文化主体性同样需要回答“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正如中华文

收稿日期:2024-08-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8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KSB045)。

作者简介:曹嘉辰,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吴文新,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休闲价值观。

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也从未断绝,其自在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并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而动态发展,大体经历了自在生发、动摇与调适以及重新建构与巩固等三个阶段。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在生发

中华文明乃独立起源,本不存在主体性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主体性不存在。中华文化主体性最初以“自在的存在”而存在,其可以追溯至中华文明的独立发端。正如费孝通认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4]。文化主体性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之中。约五千年前,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生息发展。历经华夷互化融合,华夏民族以夏、商、周的国家外壳维系着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中华文明也由此滥觞。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华夏”“诸夏”“夏”“诸华”“华”等称谓来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以及华夏族的一体性,这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更主要的是表现出当时华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5]。由此可见,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华民族的生成源头中已有了存在依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促进了多元文化在碰撞中交融,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出现,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进一步确立与巩固。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生发了先秦思想、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标志性文化硕果,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得到建构与发展,形成了当今中国的文化根脉。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动摇与调适

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其中,文明蒙尘的突出表现就是文化主体性的动摇。自古以来,由于历代王朝强盛的国力以及创造的辉煌文明,中国古人普遍呈现出文化自信的心理状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不断打击着国人的自尊心。民族危机的加

深在文化层面也有所体现。其一,文化秩序紊乱。随着传统自然经济与封建政治制度的瓦解,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的文化生命体逐渐丧失了活力,传统的文化秩序无力维持现实的社会秩序而趋于解体。与此同时,“在过去高度整合的中国社会中所形成的思想和价值丛聚,在文化与道德体系解体以后不是败坏,便是脱臼”^[6]。其二,文化至上感的丧失。随着西方列强的一次次入侵,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列强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坚船利炮,更在于其制度乃至文化层面。梁启超就曾将中国人自知不足的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7]。东西方两种异质性文化带来的对比是极为强烈的,由此引发了部分国人的文化自卑心理。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国人的质疑与现实的挑战,中华文化主体性由此发生了动摇。在西方冲击下,晚清以降,不少仁人志士开始直面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遇境遇,试图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由此产生了东西文化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乃至科举与学校之争、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等更为细致具体的争论。守旧者出台了“中体西用”等方案期望延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的文化生命体,革新派则以“全盘西化”等方案热烈期盼能塑造一个全新的文化形态。应该看到,从晚清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文化层面的探讨与实践对于推动文化进步、文明更新具有积极意义,也使得中华文明虽然“蒙尘”但不至于丧失文化主体性。这一时期的文化论争,始终焦灼摇摆于“新”“旧”“中”“西”之间,洋务运动的破产、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也从实践层面证明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动摇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巩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文明的危机在国人眼前逐渐暴露,部分知识分子由此意识到西方文化并非“灵丹妙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纳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之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李大钊为代表,一批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

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9]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其一,在文明的连续性中建构文化主体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534}其二,注重吸收本土与西方的优秀文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9]533},反对照搬挪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强调文学与艺术的人民性表达,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成为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命题。具体而言,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当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9]707}。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突破,也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科学回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有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的历史实践,不断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巩固,形成了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等元素的新形态文化生命体。

二、理论证明: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议题

晚清以降,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遭到挑战,并形成了文化论战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需要切实探讨以下三对关系:在空间维度上,探索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在根本路径上,要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相结合的逻辑。

(一)以“中”为主汇通“中西”

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意识生成于本土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主客体交流碰撞中,因而探讨“中”与“西”的关系乃是建构文化主体性的题中之义。随着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同文化的相遇是历史的必然。相较于中华本土文化而言,“西”在狭义上

指向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在广义上则可包含一切外来文化。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中,历来存在着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但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之前,中华文化主体性未曾在根本上产生动摇,也不曾陷入需要讨论文化层面“改弦更张”的严重局面。鸦片战争以来,文化层面的论战迭起,其中的焦点问题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中西体用”也作为时代课题被提了出来。张之洞等洋务派秉持“中体西用”论,以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为根据,吸收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乃至物质层面的器,肯定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却造成了“体”和“用”的分离;辜鸿铭等持“中体中用”的立场,着眼于文化的民族性维度,认为东西方文化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胡适、陈序经等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以“西体西用”的方式全盘性抛弃中国文化;“西体中用”论以李泽厚为主要倡导者,其赋予了“体用”“中西”新的内涵,但依旧未能摆脱体用之间的中西分野。

在“体用之辩”的框架中讨论中西文化,虽能凸显问题的症结却显得过于机械,同时部分观点忽视了中华文化自身的主体存在。中华民族始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华文化的实践主体。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9]707}因此,以“中”为主,强调中华文化的“主格”存在,是探讨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追问一种突破中西体用之争的汇通逻辑。历史地看,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外来文化。“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0]471}以儒家文化为重要基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蕴含着兼容并包的文化意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能够在兼收并蓄中始终得以坚守。在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的今天,中华文化要以主体性的视角直面世界文化,在世界文

明的交流互鉴中,以突出的包容性汇通中西,探索民族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二)以“今”为本贯通“古今”

一个文明体在长期演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处理当代与前代的关系。中华文化主体性植根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正是在“古”与“今”的贯通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延续,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贯通古今的伟大文明。但是,文化主体性中“古”与“今”相融通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线性时间问题,而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实践结果,其在晚清以降的特定历史内涵中表现为如何通过对待传统文化来应对现实民族危机。事实上,“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并非互不相干的独立议题,西方文化蕴含着的现代意味,使得近代中国的“古今”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中西”这一参照系而生发的。“今”往往包含着“新”与“西”双重内涵,因而“古今之争”又通常以“新旧之辩”的方式表达。晚清的“古今”观,通常与“新学”与“旧学”相联系。正如张之洞所言:“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11]为化解“新学”与“旧学”的冲突,张之洞提出了“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模式,实际上是“旧重新轻”的表达。而受“进化”思想洗礼的严复,虽认为“尽去吾国之旧”意味着“民之特性亡”^[12],但在体用一致的理论模式上推崇西学,成为“新重旧轻”的代表。“新旧之辩”发展至五四运动期间被泛化到一切具体的领域和事物中,来自西方的或要提倡的东西都名为“新”,本土所固有的、或要反对或要守护的东西都称为“旧”^[13]。

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旧之辩”大体存在着“崇新”“尚旧”“新旧调和”三种态度。“崇新”者,以除旧布新的激进主张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形成了“全盘西化”论;“尚旧”者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复古主义”。二者皆执着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性,忽视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性。而“新旧调和”论往往承袭“体用”分离的思维模式,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从文化的主体性视角看待古今关系,就要明确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关系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使

传统融入现代。以“今”为本就是强调传统文化应当向现代转型,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毛泽东认为,对历史的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19]708}。文化本身是流动的历史性存在,摒弃历史的文化主体便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拒斥向现代转型的文化主体亦无法久存。破解“古今之争”,即探寻一种古今互摄的贯通逻辑,以立足现代为本,让“古”之元素参与到“今”的生成之中,在推陈出新中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

(三)“根脉”与“魂脉”结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强调了“第二个结合”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华文化生命体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处理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的关系是当下如何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性问题。无论“古”与“今”的融通,抑或“中”与“西”的汇通,都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得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但中国早期的个别马克思主义学者往往陷入异质性文化相对立的窠臼,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从而“认为孔子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者”^[14]。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地位不可替代。毛泽东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5]但需要注意的是,“学会了”绝非简单的亦步亦趋,其本身有着内化于己的意蕴。内化于己的“学会”过程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其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正如冯契所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古今、中西’之争。”^[1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为处

理异质性文化的融合提供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正确解答。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源于不同的文化形态,存在着时空距离与内容的异质性,但在形而上的本体中,皆内蕴着“公道民本”的社会历史整体观,强调了“公”与“民”对于国家社会特别是文化发展的深层根基和价值依据^[17]。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理想社会追求、核心价值取向、哲学思维方式等层面都存在契合之处。在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优秀精华,不断创造符合时代符合人民的文化成果。在二者的相互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方法论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中华民族的风格、彰显中国特色,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文明走向了现代化,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凸显了“中国性”,给出了“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的答案,从而避免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自我迷失^[18]。在“根脉”与“魂脉”的圆融中,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获得了时代性、民族性的解答,二者实现了在价值理念上的心心相通与现实实践的同频共振,可称为化学反应式的“结合”。

三、实践路径: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19]立足新时代,中华民族有能力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此,要以文明交流互鉴的姿态吸收外来、面向世界,以守正创新的精神不忘本来、开创新局,以“第二个结合”熔铸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

(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塑造主体交往新范式

在全人类普遍的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独立生发、自我演化,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既定的客观存在。法国学者布罗代尔主张文明的“复数形式”,以此摒弃不同文明间的高低优劣之分^[20]。但在资本逻辑盛行之下,西方一些国家始终

秉持主体征服客体的思维范式,将他者文明视为改造对象,抹杀了文明间的平等交往。近代以来,学界探讨的“古今中西之争”,实质乃是异质性文明碰撞带来的撕裂与对立在思维中的反映。基于平等、双向对话的文明交流互鉴,以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主体间性原则勾勒出文明交往的新范式,为文化层面的中西汇通提供了前提基础。习近平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10]469}文明交流互鉴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内涵,也是文化生命体新陈代谢的必要途径。在一定意义上,民族文化对待他者的姿态,反映了其文化主体性的成熟程度。高度自为的文化主体能够在开放中自主,以主体性包容多样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既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性和坚定自我,也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对话中所体现的开放包容与高度自信。一方面,要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充实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强调:“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11]0}中华文化内蕴的文明包容理念,为内化吸收差异性文化提供了基础。以他者文明为镜鉴,不但要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增强文化自信,也要善于把握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接纳多元文化、汲取优秀文化,在中西汇通中丰富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另一方面,以中华文化观照世界,发挥主体能动性。在世界性与民族性深度交融的当下,中华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彰显独立标识与鲜明自我。同时,中国道路、中国方案自身蕴含着解决世界文化难题的经验与方式,应充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胸怀与智慧,以文明共生、文化共通的逻辑取代文明冲突、文化霸权,追求不同文明的“美美与共”,探索“共在”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在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中筑牢主体性根基

习近平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1]1}守正创新体现了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中华文化主体性需在“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

一中巩固发展。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文化保守主义之于文化主体性的严重弊端,断绝传统、否定过去的全盘西化也绝非民族文化的未来。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体,正是在环环相扣的历史传承中得以绵延的。面对时代新局,要以守正创新的姿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文化的民族独特性和本土化定位,从根基上筑牢文化主体性。

立足当下,“守正”守的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其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守。“创新”的实质是在守正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应时代之变。第一,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立基之本。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尘封之物”,而是在血脉相传中不断与现代进行交织与对话。唯有依据传统,才不致在创新中迷失自我。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民为邦本、修齐治平、厚德载物、知行合一、守中致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我们应当以“古为今用”态度,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确保中华文化的本土定位。第二,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形塑文化主体性。“古为今用”不失为对待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但其依然意味着有一个先行有效的“主客二分”模式,存在着“古”为用“今”为体的体用之别,而未达成体用不二、圆融无碍的境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则意味着文化主体性能动的自觉建构^[21]。“创造性转化”意味着对文化旧质的剥落与新塑,凸显由古至今的“贯通”;“创新性发展”则是在“创造性转化”基础上的趋向与结果,强调文化的新质生成。由此可知,赓续传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地照搬挪用,而是要赋予传统新时代的内涵与现代的表达方式,其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接着讲”而非“照着讲”。要灵活运用现代化的技术、符合时代的话语表达,让传统活起来、动起来,使传统立足现代。

(三)以“第二个结合”熔铸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建设的智慧结晶,其破解了异质性文化相结合的难题,为造就融“古今中西”为一体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极大促进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建构。高度自为的文化主体性应当是“动态的主体性”,其外在体现便是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第二个结合”绝不能忽视“第一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本身是从原先“一个结合”中分化派生出来的,正是“第一个结合”奠定了巩固文化主体性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实现了对中国问题实践方式的解决^[23]。

第一,以“第二个结合”的互化逻辑塑造文化生命体的有机性。有机性反映了主体内部各部分间和部分与整体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彰显主体的生命力与能动性。有学者指出:“对于文化,我们应该作生命观,需要正视其有机性和自我生长及演化的能力。”^[24]“第二个结合”的互化逻辑正是生命观的体现,是塑造有机生命体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精神命脉,二者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魂脉”和“根脉”。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新时代的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活力。同时,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二者的结合逻辑要求以深刻的融合互化、互相成就形成超越个体的新的整体,并在贯通古今文化、汇通中外文化中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纳入自己的“生命活动”,形成多元一体的有机整体,不断熔铸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形态。

第二,以“第二个结合”拓展文化的创新空间,推动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建构。创造性是文化生命体的活力体现,是文化主体性能在历史演进中得以存在、发展的动力保障。创造性因体现了对现实的超越,成为主体能动性的高级表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身应被视为一个创造的过程,因循守旧、脱离时代的文化注定丧失活力。习近平指出:“‘结合’本身就是创

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18]“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方法论的高度拓展了文化的创新空间,为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建构输入了动力。“第二个结合”的互化逻辑、包容机制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场域。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积极探索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在全球视域的人类文明中吸收内化优秀文化资源,不断孕育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通过文化创新推动文明更新,打破西方现代化框定的文明发展窠臼,铸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生命体,探索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李文堂.“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24(7).
- [3]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42.
- [4]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 [5]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2013(10).
- [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23-24.
- [7]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长沙:岳麓书社,1998:7-8.
- [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1.
-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1]张之洞.劝学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1.
- [12]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60.
- [13]王中江.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增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96.
- [14][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M].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60.
-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 [16]冯契.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1).
- [17]吴文新.公道民本: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本体基础[J].孔子研究,2023(5).
- [18]姜逸.推进“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访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J].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2(1).
-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52.
- [20][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M].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8.
-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5.
- [22]何中华.文化“两创”方针与文化主体性[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1).
- [23]陈方刘.“两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J].思想理论教育,2023(7).
- [24]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26.

责任编辑:祝远娟

契合性与启示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统战工作耦合探析

孔 聪

(中共济宁市委党校,山东济宁 272000)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积累了数千年的宝贵财富,具有深厚的底蕴、独特的魅力,展现出顽强且旺盛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统战思维,“大一统”的民族心理、“团结联合”的优良传统、“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等与统一战线高度契合。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智慧,实现耦合创新,助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战工作;契合性;启示性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07

[中图分类号]D613;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48-06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强调“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统战思维,其中的一些思想与统一战线高度契合。新时代统战工作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智慧,实现耦合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一、契合性:统一战线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大

一统”的民族心理

“大一统”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统一和稳定、反对分裂和动荡,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大一统”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这句话揭示了“大一统”的核心理念,即政治上统一的重要性,政令统一方能确保国家稳定。儒家创始人孔子虽未明确提出“大一统”,但其思想主张一直围绕于此,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3],就深刻表明了对国家权力集中和统一的追求,为“大一统”理念奠定了基础。孟子提出了“定于一”^[4]的论断,宋朱熹注曰“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4],将其中“一”释为“合于一”,即统一天下。荀子认为“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而服”^[5],也强调了“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西汉董仲舒对“大一统”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并最早对其进行了系统论述,“《春秋》

收稿日期:2024-06-17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2023-TZZX-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孔聪,男,中共济宁市委党校统战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中华文化。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6],道出了“大一统”是天地间之常道、古今均适用的永恒规律。秦汉时期国家一统,使“大一统”实现了从政治理想到政治实践的转变。秦汉以降,历代统治者均以“大一统”为首要政治目标,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可见,“大一统”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统一,为中华民族长期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习近平指出:“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7]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亘古至今追求统一的民族心理。在这种民族心理影响下,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体现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见,从历史逻辑来看,“大一统”的民族心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底色。

(二)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文化基因:“团结联合”的优良传统

“团结联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中国历史及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团结联合”思想强调为实现共同目标或共同利益,团结一心、相互合作、凝聚力量,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共同解决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历史上,关于“团结联合”的典故非常多,“合纵连横”就是其中的代表。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纵横家苏秦先后游说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共同对抗强秦,即“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8](“从”通“纵”)。由于六国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张仪用离间之计游说各国,使得合纵抗秦转变为联合亲秦。秦在西方,东西相连便为连横,即“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9](“衡”通“横”)。回顾历史,抛开成败不论,单从“合纵连横”可以看出团结联合力量之大,是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团结联合”思想的名言亦有不少。孟子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0]北宋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9],同心且互相帮助,并能做到始终如一者,就是君子可以

结交的朋友。另外还有“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10]、“上下同欲者胜”^[11]等名言,均凸显了团结联合的重要性。

习近平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12]通过大团结大联合,以求得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实际上,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团结联合”思想一脉相承的,目的都是为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因此,从历史传承上看,大团结大联合的提出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是赓续文化基因的重要体现。

(三)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文化基因:“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

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和谐的状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个人内心的和谐等。体现和谐的“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价值观念构建,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庸》里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3],表明了“和”是普天之下通行的规则和标准,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合”的民族心理。和合思想主张“和而不同”,源于《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3]。它强调事物之间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由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事物才能和谐相处,并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劲动力。左丘明在《国语·郑语》中有言,“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13],是说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就不能称为美妙的音乐;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美感可言;如果只有一种味道,就不能成为美味佳肴;如果只有一种事物,就不能进行比较衡量。这句话强调的是事物要和合共生,而非单纯要求万物同一,否则就不能实现创新发展。此外,《礼记·中庸》中也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3]意为世间万物共同生长而不互相伤害,各种准则同时进行而不相互违背。这句话深刻表明了宇宙之间的包容精神,体现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品格,彰显出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不仅是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也是现代社会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应当借鉴的智慧。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一致性是统一战线的前提和基础,多样性则是统一战线的特点和优势,两者是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重要原则体现了对“和而不同”这一传统文化理念的深刻理解及创新运用,旨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四)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文化基因:“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重义轻利”是儒家重要的伦理思想,核心内涵是重视道义而轻视利益,认为“义”是为人处世的标准和要求,必须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孔子在《论语·里仁第四》中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1]君子遵守道义而小人热衷逐利,当面临道义还是利益的选择时,君子会毫不犹豫选择道义,小人则唯利是图、弃义从利。西汉戴圣在《礼记·儒行第四十一》中也说,“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3450],强调面对利益诱惑不改道义本色,面对生死抉择不改气节操守,足见对“义”的重视。当然,儒家对待义利的态度并非简单的“存义去利”,而是将两者的主次关系进行了规定,也就是先义后利、以义为先。当义利关系发生冲突时,必然要把义放在第一位。正如孔子所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317],但一定要“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331]。只有在符合道义的时候,谋求利益才不会被别人厌恶。孟子也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3105],进一步强调了重义轻利的人生态度。荀子也秉持重义轻利的观点,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5142]。“重义轻利”思想塑造了一种以道义为先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为后世所推崇,形成了中华民族以义为先的处事风格。

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原则。在统战工作中,我们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时刻关注他们的需求和关切点,通过平等协商与合作推动共同事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共赢的美好局面。实际上,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重义轻利”思想所强调的以义为先、义利相兼、互利共赢的价值取向是相通的。可以说,统战工作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与传统的义利观存在契合点,可以从中汲取一定的智慧力量。

二、启示性:统战工作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力量

(一)传承“大一统”思想,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是这一理念赖以形成的思想源泉和文化根基,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大一统”思想强调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相契合的。传承弘扬“大一统”的精神,激活并延续其生命力,同时将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和共同繁荣。一是加强教育引导。通过专题讲座、学术交流等形式,系统阐释“大一统”思想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使统一战线成员强化对“大一统”理念的认知。可组织统一战线成员到历史纪念馆参观学习,从具体历史事件中感悟“大一统”思想的魅力,从而加深对国家统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性的理解,增强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责任感、使命感。二是加强媒体宣传。精心创作一批体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内容的短视频、动漫、微电影、歌曲等作品,通过电视、广播等各类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道,利用艺术作品的影响力传播“大一统”思想。此外,还可以在网络平台主动设置关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议题,引导统一战线成员积极参与讨论、充分发表观点,进而塑造正面的网络舆论环境。三是加强多元文化交流。强化历史传承,开展以中国传统节日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充分利用好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突出这些节日在促进民族团结和厚植家国情怀中的重要作用,增强统一战线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积极举办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例如民族服装秀、民族美食节、民族音乐节等,组织、吸引多民族共同参与,鼓励不同民族的民众分享本民族的

特色文化、特色习俗,增进对不同民族文化的认知、理解和尊重,从而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1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传承和弘扬“大一统”思想,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切实增进文化认同,“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5],从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发扬“团结联合”精神,做好大团结大联合工作

“团结联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如家庭中的友爱互助、工作中的团队合作、社会中的凝心聚力等。“团结联合”思想在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工作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习近平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16]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团结联合可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大团结大联合是统战工作的永恒主题和本质要求,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为治国理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当前的统战工作要传承好“团结联合”思想,凝聚各方面力量,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画好新时代的“同心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团结联合”思想在实践中注重谦虚有礼,这也给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工作一定启示。一是态度上要谦虚。虚怀若谷的态度是实现广泛团结与合作的重要前提。统战工作者在与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等交流时要善于倾听,保持耐心和谦逊,鼓励各方代表畅所欲言。统战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多个方面,这也决定了统战工作者要不断加强学习,加快知识更新、破除本领恐慌。统战工作者要虚心向各领域、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请教,了解并掌握其基本情况,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同时,要真诚地接受民主监督,虚心接受批

评和建议,这样才可以更加真实有效地吸纳社会各界的反馈,更好地促进政策的完善,从而使统战力量团结得更加紧密。二是方式上要有礼。以礼相待是确保统战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在与党外人士交往时要坚持礼貌原则,宽厚待人,做到尊重对方、礼待对方、坦诚相见,切不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要真诚对待党外朋友,团结联合的过程中要用真心、付真情,注重民主协商和对话,做他们的知心人、贴心人,这样才能实现更广泛的合作和共赢。此外,联谊交友要注意方式方法,例如安排联谊活动时要优先考虑他人便利、变坐等上门为主动登门、联谊交友后保持联系等,让对方感受到诚意与尊重,为团结联合打下坚实基础。

(三)秉承“和而不同”理念,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和而不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它强调“和”为事物的根本,但允许存在差异。这一思想对统战工作中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也有重要启示。习近平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17]在这段论述中,习近平提出了“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重要论断,探究其根源可以发现,“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本质上和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是一致的,是“和而不同”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运用。我们在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时应从“和而不同”思想中汲取智慧。统战工作讲究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这不仅是基本原则,更是智慧和策略。“和而不同”首先强调的是“和”,即“求同”,追求和谐共处。这就意味着在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时,应积极寻求各方利益的共同点,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其次,“和而不同”也强调“不同”,即“存异”,体现为尊重和包容差异,减少因差异而产生的摩擦,增进理解和信任。这就意味着在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时,不应一味求同,要尊重独特性和差异性,鼓励多元化发展,努力营造互相尊重和包容差异的社会环境。广大统一

战线成员是多元主体,他们在思想观念、利益诉求等方面肯定存有差异。在开展统战工作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和包容差异,不能搞一刀切、不能强加观点和意见。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2]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处理。对于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比如国家战略、民族复兴等方面,各方都要积极参与,坚决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在处理统一战线具体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各方的意见和诉求,避免因意见不同而导致矛盾激化。通过加强交流和沟通协商,采取灵活的策略和方法,以求得最大共识。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思想的浸润下,统一战线能够更好凝聚共识,更好地助推经济社会稳定、繁荣发展。

(四)践行“重义轻利”思想,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

“重义轻利”作为儒家重要的伦理思想之一,主张追求利益时要以道义为先。统战工作的核心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至关重要。只有如此,才能激发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为做好这一工作,可以从“重义轻利”思想中汲取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16],同时强调要“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16]。正确义利观是一种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习近平非常重视坚持正确义利观,指出“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18]。可见正确义利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遵循。

首先,从“义”的层面来看,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应引导统战对象以道义为先,引导他们的工作中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一是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宣传和教育,使同盟者深刻认识到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认识到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是优先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国富则

民富,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个体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二是树立大局观念。引导同盟者牢固树立大局观念,考虑问题、提出建议应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做到坚决服从和服务大局。鼓励他们时刻关注并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力争做到站位高、视野广、格局大。三是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激发同盟者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他们认清自己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加积极地履行同盟者的社会责任,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彰显出国家大义、民族大义。

其次,从“利”的层面来看,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意味着要充分理解同盟者的利益诉求、充分保障同盟者的合法权益。一是加强利益协调。要持续关注并协调好各方利益,通过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利益分配机制,切实维护好同盟者的权益。同时要提供必要的支持保障,在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和人才支持等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切实解决好同盟者的实际困难,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投入经济社会建设。二是共享发展成果。处理好与同盟者的关系是统一战线延续和发展的前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盟者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推动了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进步,也为社会的繁荣稳定贡献了力量。因此,同盟者理应共享发展成果,这既是对他们努力付出的认可,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应确保同盟者享有政治领域的参与、经济领域的合作、社会领域的保障、文化领域的交流、法律领域的保护、教育领域的培训等权利,切实增强同盟者的归属感和满意度。三是促进互利共赢。互利共赢是统战思维的显著特点,强调在与同盟者的合作中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同盟者的利益,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可从积极寻找与同盟者的共同点、共同目标和共同的利益关切出发,将同盟者的力量凝聚到共同事业上来。通过相互合作、相互支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措施,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共同应对挑战、共谋发展机遇,最终与同盟者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结语

习近平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1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它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突破,更是实践中的行动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邃的思想体系,其中蕴含的统战思维为统战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智慧资源和精神支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将其融入统战工作的具体实践,助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N].光明日报,2015-12-31(1).
- [2]春秋公羊传全译[M].梅桐生,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3.
- [3][战国]孟子,等.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4][宋]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8.
- [5]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 [6][汉]班固.汉书[M].赵一生,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801.
- [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 [8][战国]韩非.韩非子译注[M].张觉,等,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06.
- [9][北宋]欧阳修.欧阳修小品[M].安越,选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108.
- [10][汉]刘安.淮南子[M].[汉]许慎,注,陈广忠,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70.
- [11][春秋]孙武.孙子兵法[M].骈宇騫,王建宇,牟虹,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1.

- [12]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光明日报,2022-07-31(1).
- [13][春秋]左丘明.国语[M].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304.
- [14]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N].光明日报,2019-07-17(1).
- [15]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光明日报,2022-03-06(1).
- [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前线,2022(11).
- [17]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光明日报,2015-05-21(1).
- [18]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09-10(7).
- [19]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光明日报,2014-03-28(2).

责任编辑:刘菊香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路径与运行机制

许奕锋^{1,2}, 曹璐²

(1.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01;2.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应立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理念价值为内核要求,进一步拓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路径、优化自身的运作机制,充分彰显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性。要立足完善政治制度体系、优化体制结构、创新方式路径等,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关系、政党制度内部的构成要素、制度功能与优势的实践场域等方面出发,深入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各项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相互融合,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实现与现代国家治理效能提升。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理性;实践路径;运作机制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08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54-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28}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1]28-2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遵循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彰显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具有独特且鲜明的运作机制和制度优势。新

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立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价值理念为内核要求,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创新,更好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制度优势,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更加成熟和完善的政治制度保障。

一、立足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理性

在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看来,任何行为都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包括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组织和制度。基于这一认识,韦伯将所有的行为划分为

收稿时间:2024-08-13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J017)。

作者简介:许奕锋,男,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统一战线理论;曹璐,男,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

理性行为或非理性行为,并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构成人的理性行为的两大要素。所谓工具理性,指的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精心选择某些有效的手段,看重的是行为的目的而非行为本身的价值;相对而言,价值理性则看重行为本身的精神和价值,而不计较其后果^[9]。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意义,体现在中国新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主动选择的制度安排,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所形成的和谐政党关系,蕴含着合作、协商、参与等基本精神内核。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萌芽、形成、发展并逐步完善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等目标的伟大政治创造,同时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服务国家建设、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259}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生活领域,人民对于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以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想法意见的意愿愈发强烈。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保障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表达和民主诉求,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支撑和动力源泉。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4],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兴旺发展、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13]26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在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

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上独具特色和优势。这一制度既尊重了多数人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诉求,既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维护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具体利益,广泛吸纳了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意见和要求,有效调动了社会各方面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现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体现奋斗目标的一致性、促进决策施策的科学性、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发挥好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1]10}。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推动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3]260-261}。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贯彻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中,需要从“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角度出发,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的制度结构与其他政治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相互融合。同时,也需要从“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逻辑角度出发,立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际作用领域及其制度建设实践,使其充分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内核,更好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理性。

二、立足于完善政治制度体系,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性功能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

社会整体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其组成部分虽然会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6]我国政治制度总体结构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这一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制度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并与其他制度结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譬如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体、政体的结构性关系中,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主体之一,各民主党派通过制度化渠道进入国家政权组织,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实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我国政体、国体的有效衔接与融合。这不仅使得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充分代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彰显了广泛代表社会各阶层群众具体利益的制度价值,还体现了人民内部各社会阶级联合专政的要求,展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基础上的广泛性和真实性^[7]。又譬如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爱国统一战线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民主党派工作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和作用得以更好发挥的重要基础和实践支撑。在国家治理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做好民主党派工作,对各民主党派“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予以支持和保障,不仅为他们有效政治参与提供必要便利,还大力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帮助其解决编制、经费、干部培养等问题^[8]。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之间是相互嵌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构关系。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要考虑其制度自身的功能作用和价值特点,还要考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制度体系中的作用和优势,更好地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相关影响、相互支撑的结构性功能。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在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

民主渠道”^[9]。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贯彻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中,优化其结构性功能,需要立足于完善政治制度体系,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各项作用机制与其他政治制度的有机衔接、相互配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深入发展。不难理解,制度的作用机制是其本身的具体实现方式,是其制度理念在现实层面的实践表现,也是该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现实载体。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而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等都是其作用机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同时也分别是协商民主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统一战线工作体系等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在协商民主体系中,政治协商更多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主要讨论关于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建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与统一战线相关的其他事项;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民主监督主要是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具有共识性、合作性特点;在统一战线工作体系中,合作共事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合作共事,这也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重要基础。显然,在协商民主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体系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和独特功能。

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最为根本的原则遵循。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秉持人民民主的价值和理念,首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和完善上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体系,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统筹推进政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确保政治协商、多党合作等各项工作的有序衔接和稳步推进。与此同时,完善政治制度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相关制度的有机衔接、相互融合。以民主监督为例,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要结合民主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性质定位,将民主监督置于整个监督体系中进

行系统谋划,实现民主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在信息、资源、程序、成果等方面相互配合、协同发展,推动构建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的联动机制,实现民主监督与人大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的优势互补,以整体提高民主监督实效^[10],更好地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三、立足于优化体制结构,理顺政党与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三维关系

体制结构是用以规范制度关系的各项具体规则和程序的总和,是制度内部各要素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主要包括结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运作机制及其相应制度规范、组织形式及其体系三个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主体之间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运作机制主要包括政党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合作共事以及组成这些实现形式的各项具体制度及其规则和程序;组织体系则主要是指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政协组织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体制结构为政党关系建构和优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规范,并确保了制度本身的有效运转。显然,要进一步理顺政党关系,离不开体制结构的完善与发展。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制度内部的体制机制相互关联、互相作用,构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落实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中,需以优化制度体制结构为着力点,健全各项制度机制,并推动形成一套相互协同、有效联动、有机衔接的制度体系,从而更好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

“政党制度的实质在于不同政党之间以一定的程序方式和制度规范,构成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同国家政权之间、政党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不同的政党关系结构形成不同的政党制度。”^[11]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需要妥善处理好在规范不同政党关系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关系结构。在政党与政党关系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摒弃了西方政

党间相互对立、相互拆台的政党竞争模式,选择了以合作、协商为基础的多党合作模式,在政党与政党之间建立了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使各个政党共同都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基于协商共识展开一致行动,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思想上的同心同德、目标上的同心同向、行动上的同心同行,维护了政党间的团结和谐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在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没有选择各政党通过竞争选票轮流上台的方式,而是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这一模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实现了各民主党派有序的政治参与,使政府的施政既能立足当下,又能规划长远,既能着眼局部,又能整合全局,有效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优化了国家治理。在政党与社会关系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强调一致性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包容多样性。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各民主党派则代表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反映和表达所联系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通力合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广泛代表了各方利益,有效汇集了各方意志,充分整合了各方力量,实现了广泛的利益代表与有效的社会整合。

概言之,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规范政党与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上独具特色,呈现出合作、参与的特点,要将这些制度特点和优势具体地、现实地反映到国家和人民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赖于进一步规范这些结构性关系的体制结构。习近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12]。目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体制结构具有多个逻辑

层次,主要包括宏观的基本制度、中观的基础性制度、微观的具体制度,以及制度运行的保障制度。基本制度主要是指宪法、党章、法律、纲要等体制性安排,如多党合作制度、统一战线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等;基础性制度主要是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机制性安排,如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会议制度等;具体制度主要是指各种具体的对策、程序、方式,保障制度则包括时间保障制度、物质保障制度、经费保障制度等。这个体制结构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基本的制度规范,即有效规范了我国的政党关系结构和政党政治的运行机制。显然,要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理顺纵向层面和横向层面的制度结构,推进其体制结构的优化和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贯彻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中,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部各项体制机制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进而形成一个联结紧密、系统完整政党制度体系。

四、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治理效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2]。国家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国家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种职能^[13]。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在根本上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其内部的各项法度都反映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从社会中产生的力量又客观上承担着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政治统治方式也逐渐由单一政府管理转向社会多元治理。与政治统治相比,国家治理在权力的主体、性质、来源、向度和作用范围都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国家治理更希望实现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使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实现“善治”^[14]。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强调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了坚持

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目标^[1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于协商合作的包容型政党关系,在各种政治活动中遵循民主化、科学化、协同性逻辑,在价值认同领域建构了嵌入国家治理之中的政党政治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供给^[16]。

“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必须准确把握制度自身属性与治理效能提升的契合点,进而才能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补齐制度短板,发挥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17]在国家治理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其政治效能、共识效能、整合效能及制度效能发挥着定向、善治、聚力和规范的制度优势和制度功能。推动制度功能向治理效能转化,需要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进一步作用于国家治理所涉及的具体场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心任务^{[18][18]}。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8][18-22]}。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则理念与本质要求,围绕国家治理中的各类实际问题,进一步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治理效能。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治理呈现出多元化、理性化、现实化等特点。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和追求,需要一直贯穿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际运行之中,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治理的政治效能、共识效能、整合效能和制度效能,坚定政治方向、化解社会矛盾、聚合社会力量、规范资源利用,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第一,要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效能,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崭

新的发展道路,与既有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迥异,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充满挑战。前进道路上必然会有风险、问题和困难,这就愈发需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敢于挑战困难、解决难题的勇气和能力。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效能,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发挥广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智力优势,明确发展方向,坚定发展信心,有助于勇敢面对并有效解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各项难题。第二,要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共识效能,协调不同利益关系,有效化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涉及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重大工程,存在不同层面的利益结构调整和社会关系变化,对人民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极大影响。这就需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其所联系的社会群体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认同,消除不同社会群体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分歧,广泛凝聚共识,增进信任。第三,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合效能,有效聚合不同社会力量,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合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之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这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合效能,有效整合各种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广泛汇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智慧和力量。第四,要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系列有序的制度规范。譬如在政治规范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实践提供了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参与平台,能够将不同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有序纳入决策程序并将不同社会力量有序纳入政治体制,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化的政治吸纳和政治安排。

五、立足于创新方式路径,规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方式路径

民主是一种价值理念,实现这一价值理念有多种途径。在追求民主价值和践行民主理念的过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探索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型民主形态,实现了内在民主精神与外在民主制度的有机统一。民主的价值理念需要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可行的参与实践,才能使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地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发挥也需要依赖一定的实践形式。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已形成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履职实践形式,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拓展形成以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形式,以专项监督、视察监督、会议监督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形式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担任不同职务、积极发挥作用的参政形式。这些实现形式在不同层面上规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明确、具体地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参与实践,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政权和社会建设提供了规范化的渠道和途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和各项制度机制的日趋完善,我国的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思想观念正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随之不断增加,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凝聚政治共识的难度日渐增大,这就更加需要立足于方式路径的创新,更好地发挥新型政党制度功能和优势。不难理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更好建构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拓展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理论是行动的先导,需要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式,寻求思维方法上的突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理念为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方式路径创新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新的思路。第一,坚持过程民主与成果

民主相统一。“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3]258}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优化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方式路径创新中最基础的一环就是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始终以提升制度的治理效能为出发点,从制度落实的实际成效来反思和创新制度机制。如在政治协商创新方面,应当注重协商成效,结合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智力优势和人才优势,有效整合协商资源,运用富有成效的协商形式,真正在“深入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上下功夫,推动协商过程与协商成果的有机结合,确保协商成果扎实有效。第二,坚持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坚持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就是要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际运作中,更加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其所联系社会阶层、群体的实际体验,关心、照顾他们的感受,而非只是从程序、形式上考虑这一制度是否运转、规则是否得到执行。第三,坚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统一。通过政党组织参与政治生活只是我国实现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除此以外,人民群众还能通过参与基层选举、基层协商等途径参与政治生活。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方式路径创新,需要考虑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社会阶层、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方式,充分挖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联系人民群众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结合所联系群众政治参与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参与模式,以使政党的政治参与同其他方面的政治参与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第四,坚持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相统一。人民当家作主首要前提就是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并使之有效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方式路径创新,积极发挥各民主党派联系广泛的优势,创新并优化服务群众的方式方法,提升其反映所联系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代表在其履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如何把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需要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找到正确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3]258}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贯彻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中,发展与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方式路径,同样需要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以进一步规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工作。细言之,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是指在系统总结过往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制度建设实践,推动制度的发展创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是指将人民民主的理论基础与当下国家建设的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社会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并运用创新指导社会实践;注重形式和内容相统一,是指以更好反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内容和价值特点为目标,推动实现其制度形式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于表达自身观点和意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这为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其独特的实践路径,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遵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逻辑和发展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制度的发展亦是如此。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研究视域探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路径与运行机制,也是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进行的,旨在解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此同时,需要基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涵的价值理念、方式方法、渠道路径等,拓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的包容性及其关联的制度体系建设,更好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制度效能和制度优势,不断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
- [2]王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J].甘肃社会科学,2005(1).
-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8.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8-20.
- [6]刘润忠.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J].天津社会科,2005(5).
- [7]姚建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体系视阈中的多党合作制——兼析多党合作制与国体、政体的关系[J].观察与思考,2013(2).
- [8]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9.
- [10]沈毅.政协民主监督与党内专责监督协同机制构建:一个营商环境的场景应用——以大连市为例[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1).
- [11]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7).
-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89.
- [13]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46.
- [14]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
- [1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1.
- [16]艾明江.嵌入型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家治理——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经验[J].理论

与改革,2019(5).

- [17]刘志礼,魏梓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优势及效能转化[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6).
- [18]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责任编辑:刘菊香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

方 焯,刘艳云

(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摘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话语创造。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推进政党制度话语大众化、提升制度自信与认同的客观要求,是破解话语霸权、塑造良好形象的战略要求,是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世界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眼话语的构成要素,解决好构建中“谁来谈”“对谁说”“说什么”“如何说”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实践进路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09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62-07

习近平高度重视政治安全,明确要求“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1]。政党政治作为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应运而生并日益成熟定型,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理论,超越了西方竞争性民主的政党建构逻辑,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合作型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向,践行了党际合作治理的实践方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显著的政治优势,成为“中国之治”的运行基础与底层逻辑。然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的“围剿”下相对“失声”,其显著的治理优势难以

充分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此外,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的研究起步偏晚,研究有待深入,仍存在实践先于话语建设、制度话语根基不牢、话语自信不足、话语体系建设保障缺位等问题。对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亟待重塑。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深入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现实境遇,探讨话语体系构建的创新路径,对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与制度认同,提升制度治理效能,丰富和发展世界

收稿日期:2024-09-02

基金项目:2024年度浙江省党校系统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课题(ND24128);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规划课题(23NDJC434YBM)。

作者简介:方焯,女,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教务二处讲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刘艳云,女,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层治理。

政党政治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

(一)历史逻辑:中国近现代政党政治探索与实践

清末,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引入,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具有政治诉求的组织,如光复会、同盟会等,它们对于民主与政党制度的探讨,促成了中国近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形成。民国初年,我国政党制度的探索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由于内外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各种利益冲突,其时的多党制实践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效,政局动荡、政党纷争严重。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革命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局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互相帮助、精诚合作,孕育了政党合作的思想,并积累了丰富的政党合作实践经验,协商成立了新中国,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格局^[3]。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等职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适应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方面不断完善和创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系列措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规范化的制度机制。这一阶段,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制度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完善政治协商机制、增强民主监督功能、加强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4]。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独特的理论内涵、理论渊源、理论特质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全面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个理论框架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障。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作了进一步深化,他在《政党与国家》一书中强调了政党的先锋队作用,认为政党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还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列宁关于政党的理论特别关注政党的组织结构和党员的革命精神,主张党必须具备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便有效实施其政治纲领。这一理论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并加以实践,通过建立坚强的党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制度,确保了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5]。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立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政治格局,不仅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也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提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不断深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解。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

好同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要求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高度包容性和有效性。

(三)实践逻辑:党际合作治理的实践方案

政治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实践机制。政治协商不仅是各党派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机制,更是一种系统化的治理形式,它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平台,实现了不同政治力量的有效对话。在政治协商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可以就国家政策、社会事务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和建议。民主监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项功能,也体现党际合作的价值内涵。民主监督机制通过赋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权利,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机制^⑨。这一机制使得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能够接受各方的监督和建议,确保了中国共产党、政府行为的透明性和规范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监督,能够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实施进行评估,提出改进意见,从而促进了政府工作的完善和优化。参政议政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党际合作的重要实践形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除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外,还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各民主党派不仅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意见,还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和社会事务管理。因此,基于党际合作治理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与协商的方式充分整合多方利益,规避党际竞争的资源内耗,有效达成政治共识。党际合作治理的实践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独创性和独特优越性,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逻辑。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意蕴

(一)推进话语大众化,提升制度自信与认同的客观要求

制度自信是人民群众对自身政治制度的认可和信任,它不仅依赖于制度的理论优越性和实践成效,还受话语传播的影响。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全新政党政治模式,有着独特的优势与强大的生命力,是坚定制度自信、提升制度认同的重要制度模式。为了增强大众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应确保这一制度的核心理念和实际操作能够被广泛理解,使广大群众能够清楚认识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和价值,形成对制度的认同和支持。话语大众化有助于提升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当制度的理念和实践能够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传达,才能够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形成对制度的认同^⑪。通过在媒体、教育、公共讨论等渠道中推广和普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相关话语,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和认可这一制度的价值和贡献。在日常生活中,人民群众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感增强,有助于促进制度的稳定和发展。大众化的话语体系,可以使人民群众在日常的社会互动和公共讨论中,形成对制度的自然认同,从而增强制度的社会基础和支持力量。

(二)破解话语霸权,塑造良好形象的战略要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实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利与权力的统一,是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集中展现,更是对国际社会已有政党制度的新贡献。然而,目前我国强大的制度优势并没有转换为相应的国际话语权。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占据国际政党政治领域的绝对话语权,以西方政党制度标准质疑和诋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打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发展。破解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要求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主动发声,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同时对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误解和偏见进行有效回应。通过讲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成就及其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贡献,形成自信且有力的国际话语。国际舆论中存在的各种偏见与误解,主

要源于民众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片面理解,可通过主动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动实践,包括其在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实际效果,可以有效地修正外界的误解,塑造一个真实的、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象⁹。破解话语霸权还需要中国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话语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主办国际会议以及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对话等形式,主动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这不仅能够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了解,还能够生动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三)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世界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科学化、制度化的治理体系,使国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各个环节更加高效、透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目标是通过有效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机制,提高国家治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¹⁰。通过健全的决策机制,确保各方意见能够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反映,从而增强政策的公正性和适应性。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成功的治理范例,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应对复杂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效能。这不仅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还能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国面临共同的挑战和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高效的治理实践,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推动全球政治文明的进步¹¹。

三、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确立至今,在制度层面已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逻辑。然而,在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仍面临较大的话语挑战。如何立足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重大

课题。

(一)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的机遇

1.“东升西降”的时代大势带来重要机遇。从当今世界格局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出现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塑造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近年来,“全球力量分布基本格局的转变,全球政治觉醒的新现象对这种力量的运用所带来的影响,再加上近期美国外交政策举措和美国体系的生命力所受怀疑日益增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国际地位日渐式微¹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的盲从时期、畏惧时期已经结束,在伸张自己文化价值的同时,拒绝西方‘强加’的文化价值”。“东升西降”的态势对世界的经济和发展,包括政党制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在经济危机、新冠疫情等世界性事件中表现出明显的“制度瓶颈”,引发被输出国家对西方政治体制科学性的质疑与反思。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表现出了“代表利益的广泛性、制度文化的包容性和民主决策的高效性”¹³,为世界政党政治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加快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将更好地传播和分享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方案。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成就奠定话语底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的弊端,包括恶性的党际竞争、多党轮流坐庄等;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因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或集团利益导致的社会撕裂,实现了政党关系的革新,超越了以往政党之间零和竞争、松散联结的关系样式,创造了一种紧密合作的政党关系新格局。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制度安排,畅通和拓宽了利益表达渠道,广集民智,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取得的巨大成

就,充分展现了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为中国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充足的底气。

(二)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面临的挑战

1.话语本体研究有待进一步强化。相比于西方成熟的政党制度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起步较晚,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滞后于实践,在理论发展和完善上仍存在不足。首先,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存在单纯摘录和粘合关于多党合作的文件、重要领导人讲话等话语作为文章脚本,在此基础上稍作些许学理化修饰,就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现象^[4]。实践中存在理论与实际结合困难,理论指导能力有限等问题。其次,研究的规范性不足,更倾向于政策性宣讲。在学术思想、学术标准、学术话语、学术观点等方面无法实现与西方政治话语学术研究的对接、回应与互动。封闭的理论自洽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难以有效破解学术难点与堵点,难以实现话语创新以有效应对世界政党政治的新变化。再次,在研究力量上,普遍存在研究队伍力量分散、研究平台有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缺乏等问题,难以有效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新理论、新范畴。

2.话语主体协同有待进一步加强。话语主体是话语体系构成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包含了多元话语主体,既包括不同政党、理论研究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等,也包括政府部门、媒体、社会组织、理论研究的社会精英、普通民众等。当前,政党、政府部门、理论研究的社会精英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主流媒体、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此外,不同主体间协同不足,话语主体的系统整体功能未能有效发挥。

3.话语传播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东升西降”的态势虽进一步加强,但“西强东弱”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国家凭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在政党制度问题上依然掌握国际话语霸权。在国际传播格局中,西方国家依靠科技与媒介的优势占据国际传播的主导权。当前,世界90%以上的新

闻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垄断,全球四大通讯社均掌握在这些国家手中。凭借垄断“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输出自己的政党制度理念,美化西方政党制度优势,诋毁与抹杀中国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面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质疑与攻击,中国因理论研究阐释不到位等原因回应力度有限,难以破解“有话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四、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进路

(一)提升话语本体质量,夯实话语根基

提升话语本体质量的核心在于理论创新。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需要建立在充分、深入的理论基础之上,以确保其理论上的严谨性和前瞻性。这包括对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等机制的理论研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关系的探讨等。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话语体系的理论内涵,使其更好地解释和指导实际问题。理论的创新不仅要关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还要预见未来的挑战和发展趋势,使话语体系在长期发展中保持稳定性和适应性。

话语本体的质量还需要通过内容的创新来提升。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这要求话语体系与时俱进,全面把握新的社会矛盾,不断更新其内容以适应新的现实要求。在内容创新方面,首先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公众关切,将这些问题和关切融入话语体系,以反映社会的最新变化和 demand。提升话语本体质量还需要关注话语逻辑的严谨性。话语体系的逻辑结构应当清晰、严密,以确保其在表达思想和指导实践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说服力。逻辑的严谨性不仅体现在话语体系的内部结构上,还体现在与其他政策和制度的衔接上。一个系统化的话语体系应该能够将各种理论观点和实际政策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二)强化话语主体协作,增强话语自信

强化话语主体协作首先体现在各个政党组织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要求不同政党在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宣传中,能够形成合力、统一步调。政党组织不仅

要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达成共识,还要在具体的宣传和推广实践中相互支持和协作。理论研究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的协作也是强化话语主体协作的重要方面。理论研究机构作为话语体系的智库,承担着理论创新和知识支持的任务,而政策制定部门负责将这些理论和知识转化为实际政策。通过加强二者之间的协作,可以确保理论研究成果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政策建议,并在实际操作中得到落实。理论研究机构应当与政策制定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反馈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帮助决策部门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政策。在公共传播领域,加强媒体和舆论的协作也是增强话语自信的重要途径。媒体和舆论平台在话语体系的传播和推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与媒体的紧密合作,可以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和政策信息广泛传播到社会各界,增强公众的认知和认同。增强话语自信的关键在于提升话语体系的内在质量和外在表现。内在质量的提升依赖于话语体系的理论深度、内容丰富性和逻辑严谨性,这要求话语体系不仅能够准确反映国家的政策和目标,还能够有效应对社会和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在外在表现方面,需要通过规范化的宣传和有效的传播策略,确保话语体系能够在公众中形成广泛的认知和支持。

(三)把握话语客体差异,扩大话语受众

国内层面要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特点和需求进行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和复杂的利益诉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差异,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和包容性的内容。地域差异也是把握话语客体差异的重要方面。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各地区在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制定话语体系的内容和传播策略时,需要充分考虑地域差异,制定相应的地方化策略,以确保话语体系的内容能够有效覆盖不同区域,提升其地方适应性和传播效果。

国际层面话语体系的构建也需要考虑全球受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如何在国际传播中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

治理理念,成为扩大话语受众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外宣传中,需要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政治体制和社会习惯,设计具有针对性和文化适应性的内容。通过国际化的传播策略,可以有效扩大话语体系的国际受众,提高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认同度。

(四)创新话语介体手段,提升传播实效

宣传推广的核心在于明确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并将这些核心价值和理念转化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传播内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涉及政治多样性、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复杂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在宣传推广过程中,需要将这些复杂的内容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公众。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传播手段是提升话语传播实效的重要途径。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技术的进步,为话语体系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通过建立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账号等方式,可以实现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广泛覆盖。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具有高互动性和即时性,能够在短时间内将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传播到广大的受众群体。通过数据分析和舆情监测,可以及时了解宣传推广的效果,调整宣传策略,提高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有效的宣传不仅是单向的信息传播,更是双向的交流和互动。通过建立反馈机制,能够及时了解公众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解和态度,并根据反馈进行必要的调整。

结语

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通过对理论深化、实践验证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可以有效提升话语质量。另外,强化主体协作、把握客体差异以及创新传播手段,也是提升话语体系构建实效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N].人民日报,2020-12-13(1).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3]梁晓宇,李文迪.近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述评与展望[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4).
- [4]秦佳宇.“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研究[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3).
- [5]李月玲,王强,刘玲.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动因、挑战及策略[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2).
- [6]许奕锋,王晓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实践拓展与未来跨越[J].观察与思考,2024(6).
- [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8).
- [8]郭定平.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与效能提升路径分析[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3).
- [9]林华山.一体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J].团结,2024(2).

- [10]周述杰,谢薇.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应正确处理好三个基本关系[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2).
- [11]刘玲灵,王伟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研究[J].沈阳干部学刊,2024(2).
- [12][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M].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9.
- [13]史诗悦,钱再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责任——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视角[J].理论导刊,2024(3).
- [14]杨爱珍.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思考[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2).

责任编辑:刘菊香

(上接第28页)

- [1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2015:39.
- [1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14).
-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N].人民日报,2023-03-19(3).
- [22]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

- 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6.
- [23]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EB/OL].(2018-11-26)[2024-06-25].https://www.gov.cn/xinwen/2018-11/26/content_5343441.htm.

责任编辑:张淑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实践论:鉴往与开来

李富强,吕文涵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从民族史的角度看,一部广西地方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广西各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形成了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其本质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是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根基。新中国成立之后,广西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遂行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开创了广西民族团结和睦、经济兴旺繁荣、社会和谐稳定、边疆巩固安宁的大好局面。“五个认同”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不同侧面。新时代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增强“五个认同”为基本方略。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实践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10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69-07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关于党的民族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广西作为全国五个自治区之一,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①。总结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明确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方略,方可继往开来,在新时代开辟新局面、再创新辉煌。

一、中华民族认同: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根基

广西自古就是多民族地区,从民族史的角度看,

一部广西地方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秦之前,广西与中原地区虽有往来交流,但基本处于自主发展的状态。商周至东汉时期,在今中国岭南地区和越南北部,分布着一个古老的族群——骆越。罗香林在《百越源流与文化》中指出,这是该时期广布于中国南方且“各有种姓”^②的“百越”的一支,曾经创造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灿烂文化。比如,骆越很可能是稻作农业的发明者。2011年,中科院科研团队采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1000多份栽培稻和400多份野生稻进行研究,通过全基因组遗传背景的比较分析,证明栽培稻起源于广西境内的珠江流域,祖先为广西普通野生稻^③。这一研究成果印

收稿日期:2024-05-28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批八桂学者“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研究”岗成果。

作者简介:李富强,男,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华南—东南亚民族历史人类学;吕文涵,女,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华南—东南亚民族历史与文化。

①《汉书·地理志》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证了我国水稻农业专家丁颖先生关于水稻的华南起源说,也为骆越人发明稻作农业的观点提供了佐证。骆越先民在认识和利用野生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对稻谷的驯化和栽培技术。广东英德市云岭狮石山牛栏洞出土的“原始人工栽培水稻硅质体”^[3]、湖南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玉蟾岩文化遗址出土的普通野生稻和古栽培稻类型的谷壳遗存^[4]、广西资源县延东乡晓锦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5]、广西那坡县感驮岩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炭化粟^[6]等,都为探讨骆越地区稻作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此外,骆越还创造了大石铲文化、铜鼓文化和举世闻名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在广西左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岩画绵延 200 多公里,共有 79 个岩画点,178 处 280 组岩画,其中规模最大的宁明花山岩画,宽约 200 米,高 5.60 米,有图像约 2 000 个,其中一个最大的人像高 2.4 米,令人叹为观止^{[7]9-49}。经研究,左江花山岩画为战国至东汉时期骆越人所作^{[7]8-138}。2016 年,由左江流域 38 个岩画点组成的“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8]。

公元前 219 年是岭南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秦挟一统六国之威,用兵岭南,为加强后勤保障,修凿了令后世惊叹不已的灵渠。公元前 214 年,秦统一岭南,将岭南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从此,岭南的骆越与中原华夏—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开始频繁而密切。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设立郡县,留下了大批部队镇守。秦亡汉兴,其间虽有南越国割据,但未阻止与中原交流大势。汉武帝于公元前 112 年灭了南越国之后,岭南与中原交往交流更加顺畅,汉族大规模进入岭南,汉文化与骆越文化在交流碰撞中逐渐交融。东汉之后,“骆越”已不见于古籍之中,渐次以“乌浒”“俚”“僚”代之,演变形成了今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仡佬族等,这都是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的结果。

秦汉以来,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潮流不仅表现在骆越与中原人的交往交流交融

上,更表现在汉、瑶、苗、回、京、彝等民族在古代不同时期进入广西^①,与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仡佬族等共同开发广西的历史上。在此过程中,广西各民族频繁密切地交往交流交融,其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和改造,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汉族文化中,不乏壮族文化的内容。如古汉语称呼“稻谷”为“糍”,就是借壮语。少数民族学习借用汉族文化的例子更多。比如,壮族的土俗字、京族的“字喃”,都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文字。广西各少数民族都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都有龙的崇拜等,显然也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当然,他们在接受这些文化的过程中,也进行了改造。这充分体现了广西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广西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各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本质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因为它标志着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构成并享有中华文化。广西各民族自古以来便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如流传于壮族民间的《布伯的故事》有一个情节:伏依兄妹结婚生下一坨肉球,用刀剁碎后撒到野外。之后,一种衍生情节是与姓氏的起源相联系:肉块如贴在李树上,那村庄的人就姓李;如贴在石头上便是姓石。另一种衍生情节则与兄弟民族的起源联系起来:撒到平原的成了汉族,撒到丘陵的成了壮族,撒到山里的成了瑶族、苗族,撒到森林、草地的成了其他西南少数民族^[9]。唐宋之后,广西少数民族在编纂家谱、族谱时,往往将本族群的历史与中央王朝或汉族王公贵胄联系起来。这些都是他们认同中华民族的具体表现。

广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的文化基因。今天的广西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正是广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基因传承的结果。这也充分说明,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①汉族大规模迁入广西,始于秦始皇发兵岭南时期。瑶族和苗族大概于宋代开始进入广西。回族进入广西,始于宋代,多于明清时期。京族于 16 世纪初叶至 19 世纪末,陆续从现在越南的涂山、春花、宜安、花丰、瑞溪、芒街、万柱、角白等地,迁到广西的万尾、山心、巫头、潭吉等地。彝族则是三国至明代年间从云南、贵州连续迁入广西的。

二、同心共筑中国梦: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10]。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使命不渝。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广西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心共筑中国梦,遂行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开创了广西民族团结和睦、经济兴旺繁荣、社会和谐稳定、边疆巩固安宁的大好局面。

(一)宣传与践行中华民族大团结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从不墨守成规,从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僵化的教条而生搬硬套,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民族大团结理论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之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存在历史悠久,但作为一个自觉的存在则始于近代。1902年,“中华民族”一词诞生,当时其内涵主要是“汉族”^[11],而后才在各种阐述中不断丰富和演变。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开端,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资源。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中华民族”进行接纳、使用和创造性阐释的过程:从仅指汉族到指“正在形成中的近代的民族”“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12]。其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在关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同时,肯定和强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为各民族共同的事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确立^[13]。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确定了全国56个民族的成分,“中华民族”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具体。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和践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理论主张,实行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根本原则的民

族政策。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14]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15]^[66]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指引下,全国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强调:“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15]^[6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理论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蔚成大观。

中华民族大团结理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广西作为多民族的边疆地区,宣传和践行中华民族大团结理论尤为必要。新中国成立前,广西少数民族饱受民族歧视和压迫,当时的统治者不承认他们的民族身份,少数民族同胞也毫无民族自觉。新中国成立之初,广西少数民族常有自己祖先“来自山东”,或是“讲壮话的汉人”之类言论,承认自己少数民族身份者的人极少,因而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极低。在中央向广西派出中央访问团,大力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少数民族人口随之剧增。再后来,党和政府又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和干部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践行中华民族大团结理论,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结果。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广西始终把宣传和践行中华民族大团结理论作为民族工作的基础和核心内

容,始终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不断推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如今的广西,中华民族大团结不仅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更成为一种自觉行动、一种生活方式。

(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周恩来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的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的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立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16]邓小平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17]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让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自主地管理民族内部事务、当家作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在广西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而且先后成立了12个自治县和59个民族乡,给予了3个县以自治县待遇,逐步构建了科学合理的民族区域自治格局。广西始终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基础。

一是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体系。到2023年,广西先后制定(修订)实施了12个自治县自治条例和27个单行条例、67件涉及民族事务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出台了涉及民族方面的系列地方性法规,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平等与团结^[18]。

二是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到2018年,广西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比例达43.3%,高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4.4%,少数民族干部成为民族工

作的重要骨干力量^[19]。

三是坚持各民族共同发展。广西高度重视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着力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充分挖掘发挥江、海、边的优势和潜力,加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帮助协作,全面实施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有针对性地开展兴边富民行动、边境建设大会战、革命老区建设大会战,实施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大会战形式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现了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振兴、从偏远封闭走向开放前沿、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巨变,经济快速发展,民生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持续增强。

(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20]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各族同胞共同维系的社会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广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积极利用逢五或逢十周年庆典、民族传统节日等重大活动集中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争先创优活动常态化,营造民族团结人人有责、民族团结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二是大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开展双语教育,不断创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积极引导各民族共

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使各民族在深入交往交流的过程中,打破界限,消除隔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形成共识,水乳交融。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广西共有163.66万个家庭由两个民族以上组成^[18]。广西“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九口之家、情融五族’比比皆是”^[20]。

三是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大力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今,广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成绩卓著:国家、自治区、市、县4级文物保护单位体系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如兴安灵渠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体系及传承保护机制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有效推进,70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914个项目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壮族霜降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文化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扎实推进,“1+10”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工程全面完成,国家级、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有条不紊地推进,在中国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方面探索并形成了“广西模式”。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讴歌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层出不穷:彩调剧和电影《刘三姐》风靡国内外,全国首部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长演不衰,10多部舞台精品荣获“文华奖”,文学桂冠、漓江画派异军突起,闻名遐迩。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文化产业持续稳步发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城乡,文化惠民活动不断向基层延伸。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灵魂,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极大增强了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增强“五个认同”:新时代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方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戮

力同心,携手并肩,共同努力奋斗。在2019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即“五个认同”,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不同侧面,新时代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必须以增强“五个认同”为基本方略。

(一)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1]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各族人民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才能繁荣富强,民族才有希望,个人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广西作为边疆民族地区,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一方面,要针对广西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国际大通道、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战略支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区位优势,加快边境经济社会发展,改善边疆民众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全方位、多层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和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认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祖国尊严。

(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在历史长河中由众多民族共同发展凝聚而成

的。尤其是“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1]。如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共同历史、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因此,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和各民族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观念至关重要。新时代广西要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一是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的学习教育,让各族人民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从各族人民共同铸就的中华民族史中把握中华民族的优秀特质、良好禀赋和伟大精神,鉴往识来,发自肺腑地热爱中华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摆在首位,珍惜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大好局面;二是一如既往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断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积极引导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使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交流更加深入,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三)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因此,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深层次的内容。要引导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要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情怀;在各族群众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四)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2]13-10}不言而喻,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务。我们要广泛开展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学习教育,使各族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13-14}。“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1]。实践证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决贯彻中央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人民共享发展、共同富裕,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广西的实践证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保证。新时代新征程,要继续增强“五个认同”,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凝聚起建设伟大祖国的磅礴力量,谱写广西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新华章。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 [2]Bin Han, etc. A map of rice genome variation reveals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J]. Nature, 2012, 490.
- [3]中国水稻史推前万多年[N].羊城晚报,1999-12-13(12).
- [4]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N].中国文物报,1996-03-03(1).
- [5]蒋廷瑜,等.资源县晓锦遗址发现炭化稻米——确认该遗址为桂北新石器晚期原始文化[N].中国文物报,2000-03-15(1).
- [6]韦江.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出土牙璋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1(3).
- [7]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 [8]李振唐.花山岩画文化瑰宝正在走向世界[N].广西日报,2016-07-18(7).
- [9]蓝鸿恩.壮族神话简论[J].三月三,1983(1).
-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
- [11]纳日碧力戈.建设中华文化共同体:从互联到共有[J].西部蒙古论坛,2019(1).
- [12]张淑娟.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185-190.
- [13]张淑娟,陈宪章.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与文化自觉[J].广西民族研究,2019(4).
-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N].人民日报,1949-09-30(2).
- [15]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 [16]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8.
-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4.
- [18]广西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EB/OL].(2023-05-30)[2024-04-12].<https://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230530/newgx64760107-21173217.shtml>.
- [19]增进“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EB/OL].(2018-12-09)[2024-04-11].<https://mp.weixin.qq.com/s/kspvbshkicHmCQIQhOLNTg>.
- [20]汪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1(2).
- [2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许立坤

南岭走廊民族迁徙互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颜洁,赵明龙

(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南宁 530022)

摘要:南岭走廊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走廊,历史上这一走廊的民族迁徙呈现出苗瑶族系南迁东进、汉族南迁演化、壮侗语族分化、回族南迁、京族北移等特点,并形成走廊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民族共同体基础。南岭走廊各民族的空间特征、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文明贡献和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南岭走廊;民族迁徙;中华民族共同体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11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76-09

近年来,我国民族学界掀起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热潮,研究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其中也有论及“南岭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果。比如,有学者从南岭走廊多民族族源神话“共祖”“同胞”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研究^[1];有学者从南岭走廊各民族之间的民族互往、经济互通、文化互融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其经验启示^[2];有学者从舜帝南巡与南岭走廊族群及其文化、与南岭民族的交融开展研究,从瑶族族源、体质、语言及南岭走廊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3];有学者从费孝通的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出发来研究南岭与“多元一体”的瑶族^[4];有学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南岭走廊非遗族际共享相关问题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有学者以南岭

走廊过山瑶招郎入赘婚研究族际通婚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6]。通过梳理学术动态发现,鲜见专门从南岭走廊民族迁徙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试从南岭走廊民族流动迁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展开探讨,旨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南岭走廊上的民族迁徙特点

费孝通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分析道,中国“各族人民流动总趋势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入海或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就是在这种迁徙变动中,逐渐融合许多古老民族而逐渐形成的”^[7]。这段话对于今天研究南岭走廊民族迁徙的特点以及南岭各民族的形成原因具有重

收稿日期:2024-08-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项目(2018VJX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颜洁,女,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东南亚纵横》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为中国与东南亚历史文化;赵明龙,男,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与国际问题研究学部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南方民族历史。

要的启示意义。南岭走廊历史上各民族迁徙与流布,呈现出“北人南迁东进、南人西进北移”的多元一体格局。

(一) 苗瑶族系南迁东进

苗瑶族系包括苗族、瑶族和畲族。费孝通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中,在谈到苗瑶族系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什么叫瑶族?瑶族的分布怎样?为什么贵州没有或很少有瑶族?为什么一到广西,苗族就很少了,而且只在北部靠贵州那一条边上?这似乎可以划出一条界线,即北面是苗,南面是瑶。可是一到东头,既不是苗,也不是瑶,而是畲^[8]。潘光旦曾对苗瑶族系提出设想,认为“苗、瑶、畲三个民族在历史上有密切关系,可能是早年从淮水流域向南迁徙的中原移民”^[9]。潘光旦从族名、地名、民间信仰和传说来研究苗、瑶、畲三族关系及民族迁徙的路线,认为这三个民族原来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部分可能就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8]。潘光旦的这一理论假设,为我们研究苗瑶族系迁徙提供了思路,研究发现其思路基本上符合南岭走廊苗瑶族系民族迁徙的历史。研究表明,苗族、瑶族和畲族三族有悠久的“前史”传说,应有共同的祖源,从当地的传说和习俗来看,蚩尤和盘瓠为三族共同敬奉,但苗族多祀蚩尤,瑶畲多崇奉盘瓠。三族中,瑶畲二族更近,苗瑶二族可能在尧舜之前就苗瑶畲三族共同体分化出来,而畲族可能在晋唐时期从瑶畲共同体分化出来,并逐渐向东南方向迁往他地定居^[10]。

苗族祖先最早居住在黄河流域和江淮地区,秦汉至南北朝,“盘瓠子孙”(指苗族,《搜神记》卷一四)主要居住在长沙、五陵、五溪等广大地区^[1184]。北魏、兴光、延光年间,苗族较大规模地向北回落到河南中部,部分苗族(太阳蛮、襄阳蛮等)内附融合到汉族中^[12]。东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多次“征讨”五溪、五陵等地,使得苗族继续由东而西、由北而南流

徙,成为苗族南迁的大趋势^[1185]。唐宋时期,部分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向黔东南、黔西南及滇东北等地迁徙。元明清时期,因朝廷对贵州等地进行军屯、民屯、商屯,在某种程度上致使南岭苗族继续向西向南迁徙。明末清初,苗族逐渐进入滇东的文山、红河二州,清初滇东的苗族逐渐迁入越南,清代后期部分苗族迁入老挝、泰国和缅甸^[13],从而形成了南岭走廊湘西—黔东南—黔南—桂中北—黔西南—滇东南“苗族廊道”。瑶族的迁徙轨迹与苗族很相似。南朝梁时,瑶族先民“莫瑶”居衡阳、零陵,隋代居长沙,唐时居湘江、潭州(长沙)、连州等。宋代,瑶族已遍布广西。“僜,本五溪盘瓠之后。其壤接广右者,静江之兴安、义宁、古县,融州之融水、怀远县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中,椎髻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远近为伍。”又说“僜,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斓布褐。名为僜,而实不供征役”^[14]。这两句话,基本上把宋代各地瑶族的分布说清楚了。清代,瑶族自广西进入贵州、云南。明清时期,不少瑶族“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地迁徙^[15]。关于畲族南迁与东进,主张瑶畲同源的学者认为,“畲族是出于唐宋时代在五岭东端的‘僜人’,而远源于汉晋时代的‘五溪蛮’”^[16]。唐宋时,蛮、瑶混称。他们居住在粤闽边区,繁衍生息,与当地汉族接触频繁,被称为“山峯”、畲民^[17]。隋唐之前,畲族已出现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宋元延伸到福建中部、北部一带,明清时遍布闽东、浙南等地^{[18]430}。畲族迁徙走向是:汉晋时期,畲族的先祖五溪蛮聚居于五溪地区,约在唐初进入粤赣闽三省交界,后聚居于广东潮州府潮安和丰顺两县的凤凰山区,有“山峯”“瑶类”之称记载(“峯”同“畲”同音义)。唐宋后,逐步自今广东潮州出发,经漳州、安溪、福州、连江、罗源,然后分两道向东北迁徙,约明朝初年到达泰顺、景宁,然后以景宁为中心向四周的龙泉、遂昌、宣平、龙游扩散^[16],最终形成当今的畲族分布格局。畲人迁入福安始于唐代,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大林钟”“后门坪雷”“溪塔蓝”,这三大姓分别于景泰年间、

成化二年和万历十六年迁入^[19]。

(二) 汉族南迁及流布

汉族南迁南岭的时间在史书上记载较晚,但从考古来看,北人南迁或许在三四万年前就产生^[20]。南迁的汉族人口,进入南岭走廊后与当地民族人口交融,最后形成了客家人、广府人、潮汕人(又称福佬人)、平话人、桂柳人、高山汉等,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迁出地来到南岭走廊,与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18]171}。南岭的客家人,自称是“中原土族,三代遗民”,形成于五代至宋初,宋元后陆续流徙至南岭的赣南、粤东、粤北、桂东南、桂东北和桂中等地,人口约4000万人,其中广东约1562万人,广西约350万人^{[18]174-175,179}。南岭广府人自秦汉开始陆续分阶段多批次从中原入粤,并由汉族和粤地土著族群融合而成的,主要聚居于粤中、粤西南、粤北、桂东南一带,人口约5100万人,其中广东约3900万人,广西约1300万人^{[18]167}。南岭潮汕人源于北方民族,汉晋时开始入闽,三国时吴国在闽北置建安郡东安县(即现潮汕人所居的南安、同安二县)^[21],两宋后渐次向广东潮汕移迁,并于宋、元、明三代形成移民高潮,逐渐形成潮汕居民的主体。平话人“是秦汉以来,汉人由北方各地陆续迁入岭南广西地区后,经长期与少数民族交汇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支独具文化特征的汉族群团”^[22]。桂北平话人形成于秦汉到隋唐时期,桂南平话人形成于宋代,桂北、桂南平话人之间不能交流通话^{[18]185}。也有学者认为,桂南平话人多来自宋时的山东登州府、青州府一带,其分布包括“平话”(邕宁区、扶绥县、龙州县、大新县、马山县、宁明县、田东县、田阳区等县区)、“客话”(宾阳县、上林县、横州市三县区)、“蔗园话”(百色市、宁明县)、“官语”(田林县)、“六甲话”(三江侗族自治县)、“百姓话”(柳州市)、“粘米话”(钦州市),及乐业县、鹿寨县、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县市的桂南平话小片^[23]。桂柳人,因操西南官话“桂柳话”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广西北部的桂林、柳州、河池和百色及来宾等地,源于北方汉族,祖先身份大多为官兵^[24],其迁入时间始于明王朝平定云贵。也有一些桂柳人是明代卫所驻军演化而来,还有一

部分由明代屯田入桂的汉族移民演化而来^[25]。高山汉人,一般指元明清以来各时期从四川、贵州、重庆、云南、湖南等地迁徙到广西百色、河池一带高山大岭上的汉族人口,是南岭走廊汉族的一个“群岛”。其来源有的是明崇祯初年随李自成、张献忠联军抗清兵败后散居滇黔桂交界山区的残部,有的是“三藩之乱”后四散滇黔桂三省边界山区的吴三桂残部,更多的是湘川滇黔汉族为逃避苛捐杂税和征兵拉夫而长途跋涉来到桂西山区落籍立业^[26]。

(三) 壮侗语族的分化

壮侗语族源于百越民族的瓯骆族群,是百越民族的后裔,也是南岭走廊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族群,他们早在先秦时期就居住在今广西全境、粤西、海南岛、滇东南和红河三角洲地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族群逐步分化分流形成壮族、布依族、侗族、傣族、黎族、水族、仫佬族和毛南族诸族。其分布和流徙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固守故乡。瓯骆族群原本就居住在今广西地区和云南东南部地区等,后不断演化成为今壮族、布依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壮族主要居住在郁江流域、左右江流域、红水河流域、龙江流域等广大地区;由瓯骆族群演化成的仫佬族、毛南族等,主要流布于今罗城、环江等地。壮族“主要来源于土著的西瓯、骆越,并不排除有一部分外来的民族与壮族通婚而融合成为今天的壮族”^[27]。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上卷,也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地名学等多学科角度论述了壮族是土著民族,是源于古代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民族^[28]。

2. 南迁登岛。根据考古和分子人类学基因,可以推知距今20000—3000年,岭南陆地的黎族、临高人先民相继南迁登岛,逐渐定居在海南岛,并演变为今海南岛的黎族^{[18]353-354,358}、临高人^[29],与故地隔海相望。其迁徙可能与南海丝绸之路与南北丝路的开辟有关。

3. 南迁入越。早在5世纪,瓯骆族群开始分化,逐渐演变为僚人、俚人,并南迁交州红河流域^{[30]143-148}。宋代,中越划界后,有部分瓯骆族群后裔南迁越南北

部山区,后演变为今越南岱族、侬族和泰族。被称为岱族或泰族的约在10世纪以后就开始陆续南迁;南迁入越较晚的称为侬族,其进入越南仅三四百年^[31]。

4.西迁云南。约在公元前后,分布在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北部的百越民族的西瓯、骆越等群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分别西移云南文山、红河、西双版纳、孟卯(瑞丽)定居,并不断南迁西进至泰国、老挝、缅甸北部等国家,后逐步演变为傣族、泰族和掸族等^{[30][30-33]}。傣族先民在历史上多次南迁,多借河谷通道迁徙流动,与南北丝绸之路通道有关。主要通道有四:两广越人沿珠江水系,西迁入滇;滇人是居滇池地区的越人,西汉末年沿元江南下,一部进入今滇南、红河一带,大部到西双版纳等边远地区;洱海及金沙江流域越人一部西迁至今保山、德宏等地区,大部沿澜沧江南下,到达今景洪、勐海等境;滇西傣族先民一部沿怒江河谷进入今滇西南各地及境外地区,一部元末明初随军东进内附^[32]。

5.西进北移。主要是布依族,其是壮侬语族的重要成员、瓯骆族群的后裔。清康熙年间《黔书》首记:“何谓仲家?五代时楚王马殷自邕管迁来。”布依族旧称“仲家”,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33]，“五代时楚王马殷自邕管迁来”，“居于黔者曰仲家，皆属掸种”^[34]。徐松石先生把布依族称为“广义的僮族”，与傣族一样看待^[35]。《辞海》“布依族”条说：布依族旧称“仲家”，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35]。也有学者认为，布依族前称为僚人，又称“里”或一样看待^[35]。布依族也称“僚”“俚”。僚人就是越人之一。“主要是在战国秦汉时由岭南溯郁江或其它水道进入牂柯地区，属于粤(越)或西瓯骆，自晋时起称为‘僚’”，“唐以后牂柯越人与岭南及云南地区的僚人形成了属于汉藏语系中的壮傣语族各族。”^[36]其迁徙路线与《史记》记载吻合，是南北丝路黔桂古道流徙的移民。此外，还有一支壮族在清代迁徙四川重庆。

6.由南北进。这一类型主要是侬族。该族也是骆越的后裔，魏晋以后演变为僚人，唐宋时期僚人演变为“侬”“峒”。骆越、僚人、侬族相继住在一块土地上，

在文化上，语言、住房和风俗习惯一脉相承^[37]。其“源流大致是古越人的一支——五溪蛮(或僚)——仡伶、仡佬——峒人(人蛮)——侬。构成侬族的主体之民为土著居民”^[38]。从历史考察和田野观察看，侬族的族源主要来自古代两广地区的西瓯族群，也有少量骆越族群，他们迁徙到侬族现今所居住的地区后，与当地的土著民族融合成为当今的侬族^[39]。侬族作为瓯骆族群的后裔，早在秦汉时期开始有少量北迁，五代至唐朝北迁进入高潮，落籍桂黔湘三省交界后，历代还保留着岭南瓯骆民族的一些习俗^[40]。

7.东进北迁。明代，瓯骆后裔有一支称作“徭兵”“徭人”被征调到南岭走廊中段各地驻守、屯耕、“防瑶”。这批东来的壮族从庆远府思恩县迁入平乐县^[41]，从河池、南丹一带迁入贺州八步^[42]，广东连山县壮族和有血缘关系的湖南江华壮族，均为来自明代桂西红水河流域的徭兵徭人^[43]。明弘治、正德年间，明王朝引调桂西上林州、归德州、向武州的徭兵东迁府江流域，移守南岭走廊中段戡乱^[44]。壮族不仅有东进，也有北迁。如清嘉庆二年(1797)，贵州南笼起义失败，一些壮族北移至四川省宁南、会东和木里等县，与汉族、彝族和藏族杂居^[45]，和睦相处。

(四)回族南迁、京族北移

南岭走廊也因南北丝路的开辟，出现了回族南迁和京族北移的格局。回族先民南迁南岭走廊可追溯到宋代。宋代，“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46][126-127]}。西方商贾抵三佛齐后，一部分往泉州，一部分往广州，其他则往安南(今越南北部)和廉州(今广西合浦县)。宋代，回族先民可能进入了我国北部湾沿岸^[47]，往返于南岭走廊的南北丝路东路上。元代，有较多的回族先民进入南岭走廊，有的是随军征伐，有的为将镇抚，有此进为官参政。元朝统一广西后，不少回族南迁定居桂林等地^[48]。明末清初，有大批回族自陕西、河北、江苏、四川、山东、江西、山西、广东等省来广西桂林，清末清初桂林的回族开始向柳州、南宁和百色等地落籍，并形成回族聚居点^[49]。回族先民进入南岭走廊曾通过南海丝绸之路，他们很可能在南北丝路与南海丝路之间往返流动。

与回族南迁相反,京族则从越南北部沿海向北迁徙至我国北部湾沿岸的东兴市。京族直系先祖源于我国百濮和百越,唐代之前定居于今越南中部、红河流域等地。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有一支京族陆续从安南北部的涂山(今越南海防市附近)等地北迁中国,定居于当时的钦州县遵化乡的如昔都(今中国广西东兴市东兴镇和江平镇一带),至今约有500年的历史。这些京族先民由南向北迁徙,是分散、渐进的,最早迁入的是东兴镇竹山村的京族人一支,与明初在竹山经商的广东、福建商贾开展经商,天长日久便在竹山定居下来,长期往返于安南与中国经商;另一支黎氏和陈氏京族渔民,则在北部湾长期进行海上捕鱼,因经常到江平圩售卖海鱼便定居在江平寨头村;还有三支原居安南的居民也先后迁徙到今江平镇卫生院南面的坎头、巫头、交东村落籍等^[49],最终形成以京族三岛为中心的京族聚集区。回族南迁和京族北移进入南岭走廊最初应与南北丝路商贸活动密切相关,前者多于南北丝路沿线的商业中心城市落籍经商,如桂林、南宁、柳州、百色、北海等,后者则往返于越南北部与中国北部湾沿海开展商贸,可谓南岭走廊经商民族。

先秦以来,北人南迁东进、南人西进北移,各族人民在南岭走廊不断交融,从而使单一民族逐步分化与融合,呈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杂居和小聚居的格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族群基础。

二、南岭走廊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文明贡献

(一)空间上的贡献

以“共同地域”为基础是南岭走廊显著的空间特征。南岭走廊空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位于中国岭南、滇东南和黔西南部,东连赣粤闽沿海,西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区域),北接云贵高原,南临南海,西南连中南半岛北端,走廊山水田林路城内部结构完整,自古以来南北丝路东路贯穿全境,有陆路和水路连接东南亚地区,是沟通中国—东南亚的海陆重要国际走廊。从地理空间俯视,滚滚

东流的长江水系湘江,珠江水系东江、西江、漓江、桂江、柳江、黔江、浔江、郁江、左右江、红水河等,以及分布于各流域的依山傍水的万顷稻田、一望无际的蔗海、茂密的天然林等,都是培育、发展和融合南岭走廊各族人民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摇篮、资源和天然养分,也是铸就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的地理基础,它是我国南方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分布最广、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区。总而言之,南疆边海、南岭民族、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交汇处、生态资源丰富、地理禀赋空间的共性等,为形成民族共同体、共同语言提供了条件。作为地缘共同体,南岭走廊地理空间特征具有以下特点^[50]:其一,跨越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南岭走廊涉及东部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也涉及中部的江西和湖南两省和广西、贵州和云南三个西部省(区)。其二,地处南方三大经济区。南岭走廊位于华东、华南、西南的交界地带,既是南北交通要道,又是东西连接通道。其三,跨越四大经济区。南岭走廊跨越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泛珠三角和西南四个经济区。其四,中国—东南亚国际交通枢纽。从国际区位来看,南岭走廊既是古代南海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南北丝路东路起点,当今又是“一带一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北端,是我国各经济区域与东南亚国家地区之间商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陆海大通道,因而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中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作用。

(二)经济上的贡献

“共同经济生活”既是识别单一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面。历史考察发现,从生产方式来看,南岭走廊传统的生产方式与我国其他地域的民族一样,大体经历了从狩猎渔猎采集经济到农业经济,约在一万年前进入稻作农耕经济,并由此形成南北丝路的“稻米之路”^[51],延绵万年。至今,南岭走廊仍然是我国重要的稻米之乡。南岭走廊也是我国较早产生丝织品的产地之一,早在战国中期湖南长沙就出现了丝织品^[52]。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基本完整的丝织品达

100多件,如同打开了一座汉代的“丝绸之库”,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纺织工艺资料^[53]。从商品流通网络来看,南岭走廊是先秦时期开辟的南北丝路东路商道“楚国—南岭—交趾道西南路”^[54]。秦汉以后,“湘桂走廊”“交趾道”“邕交道”^[55]等各商道不断完善,不仅连接了闽赣鄂、黔蜀渝等周边地区,而且联通了东南亚国家,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从共同市场来看,秦汉以来,潭州(今长沙)、永州、邕州、梧州、廉州(今合浦)均建立统一的市场,为南岭走廊各民族提供了商品交换场所,促进了南货北运、北货南运,互通有无;南宋时期,南岭走廊建立了横山寨、永平寨、钦州三大博易场^{[46][193-197]},成为南北丝路国际商贸交流的重要市场。随着共同市场的形成,也涌现出一批专业的商人,如中国蜀商^{[46][193-197]}。早在战国时,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是楚国一个大商人。他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150艘船的商队。这支商队从鄂地出汉水,经长沙,入耒水,南向鄱(今永兴),抵洮阳(今广西全州),水陆并进,无处不往,几乎可到达我国南方各地进行商业贸易^[56]。唐宋后,南岭走廊南北丝路沿线出现马帮商帮。从经济特点看,各民族各具特色,互补互惠。南岭走廊各区域民族经济特色明显,江河流域、山区小平原及丘陵地区的汉壮民族擅长农耕,盛产稻米、桑蚕、棉纺、塘鱼、家禽养殖及茶叶;湘江、西江、郁江、左右江等沿江汉族和中心城市的回族擅长经商;北部湾沿海居民(包括京族)擅长海耕渔猎捕捞,盛产南珠、海鲜和食盐,并形成生产基地雏形;苗瑶畲族系及石山地区壮族、高山汉族等主要经营山地经济,盛产玉米、山羊、八角、玉桂、茴油、沙纸、中草药和茶叶等,各民族生产的特色产品,通过共同市场或集市实现了互通有无,丰衣足食,既为南北丝路提供充足的物质产品,也为各民族团结进步提供物质基础,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从整条南岭走廊来看,它不仅孕育了我国重要的稻作文明、丝绸文明,还孕育了我国铜鼓文明、茶马文明、香药文明^[54]。

(三)文化上的贡献

文化特征不仅是各民族的特征与标志、中华民

族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主要内容。2005年,我国官方对民族定义提出“六个要素”^[57],其中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应属于文化特征。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和心理特征等为纽带组成的民族文化有机体^[58]。因此,南岭走廊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南北丝路商贸、文化交流中共创独特的“文化共同体”,具有区域民族特色文化特征,并具有文化多样性,从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南北丝路既是一条贯穿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商贸通道,也是一条贯通中南腹地、西南边疆多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互鉴的文化廊道。南岭走廊上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岭南文化、高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栖息于这一走廊的各民族相互交流互鉴的结果,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

从语言文字来看,壮侗语族各民族大部分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即壮语、侗语、傣语、黎语、布依语等,这些民族语言大体相通,特别是生产生活语言相似度较高,相互交流无障碍,但他们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学会运用汉语,或是汉语派生出来的广州话方言、西南官话、桂柳话等,并作为交际语言。壮族还在唐代借助汉语创造了壮族方块字,传承了中华民族代表性语言文字,在壮族民间经书中留传并使用至今。瑶苗语系,各有自己的传统语言,但也受汉族语言文字影响,吸收了不少汉语语素,外出交流也使用西南官话或普通话、桂柳话等。而傣族在与其他民族交流特别是汉族交流时,也使用西南官话。从现代来看,南岭走廊各民族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在本民族内部使用自己的语言。

从民族历史记忆看,南岭走廊各民族既拥有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也具有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是由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书写的革命文化、共同弘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符号和标识等组成。下文将重点分析南岭走廊中具有中华民族或相关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共同享用、共同传承的历史记忆的文化遗产,

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以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如世界文化遗产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等就反映了壮族地区花山文化和苗族地区土司文化历史记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庆文化为例,有湖南凤凰苗族“四月八”跳花节、云南文山正月苗族踩花山节、广西隆林苗族跳坡节、融水苗族苗年、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等,也有湘黔桂侗族的多耶节(又称“踩歌堂”)、壮族三月三、黎族的三月三(云南壮族称“三月街”或“三月花”)、壮族歌圩节(侗峒节)、傣族的泼水节,以及仫佬族的依饭节、毛南族分龙节、广西彝族跳弓节(不称火把节,云南富宁彝族称为“莽年节”等)、京族哈节等。上述这些民族传统节庆文化,虽然名为单一民族的传统节庆,但经过南北丝路历史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已经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汉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节庆主要参与者也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区域内各民族共同的节日,共建共享,既彰显了单一民族传统节日的历史记忆,也折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

从民族心理特征看,南岭走廊各民族在南北丝路交往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的组成部分。以壮族为例,其共同的民族心理可归纳为“开朗上进的心理特质”,爱国爱家、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含蓄内向的民族性格”,热情好客、谦和礼让、勤劳勇敢的民族传统,“朴实淡雅的艺术风格”^[59]、依那而乐^[60]、爱好歌唱等。苗族的民族性格,有学者表述为:“热爱生活,崇尚自然”、“吃苦耐劳,精明聪慧”、具有自豪感和内聚力、“深沉质朴,热情重礼”^[61]、勤劳智慧,尚美如流、热情大方、能歌善舞^[62]。瑶族具有“闯荡世界、四海为家”、开拓新天地的豪气和热情,这在世界各少数民族当中较为罕见^[63]。南岭走廊的汉族,其人文特征也具有特色,广府人“敢为天下先”“兼收并蓄”“崇商重利”;客家人“自我意识强”“崇尚忠孝节义”“重农轻商”“女劳男逸”;潮汕人则是奉行“爱拼才会赢”信念;平话人“尚农善耕”;桂柳人“聚居城镇”,随遇而安,诙谐乐天,

“死仔”义气,米粉情结等^[64]。上述有关民族性格、心理共同特征,虽然多为学者“一家之言”,归纳也不一定精当,但它或多或少体现了南岭走廊主要民族群体的共同心理的表征,能为研究南岭走廊民族共同心理提供粗略线条。

从上述语言文字、民族历史记忆和民族心理特征的分析不难看出,南岭走廊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吸收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添砖加瓦,也为建设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大的基因,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南岭走廊是随着人类族群的形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南北丝路的兴起逐渐形成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贡献了宽广的地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南岭走廊广阔的空间、多种地貌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各民族南迁北进西移提供了生存空间和生计资源,营造了多民族和谐共居的良好发展环境,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南岭民族文化,让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

[参考文献]

- [1]郝国强,诸葛成影.南岭走廊多民族的“共祖”“同胞”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1).
- [2]朱其现,杨育智,向云.南岭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启示——广西铸牢中华民族示范区建设研究之一[J].贺州学院学报,2022(2).
- [3]周大鸣.从瑶族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
- [4]何海狮.南岭与“多元一体”的瑶族——从费孝通的“瑶族共同体形成之问”出发[J].青海民族研究,2019(2).
- [5]陈炜,钟学进,蔡银潇.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南岭走廊非遗族际共享的驱动机制[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3).
- [6]玉璐.南岭走廊上的族际通婚与民族交往交流交

- 融——南岭走廊过山瑶招郎入赘婚研究之一[J].广西民族研究,2023(1).
- [7]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0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88.
- [8]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2).
- [9]费孝通.潘光旦先生关于畬族历史问题的设想[M]//潘光旦.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1.
- [10]刘复生.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102-103.
- [11]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 [12][北齐]魏收.魏书(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0:1519-1520.
- [13]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苗学发展研究会.文山苗族[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85.
- [14]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2:163-164.
- [15]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
- [16]徐规.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J].杭州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1).
- [17]李调元.南越笔记(二):卷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06-107.
- [18]徐杰舜,李辉.岭南民族源流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 [19]《福安畬族志》编纂委员会.福安畬族志[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1.
- [20]王剑.柳州清理出一座距今三四万年墓葬[N].南国早报,2024-04-17(7).
- [21]陈友义.潮州人,福建祖[J].寻根,2011(4).
- [22]袁少芬.平话人是汉族的一个支系——论平话人的形成发展与平话文化[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 [23]李连进.桂南平话的历史来源、代表方言及其历史层次[J].广西师院学报,1995(3).
- [24]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0-31.
- [25]徐杰舜.桂柳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二[J].社会科学家,1998(6).
- [26]丛叶,陆辉.“高山汉族”——多民族聚居地区里的少数民族[J].广西民族研究,1994(1).
- [27]《壮族简史》编写组.壮族简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8.
- [28]张声震.壮族通史:上[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92-96.
- [29]莫祖禧.临高人进居海南岛时代探讨[J].广西民族研究,1986(2).
- [30]赵永胜.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古代民族源流、分布及其演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31]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25-27.
- [32]王军.傣族源流考[J].云南社会科学,1986(2).
- [3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北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58.
- [34]马长寿.中国民族分类[J].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1).
- [35]《壮学丛书》编委会.徐松石民族学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7-212.
- [36]谷因.布依族族源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 [37]吴廷栋.侗族是百越一支发展起来的土著民族[J].贵州民族研究,1993(2).
- [38]汤宗悟.考古发现与侗族族源[J].贵州民族研究,1982(1).
- [39]张民.侗族史研究述评[J].贵州民族研究,1987(3).
- [40]张民.从岭南习俗看侗族来源[J].思想战线,1983(3).
- [41]平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乐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701.
- [42]贺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贺州市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918.

- [43]韦浩明.历史上南岭走廊中段壮族徭兵的转型[J].广西社会科学,2015(1).
- [44]唐晓涛,王丹.明代以来广西府江流域的民族迁徙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J].民族研究,2023(4).
- [45]白柯.四川的壮族[J].四川统一战线,2002(5).
- [46]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M].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 [47]周建新.广西回族源流考[J].宁夏社会科学,1997(4).
- [48]麻承福.桂林回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19.
- [49]陈荣贵,何丹.京族百年实录[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5:19-20.
- [50]李剑.南岭民族走廊的民族经济学定位及双重视域下的战略区位研究[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3(3).
- [51]施倩.先于“丝绸之路”的“稻米之路”[J].乡镇企业科技,2001(4).
- [52]李超德.试论我国丝绸生产的起源和早期发展[J].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86(4).
- [53]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143.
- [54]赵明龙.南北丝路:中国—中南半岛古道几个问题的思考[J].东南亚纵横,2022(4).
- [55]周长山.广西历代对外通道[J].广西地方志,2019(3).
- [56]陈先枢.古代长沙商业之繁荣及其原因初探:上[J].长沙大学学报,2010(6).
- [57]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58]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
- [59]梁庭望.论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J].广西民族研究,1998(4).
- [60]张声震.壮族历史文化与《壮学丛书》——《壮学丛书》总序[J].广西民族研究,2003(1).
- [61]谭华,苟萍.从苗族的银饰情结透视苗族的民族性格[J].美术界,2009(11).
- [62]王竹青.湘西苗族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特征初探[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5).
- [63]赵家旺.民族心理·生态环境·政府行为——瑶族迁移的三大因素[J].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 [64]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14、167-236.

责任编辑:潘宏纹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广西高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与路径

胡海燕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南宁 530001)

摘要: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贯彻建设教育强国精神的重要路径,是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的必然要求,是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目标导向,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题中之义。广西高校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通过采取持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建设、组织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活动、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创建文明校园、深入开展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等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工作实践中,还存在协同效应发挥不够、教学渠道较为单一、地域元素挖掘不深等情况。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提出多层次建立长效化工作机制、多环节构建专业化师资队伍、多维度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课堂”、多渠道打造特色化理论高地、多举措创设健康和谐校园等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广西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12

[中图分类号]G641;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85-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式现代化”两个重大原创性论断,阐明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祖国南疆繁荣稳定的重要屏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西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出台了《关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进新时代全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及《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行动方案》,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肩负着“为党育

收稿日期:2024-06-12

基金项目:2022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项目(2022SZ096);2022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2KY0357)。

作者简介:胡海燕,女,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到广西高校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和教育教学等各项工作中。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一)贯彻建设教育强国精神的重要路径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3]。立足建设教育强国的宏伟愿景,在高校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对于进一步深化青年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边疆民族地区高校作为独特地域人才培养重要基地,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前沿阵地。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恰逢其时。广西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的共同愿景之一,作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决策部署^[5]。其中,对广西高校在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中的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新时代新征程,广西高校要把牢方向,充分发挥好立德树人功能,立足教育强国建设,探索高校自身治理变革的体制机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通过教育凝聚起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伟大力量。

(二)继续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的必然要求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有效抓手,也是检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际效果的重要标尺。习近平充分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称赞“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我国民族团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典范”^[6]。广西高校承担着为地方培育时代新人的历史重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广西继续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的必然要求。因此,广西高校要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立足培根铸魂要求,坚持价值引领、理论先行,努力建设成为研究阐释和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地,教育引导广大师生站稳政治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推动各民族文化融通,连接共同的情感纽带,不断夯实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政治基础。

(三)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目标导向

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7]。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实现全员全方位育人,为高校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指明了方向。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高等教育的重大使命。落实立德树人目标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宗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理念,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全员、全程、全方位,是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目标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战略布局,要求高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通过传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知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五个认同”。

(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题中之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培养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院校全面构建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依托。国家和社会发展迫切要求培养一大批讲政治、精专业的优秀人才,这也是新时代高等院校办学的初心使命和价值宗旨。高校要更好地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全链条、全环节、全过程。高校不仅是教授大学生基本的专业文化知识,更要引导

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大势中形成正确的是非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到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相亲相爱、和睦相处,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通过全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业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实践体系建设,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链条教育体系,才能营造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良好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环境下成长成才。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做法及经验

广西高校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结合广西实际开展系列教育教学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持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建设

目前,广西高校普遍开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课程主要教授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等内容,通过教育引导在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提升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各高校持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建设,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等内容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从一门课程变成一套课程体系,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优势学科群,有形有感有效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二)组织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活动

广西高校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旨在宣传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师生在活动中真实感受到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部分高校在校内组织了宣讲团,通过“三会一课”、课堂讲授等形式向校内学生进行宣教。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促进各民族师生相互交流、沟通了解,不断拉近师生间的心理距离。组织暑期“三下乡”活动,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同时,部分高校还通过成立相关研究中

心或实践基地宣传和推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2024年,桂林市首个“校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和“校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基地”在桂林医学院揭牌成立,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深入开展。

(三)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思政课教师承担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教学任务,其综合素质对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广西高校非常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目前,思政课教师队伍成为广西高校专任教师队伍中的一支庞大力量。在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广西高校依托党支部、绩效考核等,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师素质。同时,积极选派思政教师参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培训,及时跟进学习相关理论和政策。另外,深化高校之间的交流互访,推动形成高校间的联动机制。

(四)积极创建文明校园

近年来,广西组织区内高校开展了系列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各高校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学校办学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通过活动,推动学生进一步加深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和认同,并内化升华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注重在建筑的设计上融入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在视觉上增进各族师生之间的感情。有些高校还打造了校园文化长廊,定期开展校园文化长廊的评比,不断增强各族学生的“五个认同”。

(五)深入开展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

广西高校重视对百色起义、湘江战役等革命文化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通过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为加快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贡献高校智慧。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纳入思政课必修内容,将民族团结进步相关课程纳入通识课教育,进一步拓展教育深度和广度。有的高校党委书记在“第一课”中专题讲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部分高校成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组织专家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行多角度研究。有的高校在

校内科研项目中设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依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心等平台,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文化相通、命运相通^④。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问题

虽然广西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教育教学中结合实际推陈出新,成效明显。但是对照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任务要求,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协同效应发挥不够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是保障高校各项工作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当前广西高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机制方面还不够健全,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主要表现为:一是高校之间协同机制不健全。当前广西各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较多停留在校园内部,校际信息共享、沟通交流还不够,缺乏统筹协调,教育教学方式和内容呈现碎片化状态。二是未建立专门的评价标准。没有相应的评价方法和体系去衡量和评估实际效果,造成了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缺乏有效的评判和衡量标准,直接影响了推进的实际成效。三是保障机制不健全。比如,个别高校在年度预算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工作经费的保障还不够;整合多元研究力量开展学术攻关的工作机制不完善等。

(二)教学渠道较为单一

从广西高校当前的课程体系建设情况来看,部分高校未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完全融入课程体系中,导致课程育人功能的削弱。少数高校以思政课代替了专门的民族理论课程,课堂中涉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较为零散,未能构成完整的知识链,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课程体系,通过开设专门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增强课

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育人效果。

(三)地域元素挖掘不深

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主阵地,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阐释对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意义重大。当前,各层面各领域采取了系列措施予以推进,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但是,在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运用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对高校如何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阐释还不多,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共同性”阐述不够,具体有效的实践路径不足,制约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构建。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广西元素”提炼不够,仍需加大力度充分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元素。

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路径

(一)夯实制度基础:多层次建立长效化工作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一套强有力的机制作为保障,注重建章立制。一方面,要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形成的各项政策措施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推动形成制度规范或长效机制;另一方面,针对现阶段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所明确的新理念、新任务、新做法,通过建立改革试点、构建示范推广机制等,为改革创新提供标准化的制度保障。具体而言,要从三方面着手建立长效化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体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立足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整合经济学、民族学、管理学等领域力量,多角度深入探讨广西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和政策保障。探索推进中华民族学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推动中华民族学二级交叉学科培育建设,整合各学科力量。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设置,拓展学科建设内涵,搭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研习基地等,加快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二是建立健全相关管理机制。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列入学校党委年度工作要点,党委常

委会定期专题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体来说,要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组成。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动形成全校上下一盘棋的工作格局。三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数等相关考评体系。将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情况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并纳入部门及个人年终绩效考核,形成工作倒逼机制。强化督促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开展相关工作巡查,及时召开推进会研究部署工作,认真查找工作中的不足,及时总结经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纵深开展。

(二)注重人才引进:多环节打造专业化师资队伍

广西在少数民族研究、掌握少数民族相关资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这类人才资源也相对丰富。因此,可以考虑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科研教师队伍,负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科研工作,为扎实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坚实保证。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是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专门力量。为了弥补当前广西高校缺乏专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科研的师资力量不足问题,可以重点打造一支由思政课教师、团学干部、辅导员等组成的专职队伍,在进行人才招聘时注重选聘一些民族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充实建强专门力量。此外,还可以聘请民族学专家、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等专业人才担任兼职教师,不断充实专业力量。二是加强后备力量培育。在加大专业人才外引的同时,也要注重内育。广西高校可结合本校人才储备实际,选派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教师参加访学、深造、培训,特别是注重加大思政课教师的选派比例和力度,让更多扎实掌握民族学理论背景的教师从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科研,将丰富的理论知识更好地传授给学生,以达到启智润心的育人成效。三是创新团队教研模式。探索打造“1+N”团队教研共同体,通过组建教研团

队集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研究的研讨。“1”是指一个核心,可以是学院院长,或者是分管教学副院长;“N”是指团队成员,主要由负责承担具体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组成,教师为相关专业和知识领域,实现团队互促发展。

(三)建强教学主阵地:多维度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课堂”

课程思政贯穿于高校人才培养的全链条全过程全环节,是高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渠道^[9]。课程思政建设中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纳入考量范围,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魅力,可以有效加深新时代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各高校要立足广西,结合学校办学实际,以抓好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为引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纳入课程教育体系,进一步创新高校育人模式,以灵活化的教学提升育人效果。一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思政课堂。充分挖掘思政课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以及广西本土丰富的民族团结生动案例等内容融入思政课,加强“一条主线”“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五观”教育,增进大学生民族认同。二是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群建设。广西高校可结合学校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特点,制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时安排,开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系列课程,创新多元教学模式,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大课程小教学和小课程大教学”等教学模式,通过实行集体备课的方式,进一步规范教学过程,优化教学方式方法,确保教学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三是挖掘其他专业课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元素”。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着力打造一批特色课程和精品课程。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思政课融合创新发展,以生动的视觉效果营造全新的体验,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新知识。要通过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金课”,提升育人效果。深入挖掘广西本地及高校的典型案列,将学生视为案例库的组成要

素,推动课程资源共享共建。

(四)挖掘本土元素:多渠道打造特色化理论高地

作为民族地区高校,广西各高校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守正创新,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创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当表率作示范。要紧扣本土优势特色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阐释工作,同时充分挖掘广西本土元素,形成独特而有价值意义的研究方式,打造理论研究高地。一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 and 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重大基础性问题 and 重点难点问题等开展研究。二是加强地域文化研究阐释。聚焦地方独有文化,在挖掘广西文化元素的同时找到普遍性、共通性,实现一般与特殊之间的相互融通和互为转化,让对广西少数民族生动实践的深刻阐释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范畴,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素材。同时,在如何为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方面加大研究阐释力度。三是推动跨学科协作研究。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要从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的实践出发,推动广西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中国史、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研究,推动学科融合、拓展研究视野,构建与时俱进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科体系。

(五)注重宣传实效:多举措创设健康化和谐校园

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教基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相结合,同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相结合,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学校园文化活动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载体,打造文化品牌是高校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借助生源和地理具有少

数民族背景的特点,积极创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品牌,形成健康化、正向化的良好学习氛围。一是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校园。依托学校各类宣传平台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充分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打造中华文化长廊等,让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的了解。二是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系列主题活动。广西高校可充分依托“广西三月三”、民歌会、山歌传唱等节庆及主题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组织师生参加博物馆、展览馆等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宣教,开展充分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良好平台,增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互动与理解。通过积极申报自治区乃至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单位、举办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专题报告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大团结、社会大联合的浓厚氛围。组织校内专家学者撰写相关评论、论文,制作宣传视频,营造民族团结进步浓厚氛围。三是充分运用好校园媒介平台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结合“党课开讲啦”、下基层宣讲等活动,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为平台,组织党建专家、优秀党课教师深入农村、社区、机关、企业等基层一线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好广西民族团结故事,让“五个认同”深深扎根八桂大地、融入各族人民血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10]。在中国式现代化时代背景下,广西高校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加强广西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为切入点,聚焦民族团结进步、“高等教育强国”等国家大政方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广西高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下转第106页)

中华文化符号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武雯宇,努力曼·依米提

(新疆农业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52)

摘要:中华文化符号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展现着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与独特魅力,是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本文在分析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国国家形象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华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传递、视觉表达的刺激、认知联结的内嵌、情感共鸣的表达等对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在传递和塑造机制,进而提出中华文化符号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三个具体路径,即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资源与文化意涵、强化中华文化符号的当代传承与创新表达、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1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91-07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是基于文化记忆再生产基础上的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延续。这种传承不仅聚焦于符号形式本身,更是对符号背后的意义、价值观念以及文化符号所代表的历史情感的传承,也展现了对自身文化根基的尊重和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在全球化语境下,国家形象的塑造不仅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层面,还涉及价值观念的传播与表达。文化符号的传播效果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建构的成效^[2]。借助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创新

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与延续,也是对国家软实力的有效提升。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符号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和影响机制,有助于中华文化符号对外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建设。

一、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国国家形象

(一)文化符号和国家形象

“人类全部的文化活动,就是有意识地促成各式各样文化符号的诞生,同时也是对所有的文化符号进行解读、理解和转化的过程。”^[3]个体作为符号的接收者和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语言、行为以及象征性实践与文化符号相互交织。这一交互作用既塑

收稿日期:2024-06-11

作者简介:武雯宇,女,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努力曼·依米提,女,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造着个体的认知结构和身份认同,又构成了文化符号的意义框架和社会功能。文化符号作为意义的载体和社会实践的表达,在不同的历史、地域和社会背景下,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这些符号不仅是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的表征,也是个体情感和身份认同的象征。此外,个体在积极参与文化的再生产与转化的过程中使用和解读符号,也为这些符号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国家形象是外部主体对一个国家外在表象和内在实质的总体认知和评价。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指出国家形象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4]。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的外在表现,更是一种对外传播和自我呈现的系统性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软实力、价值观念、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等。国家形象的建构涉及国家形象塑造者的意识形态、传播策略、文化输出等多个层面,也需要利用历史资源、现实资源、民族特点与品格等多种资源,是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相互塑造和深刻交融的态势。文化符号作为国家形象的表达媒介反映了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秩序,并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持续演变。这种演变不仅是符号形式的变化,也体现了国家身份认同、文化传承以及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从社会角度看,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的关系是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的表现。国家形象所承载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都是国家文化符号的具体体现,这些文化符号又在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同和传播,进而影响和塑造着国家形象。从心理层面看,文化符号作为国家形象的象征,在个体心理中激发着情感共鸣和认同感,并深层次地塑造着个体的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这种心理联系源于个体对于文化符号的情感投射和象征解读,体现了国家形象在个体心理中的情感联结和认知印记。通过文化符号的传播和表达,国家能够在个体心理中建立起积极的情感联结和认同感,增强国家凝聚力和促进社会稳定。

(二)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国国家形象

“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指中华文化中具有代表性、象征性或隐喻性等事物承载的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总和。”^[5]中华文化符号涵盖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智慧,代表了中华文化中的审美、哲学、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和精神内涵,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与文化遗产,承载着凝聚、传承与启迪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使命。首先,中华文化符号的种类和形式丰富多样,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按照历史维度,可以分为古代文化符号和现代文化符号等;按照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等。此外,还可以从象征意义进行分类,比如吉祥文化符号、祈福文化符号等。这些不同维度的分类方法,有助于增进对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其次,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化和文化发展不断丰富和创新。中华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交融不断演化。例如,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内涵从殷商节俗的重祭祀,到周代族人的祭天祭祖、庆祝丰收;从汉代以后的祭祀与欢庆并重,到现在的新春佳节注重“跨年仪式感”“过年幸福感”“守年温馨感”等,这都是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创新着春节的内涵。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中华文化符号在不断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中产生新的文化符号。

中国国家形象的根基和未来在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国家实践的交融。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和象征,承载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为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感,也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象征作用。同时,中国国家形象又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外交等多种途径与中华文化符号相互映衬和互动,为世界各国理解中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和交流平台。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国家建设实践有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国家形象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现代国家建设实践展示了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角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可以为当代中国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自信,而现代国家建设实践的成就为中国国家形象赢得了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二、中华文化符号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机制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9]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符号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内在传导机制,探究中华文化符号增强个体的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基本规律,进而强化国家形象在个体心目中的建构。

(一)中华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传递

国家形象是一整套符号表述系统^[7]。当探讨中华文化符号如何影响个体或者群体对于国家形象的认知时,会不可避免地涉及象征意义的复杂性及其在文化认同形成中的作用。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一种视觉、语言或行为的符号系统,“是共有价值观的体现和共有精神家园的维系,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纽带和内在基因”^[8],更是塑造个体对国家形象认同、观念和行为的重要媒介。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一种象征系统,通过具体的符号物质载体,传递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这种传递过程既是个体或群体与文化之间互动的产物,也是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是简单的图像或文字,还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其通过特定的形式和意义,传承着中华文化的精神。首先,中华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在个体心理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号作为文化中的抽象概念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内核,通过情感联系、诱导和迁移等心理机制,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情感。例如,红灯笼的颜色象征喜庆和吉祥,汤圆、饺子的形状象征团圆与美满;梅兰竹菊分别代表傲、幽、坚、淡的品质。这些象征意义不仅是简单物象的呈现,还是个体对于美好生活、高尚人格品质等情感诉求的具体表达,承载着深层

的文化象征,有助于个体在心理层面上构建与中华文化的情感共鸣。其次,中华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通过文化符号的使用和解读,表达着对文化的理解、态度,进而塑造自身的国家形象和身份认同。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象征意义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着装的颜色与图案遵循着严格的规范。在礼仪与正式场合中,服饰的色彩和款式往往直接反映个体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例如,明清时期的文官服饰以飞禽图案为主,象征文官的文雅与高贵;而武官以走兽图案为主,体现了其威武与勇猛。这种符号化的着装规范不仅规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强化了传统礼仪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这些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服饰,不仅是一种衣物的形态,还能够在社会交往中传递出特定的文化信息和价值取向。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表达个性和追求创新的空间范围不断拓宽,符号的象征意义也在不断演变和重构。总之,中华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通过心理构建、社会交往和文化遗产等多重机制,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认同、观念和行为,既是文化遗产与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体与文化互动的重要媒介,更是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二)中华文化符号视觉表达的激发

符号的视觉特征与其所携带的文化内涵之间的复杂互动,是讨论中华文化符号如何刺激视觉进而传递国家形象意义的前提。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一种视觉表征,通过其独特的形态、配色、对比度、样式、结构、色彩等视觉元素,激发个体的视觉感知,进而引发其对文化意义的认知与解读^[9]。这种视觉传递的过程不仅是信息传递,还是文化价值观念、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的综合表达。首先,中华文化符号的形态特征对视觉表达具有重要影响。符号的形态包括其外观、结构和比例等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赋予符号独特的美学魅力,同时也在视觉上引导个体对符号进行感知和理解。例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画以及书法作品中的汉字,以独特的线条和结构特

征引导个体的视觉焦点,进而激发对文化内涵的感知与领悟。其次,中华文化符号的色彩特征对视觉表达起着重要作用。色彩在文化符号中既承载着感知和情感的信息,也反映了文化的审美取向和情感体验。例如,不同的颜色往往代表着人们对善、恶、忠、奸、美、丑的看法。其中,红与黄就分别象征着吉祥喜庆和隆重庄严;黑、灰、褐等颜色,因为视觉效应上深沉凝重,多数情况下有悲痛、沮丧、压抑的象征意义。这些色彩特征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视觉感知,同时通过文化共识的传递激发个体对符号所蕴含意义的认知与情感共鸣。再次,中华文化符号的图案特征对视觉表达的影响不容忽视。图案作为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通过独特的构图和装饰元素,能够吸引个体的视觉注意力,并引发其对文化意义的深度思考。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物、走兽、花鸟、器物、山水等图案,以其寓意丰富的形态和线条,常常成为视觉艺术作品中的重要表现对象,传递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感。中华文化符号通过独特形态、色彩和图案等视觉特征,激发个体的视觉感知,传递文化内涵和情感意义,影响着个体对国家形象的判断。这种视觉传递不仅是文化符号与个体之间的互动,也是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的重要媒介,为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视觉支撑和表达途径。

(三)中华文化符号认知联结的内嵌

首先,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联结是个体心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通过感知、认知和记忆等方式将中华文化符号与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进行联结和储存,进而在感知符号本身意义的基础上理解和内化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个体随着经验积累和认知能力的提升,对文化符号的认知也会不断变化,新的信息和经历会影响个体对文化符号的认知,从而丰富认知的内容并深化其深度,构建起个体独特的文化认知网络。其次,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联结受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华

文化符号一端连接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象征着稳定的社会价值共识;另一端连接着个体认知经验,象征着个体间异质性的心理认知^[10]。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直接决定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文化符号的形成和理解。例如,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会导致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又会反映在建筑、服饰、艺术等文化符号上。江南水乡的建筑风格与北方的四合院建筑风格,就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同时,个体所处的地域、民族、宗教等不同文化背景也会使其对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产生不同理解。最后,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联结是个体心智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产物。个体对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与联结既包括对符号本体的理解和记忆,更体现为对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深度参与和主动贡献。通过个体对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联结,文化价值得以传承和延续,社会文化得以发展与创新,进而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认知联结网络。简而言之,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联结不断内嵌于个体,是个体心智发展、社会文化互动和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中华文化符号情感共鸣的表达

个体对中华文化符号产生共鸣的前提是其内在的情感诉求与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相契合。情感诉求与符号内涵的契合是指个体内在的情感需求与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匹配、共鸣的关系。这种契合不仅使个体能够对符号产生情感共鸣,也促使个体在情感层面上与符号进行深入互动。情感诉求是个体基于内在的情感需求或情感体验对某种情感状态的追求、特定情感体验的渴望和对情感认同的寻求。这些情感诉求不仅涵盖各种维度,如喜悦、愤怒、悲伤、恐惧等,还包括对认同、归属、自我肯定等情感需求的追求。符号内涵则是指符号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和象征意义,其构成常常受到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社会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符号所蕴含的内涵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情感诉求与符号内涵的契合发生在

个体对符号进行感知、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当个体的情感诉求与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相契合时就会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共鸣可以使个体对符号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增强对符号的认同感。例如,习近平用“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来比喻民族团结已经深入人心。在与新疆各民族群众访谈的过程中,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会用“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来描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石榴”已经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符号^[11]。这种情感诉求与符号内涵的契合不仅使个体对符号产生共鸣,也促进了个体与符号之间的深度互动和理解。个体通过对符号的感知、解读和表达,不断深化对情感诉求和文化内涵的认知,进而丰富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文化认同。因此,情感诉求与符号内涵的契合是个体与符号之间情感互动的基础。

个体与中华文化符号之间的情感共鸣是一种动态的、互动的过程,既受个体内在情感需求的影响,也受符号本身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的影响。情感共鸣与个体情感体验的互动是指个体与特定文化符号或情境之间产生的情感联系与反应。这种互动是双向的,既包括个体对文化符号的情感投入和共鸣,也涉及个体情感体验对符号理解和表达的影响。情感共鸣是个体与文化符号之间情感联系的产物。当个体对特定符号产生情感共鸣时,意味着个体与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产生了联系,使得个体能够从内心深处理解、认同以及表达这一符号所蕴含的情感意义。例如,个体出于对中华文化中的传统美学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对中华传统绘画中的山水景观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感受到自然和谐所带来的心灵宁静。个体的情感体验对其与文化符号的互动和理解至关重要。个体的情感体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的经历、情感状态、认知偏好等。这些情感体验不仅影响着个体对符号的感知和解读,也反过来被符号所激发、引导和塑造。个体可能因为自身的愉悦情绪而对某一符号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又会进一步加深其对符号所蕴含意义的理解和认

同。情感共鸣与个体情感体验的互动既反映了个体与文化之间的情感连接,也表现了个体对文化符号的主观感受和情感表达。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个体与文化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认知交流,也为个体提供了表达自我情感和认知的重要途径。因此,情感共鸣与个体情感体验的互动是文化认同形成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为个体与文化之间的情感互动和情感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华文化符号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路径

(一)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纵深与文化意涵

中华文化符号源远流长,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深入探索这些符号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过程,有助于为中国国家形象赋予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意义。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古代典籍和考古等途径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符号的起源、演变和传承,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挖掘中华文化符号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包含的信息密码、象征意义的变迁等重要信息,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历史深度和文化底蕴^[12]。要通过走访调查和研究民间故事、习俗等途径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的应用和传承情况,揭示中华文化符号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应用和传承情况,从而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符号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历史纵深影响。要通过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等,探索中华文化符号在艺术与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和审美内涵。通过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渊源,可以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增强国家形象的历史感和文化底蕴,进而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形象认知度。要强化中华文化符号塑造国家形象的文化解读。通过深入挖掘符号背后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积淀,可以揭示出符号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和转化,从而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要运用文

化学、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中华文化符号所处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进行深入探讨,揭示符号的起源、演变与传承路径、符号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联性,分析符号对人们情感、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深入理解符号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多维作用和深层影响,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要结合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需求,赋予中华文化符号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使之与国家形象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从而实现中国国家形象与中华文化符号的有机结合和共生发展。

(二)强化中华文化符号的当代传承与创新表达

强化中华文化符号的当代传承与创新表达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是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创新。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文献、艺术作品和传统习俗的研究,对符号背后所代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价值观念的探索。文化符号的传承能够凸显国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历史积淀,使之成为国家历史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象征。推动中华文化符号创新表达,需要对传统符号进行重新解读和再构思,使其融入当代社会和现代审美中。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新,国家能够展现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和创新活力,使国家形象更具时代感和现代性。要通过艺术创作、发展文化产业等方式,将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历史思想、价值观念融入文化符号,并与现代创意、设计和制作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颖独特的文化产品和形式,为国家形象赋予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内涵。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界融合。将中华文化符号元素与现代艺术、科技、商业等领域结合,可以展现文化传承上的自信和创新能力,向世界展现出一个具有活力和魅力的中国国家形象。要通过与时尚、设计、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各种产品和活动。例如,将传统的中国书法、绘画元素应用到时装设计中,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尚品牌;或者将传统的中国音乐、舞蹈元素融入现代舞台剧或电影,创造出具有新意的艺术作品。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鼓励艺术家、设计师、创意团队等运用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作和设计。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各种创意产品和项目,拓展其传播渠道和影响范围,强化国家形象的塑造。

(三)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既要重视国家和政府有目的的形象建构与传播行为,也要重视非政府组织与公民个人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给国家形象增添的筹码^[13]。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价值理念^[14],推动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不仅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还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和友好和谐的国家形象,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重要支持和保障。

首先,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塑造国家形象。依托推特、脸书、Tiktok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举办中华文化符号展览、影视作品、动漫游戏、文创产品等推介活动,将中华文化符号带到国际舞台上,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积极探索中华文化符号在国际合作中的应用,通过文化产业、旅游业等领域的合作,将中华文化符号融入国际合作的各个方面,为国家形象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加强中华文化符号的国际品牌建设,注重中华文化符号在国际传播中的创新和包装,提升其时尚性与现代感,多方式打造中华文化的国际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符号的认知度和美誉度,从而塑造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塑造国家形象。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让受众更加深入地了解 and 体验中华文化符号,从而提升国家形象的时尚与活力。比如,“李子柒”“滇西小哥”“办公室小野”等网络主播在海外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平台开展中华文化的线上传播与推广^[15],使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更广泛地了解中国。要利用数智技术深

入挖掘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和历史渊源,为其传播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精准的定位。最后,要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高度重视教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符号的敏感度和理解能力,培养更多懂得欣赏、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符号的人才,更好地促进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注重跨学科教育模式的培养,让学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提升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蒙象飞.文化符号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有效运用[J].社会科学论坛,2014(6).
- [3]阮静.中华文化代表性符号的特色与时代价值[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
- [4]K.E.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M]. London:Routledge, 2019:536-550.
- [5]都晓.中华文化符号的对外具象化传播[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
- [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2022-05-29(1).
- [7]沈悦,尹如歌.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再思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 [8]马小玲.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理论与解构[J].河南社会科学,2023(10).
- [9]刘莉.中华文化符号的层次、特征与传播[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
- [10]刘春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认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1).

- [11]刘慧文,王家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图像化构建[J].学术探索,2024(4).
- [12]段小强,刘笑梅.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伏羲文化溯源研究[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6).
- [13]梁晓波.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 [14]吕志敏,代洪宝.传递与共享:社交媒体时代的中华文化符号传播[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 [15]周艳.中国主流媒体海外短视频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3(9).

责任编辑:刘菊香

海外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以文莱中华中学华裔新生代为例

马莉莉

(梧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西梧州 543001)

摘要:文莱中华中学是中华文化在文莱传承的重要载体。研究结果显示,文莱中华中学的华裔新生代保持着对中华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具体体现在对文化选择、语言应用、礼仪举止以及儒家价值观的传承上。其中,文莱中华中学的华裔新生代在文化的选择方面,更趋向从自身价值收益和社会认可价值的角度进行审视与选择。因受地区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较深,在其身份认同方面展示出了复杂性。可从调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策略出发,鼓励国内相关单位加强与文莱华文学校的合作交流,增强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与认同感。

关键词:海外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文莱中华中学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14

[中图分类号]D634;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5-0098-09

东南亚是世界上华人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各国对华人的政策和待遇各异。文莱的经济发展水平排东南亚第二,仅次于新加坡。根据中国外交部统计数据,2022年文莱总人口约为44.5万,华人占比9.5%,为文莱第二大民族^[1]。文莱华人一直是中国与文莱之间的联系纽带,中华文化在文莱的传承从未中断。文莱中华中学是文莱历史最悠久、师生人数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华文学校。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3]。这需要我们尊重和保护海外华人的文

化遗产,支持他们在当地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使之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独特标识。同时,关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阐述

(一)海外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研究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指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5]海外华裔新生

收稿日期:2024-08-25

项目基金:2023—2024年度全区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GXSXYTLX202314)。

作者简介:马莉莉,女,梧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教师,研究方向为东南亚研究。

代的文化认同普遍是双重或多重的。海外生活并不可能使他们完全剥离祖(籍)国的文化^[6],但是多种文化的认同可能会存在“文化冲突”等现象。文化认同是促进海外华人与祖籍国联系的重要精神基石^[7]。因此,探究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仅有助于提升和增强海外华人群体的文化自信与凝聚力,也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力量。

学术界关于“认同”(Identity)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早期研究集中于心理学和社会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探讨了社会地位如何通过职业、财富、社会出身等因素影响个人的身份认同^[8]。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认为个体是依据个人经历的反思理解到的自我,从而形成自我的认同^[9]。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社会集体在个体身份形成中的关键作用^[10]。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知,海外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研究既要关注个体认同发展过程,如儿童如何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学习来形成自我的认同;又要关注社会认同,即个体对所属群体(如民族、文化、宗教等)的认同感;还要关注身份认同,如个体如何通过社会角色和标签来定义自己。

文莱中华中学作为海外华人教育的重要载体,其华裔新生代群体的特性以及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表达方式,为观察和理解海外华裔新生代的中华文化认同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笔者运用多种调查方式,尝试了解文莱中华中学华裔新生代在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方面对中华文化认同的现状和行为表现。

(二)研究对象设定的范围及概念

1. 华裔新生代的范围。《论衡·宣汉》最早提出“代”,用以指代历史的分期和世系的辈分。国内外不同派别学者对于“代”的内涵从时间规律性、个体的差异性和人的社会性等方面出发,强调应从多方位角度进行学术研究,从而产生了学术界对于认定不

同地区“新生代”时段和群体的差异。华裔群体对于自身代际也有认定。笔者观察到,文莱华裔多将到达海外其他地区或文莱生活定居的第一位祖辈定位为第一代,根据自己与第一代之间的年份或辈分推算确定自身代际。根据文莱相关政策,当地居民分为三种,分别是公民(Brunei Citizens)、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和临时居民(Temporary Residents)。由于文莱国家政治、宗教的敏感性以及华人身份的复杂性,本文将研究对象文莱华裔新生代限定为21世纪后出生的华裔。

2. “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传承和发展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历史悠久、包容性强、文化元素丰富,涵盖多个领域,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力。历代文莱华人在生活中,将自身的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运用中华文化服务与融合进当地的政治体系,进而发展出符合文莱华人生存的实用法则。在访谈过程中发现,文莱华人将自身所传承到的、来源于中国和华侨华人祖先以及已与当地文化相通共融的文化认定为“中华文化”。本文中的中华文化,主要指由文莱华侨华人传承及发展的中华文化。

二、田野调查点的基本概况

(一)历史上的文莱华人

文莱华人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而后在宋、元、明时期都有可考证的移民活动。截至明朝,华人移民至南洋的活动规模较小。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东南及华南沿海民众因生活所迫或者战乱而大规模迁徙至东南亚。福建、海南和广东等地华侨经过香港、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等地辗转到达文莱。1888年,文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当时,华人在当地的主要营生是小本生意和务农。1903年,在文莱马来奕区初步勘测到石油^[11]。由于石油经济走势持续向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侨和华人聚集到文莱,文莱华人口急剧上升。为了保障华人群体的权益、为子孙后代提供教育,文莱华人自发建立社团和华文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躲避战乱,部分文莱华人从城市转移到了乡村,主要从事农业活动。19世纪60年代,多数华人选择移居到文莱首都

斯里巴加湾市。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文莱华人口增速才逐渐放缓。此时,文莱政府对于移民身份开始了严格管控,华人需要决定是加入文莱国籍,抑或保留现有的国籍返回中国。这种管控影响了华人大量向文莱移民的活动,并出现了文莱华人再移民的现象。

(二)文莱中华中学的历史与现状

文莱全国共有 8 所华文学校,分布在文莱的四个区中,建校至今从未停止办学,也未中断中华文化教育。其中三间华文学校包含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另五间仅包含小学和幼儿园。文莱华文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主要靠向社会募捐和收取学费等方式维持办学。文莱中华中学是文莱首都唯一的华文学校,也是建校历史最久、师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距今已有 100 余年历史,在校学生人数约 3000 人。

文莱政府在独立之前就已开始逐步接手华文学校内部事务,希望通过津贴等方式将华文学校转为政府学校。文莱华人在华人领袖的带领下极力抗争。为了华文学校能够继续办学,他们也接受了文莱教育部的部分要求。例如,华文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和校长必须是文莱公民等。如果在文莱华人公民中没有达到担任校长标准的人选,就必须接受政府指派的马来人接任。同时,文莱华人纷纷予以援手,出钱出力支持华文学校。1989 年,文莱中华中学增设了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班级,课时等相关要求皆按照文莱教育部的规定实施。

目前文莱华文学校依旧保留着中文课程,虽然华文课程是必修科目,但不是升学考试科目。学生每周有八节华文课,并有着充足的课余时间,学习活动内容丰富,可根据不同年级的需要选择相关的课外教学活动。面对中国的崛起和对学生未来多方位发展的考虑,学校会在活动中加强对学生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如十一年级是即将毕业走向大学或者社会的学生,如果他们对中资企业有意向,可以参加“面试赢家”“中华文化游园会”等活动,或选择面试、策划活动等实践练习。华裔新生代的中华文化遗产体现在日常教学、表演和竞赛当中,如民族舞蹈、二十四节令鼓、中华经典

故事话剧、挥春比赛等。

三、文莱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现状

(一)调查情况说明

1.研究对象。考虑到跨国调研的阻力、学生对调研问卷的理解、保证调研问卷的精准性,以及毕业班的学习压力等现实问题,本文以就读于文莱中华中学七年级至十年级的华裔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100 份问卷,回收 89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81 份,有效率为 81%。样本详细情况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分类	频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29	35.8%
	女	52	64.2%
年级	七年级	25	30.9%
	八年级	16	19.8%
	九年级	21	25.9%
	十年级	19	23.4%
父母民族背景	父母均为华人	45	55.6%
	父母中有一方为华人	29	35.8%
	其他	7	8.6%

2.研究过程。本文研究始于 2017 年,截至新冠疫情前笔者以研究学者的身份多次到访文莱,走访过文莱全部华文学校。其中,在文莱中华中学进行了持续 3 个月的田野调查,采访了多位华文学校董事、校长、老师、家长和学生。新冠疫情期间,笔者依旧保持与文莱华侨华人之间的联系。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笔者接待了到访中国的文莱中华中学董事、老师和学生,并请他们协助完善了此研究的调研内容。

3.研究工具及数据处理过程。本文借鉴了华裔青少年文化认同相关论文和调查问卷,在多次实地调研后,根据文莱华裔现实情况设计了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家庭背景等;文化认同度指标,包括对华人身份的认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语言能力

(语种)的掌握程度等。这些问题的设计旨在全面了解华裔新生代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认同状况。

由于 Microsoft Excel 或 Google Sheets 表格较为直观,方便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初步的数据管理和统计,故本文将收集到的问卷数据输入 Excel 表格,进行初步的数据整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然后使用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统计软件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本文研究需要关注不同文化认同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因而通过计算各变量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及其他相关系数,了解文莱华裔新生代关于身份认同与中华理解及语言能力等因素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的范围为-1到1,正值表示正相关,负值表示负相关,绝对值越接近1,表示相关性越强。

除了问卷,笔者还进行了实地访谈,以获取更深入、更丰富的信息。访谈对象包括华裔新生代学生、华文学校教师和董事会成员。通过深度对话了解他们的实际经验和感受,并将这些访谈记录进行了主题编码和内容分析。

(二)调查研究结果

1.文莱华裔新生代的国家与身份认同情况。《现代汉语词典》对于“身份”和“认同”进行了相关解释,“身份”作为名词指自身所处的地位^{[12]1208};“认同”作为动词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承认,认可”^{[12]1150}。根据身份证信息,可以直接明确文莱华裔新生代的国籍身份,而他们对所在国国籍、所在国家和民族等身份的认同,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数据反映出来。考虑到文莱华裔新生代中可能存在无国籍人士,以及文莱和马来西亚公民身份政策、宗教和居民民族心理归属等因素,对文莱华裔新生代和其家庭成员的国家与身份认同相关问题,设计了“文莱人”“马来西亚人”“中国人”“文莱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六个选项,有且仅选择一个更加偏向的选项。根据调查问卷,关于文莱华裔新生代的国家与身份认同情况,共收到79个有效数据,有效占比97.5%(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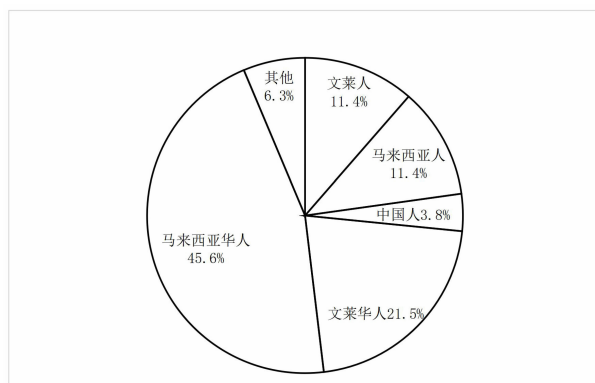


图1 调查对象的国家与身份认同情况图

在文莱三种居民中,文莱公民的身份证为黄色,称为“黄登记”,表明其拥有文莱公民身份,享受公民待遇。文莱永久居民身份证为红色,称为“红登记”,持证者可以享受部分文莱优惠待遇,允许兼有其他国家公民身份。文莱临时居民身份证为绿色,称为“青登记”。文莱独立以后,文莱政府加强了公民身份的管理,公民身份越发难以获得,非文莱公民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获得申请机会。

在文莱华裔新生代国家认同中,他们对自身的国籍、国家认同有明确的划分。文莱的居民划分政策深刻影响了文莱华裔新生代的国家认同。他们通过明确国籍归属,并结合国家认同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在此过程中,虽然华裔新生代对于自己的华人身份认同程度很高,但更多的文莱华裔新生代倾向于选择文莱人的身份。在与文莱华人身份和文莱公民身份对比时,约三分之一的拥有文莱公民身份的华裔新生代更倾向于文莱国家给予的公民身份。在文莱中华中学就读的马来西亚华人中,约五分之四的华人更加注重自己华人的身份。这与文莱公民身份在华人社会的稀缺性、在文莱社会工作任职条件的限定、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等原因有关。当然也不排除部分华裔新生代基于宗教等因素选择“文莱人”。

本文研究中的受访者年龄在14至16岁,其中56.8%的人曾经到访过中国,13.6%的人未到过中国并表示有机会愿前往。到过中国的华裔新生代超过了半数,与中国的联系较高。这与文莱经济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首先,文莱华人的生活水平较高,有充足的经济基础保障其与中国的交流联

系,如探亲、旅游等。文莱华裔新生代前往中国的理由大多为探亲,证明其在中国国内有可联系的亲属。没到过中国并表示不愿前往的华裔新生代给出的理由大多数是觉得自己与中国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前往中国的欲望。经济因素和情感因素是促使新生代实地感受中国、加强与中国联系的重要因素。其次,文莱的教育主要以西方教学体系、语言和文化为主,学生在文化方面的选择性很多。再次,文莱国内就业环境比较严峻,华裔新生代更倾向于选择科学、计算机、医学、法学等有一定就职门槛的专业,前往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进行深造。

2.文莱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认同情况。文莱中华中学的校训是“礼、义、廉、耻”。学校开设了多项与中华文化相关的课外活动,每年都会请文莱弟子规有限公司对学生连续三天的礼仪文化教育。在此基础上,问卷从社会行为、实践能力、文化认同和参与评估等方面对文莱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感现状进行研析(详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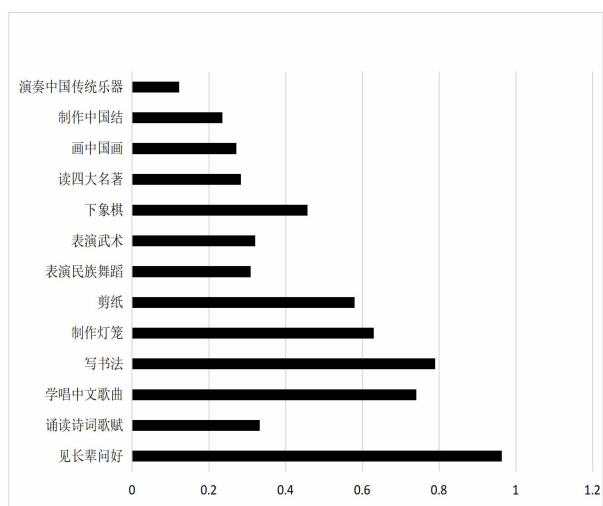


图2 调查对象对中华文化部分类别认同程度系数

文莱弟子规有限公司是文莱华人公民注册并捐助成立的,旨在支持华文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文莱培养守礼公民。该公司每年都会定期为文莱华文学校提供免费的培训教育,教育内容围绕《弟子规》等中华文化开展,尤其是礼仪规范等。在学生日常生活中,华文学校教师也会强调礼仪文化。从调查问卷中可以直观感受到,

文莱华裔新生代对于中华文化的行为规范有很强的认同感。书法是学习华文的一项重要,华文学校会开展相关的比赛,书写内容主要为古诗词、中国倡议词、对联等。如在2013年以后,文莱华裔新生代在面对中国媒体和游客时,常展示“一带一路”等内容的书法。2020年初,文莱中华中学录制的视频中也曾多次出现学生们用毛笔墨手写的“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等祝福和激励语。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他们愿意并及时了解到中国的最新政策,但并不能充分理解政策的背景和意义。例如,在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时,一方面他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构成;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了个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意愿。但当被问及“一带一路”的原则和实施领域等具体内容时,他们了解的内容较为有限。由此可见,他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图2可分析出,华裔新生代更加喜爱、认同他们感兴趣、难度较小并且可以展示的文化内容。部分华裔新生代选择文化遗产内容时,更趋向于选择可以提升自身关注度和获取价值感的项目,如民族舞蹈和武术表演,因为这些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收获一定的成就。文莱中华中学在校庆、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会邀请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人士(甚至是国王苏丹)和学生家长到现场参加活动,观看华裔新生代的表演。在访谈中得知,新媒体深受华裔新生代青睐,他们愿意在自媒体平台展示自己的才华,中华武术、民族舞蹈、中文歌曲、舞龙舞狮等富有视觉、听觉并有较强传播力的中华文化可以吸引流量,帮助他们结交更多的朋友。

文莱华裔新生代对中国传统乐器的喜爱度相对较低。中国传统乐器的学习需要一定的练习时间、相关的乐器设备和优秀的授课教师。但是,文莱中华中学华裔新生代学业压力较大,很难保证学习乐器所需的练习时间。同时,优秀的中华传统乐器教师人数较少,目前文莱中华中学仅有一位退休的教师能够定时到学校授课且能够教授的乐器种类相对受限。

3.家庭成员对文莱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情况。在家庭调查部分,笔者以问卷形式对被访者的双亲进行了身份背调。在“文莱华裔新生代的国家与身份认同情况”部分,选项设置为“文莱”“马来西亚”“中国人”“文莱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受访者只能选择一项。将数据通过 EXCEL 建立数据库,通过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获得华裔新生代父亲和母亲身份认同情况结果如表 2 和表 3。在此基础上,根据父亲与母亲身份认同情况对华裔新生代交流中最擅长的语言、阅读中最擅长的语言、是否喜欢华文和参加华文补习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结果如表 4、表 5、图 3、图 4、表 6、表 7、图 5 和图 6 所示。

表 2 调查对象的父亲身份认同情况

	频数	占比
文莱	6	7.4%
马来西亚	11	13.6%
中国人	2	2.4%
文莱华人	16	19.8%
马来西亚华人	38	46.9%
其他	8	9.9%
总计	81	100%

表 3 调查对象的母亲身份认同情况

	频数	占比
文莱	7	8.7%
马来西亚	14	17.3%
中国人	3	3.7%
文莱华人	9	11.1%
马来西亚华人	35	43.2%
其他	13	16%
总计	81	100%

81 个样本中,45 位被访者的父母都为华人,占比 55.6%。还有一部分华裔新生代的父母中只有一方为华人,另一方可能为马来西亚人、文莱人、中国人或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人。这就意味着文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社会中存在文化交融,新生代可以在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或世界其他地区 and 民族文化

之间选择自己的身份认同。但是,文莱华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融合程度相对较低,华裔新生代还是以华人血统为主。在文莱中华中学的华裔新生代不仅在学校接受中华文化相关的教育,在家庭中也可以很好地习得华人社会的传统和习俗。

表 4 父亲身份认同与华裔新生代在交流中最擅长语言的交叉列表

		您在交流中最擅长的语言			
		英语	马来语	普通话(华语)	其他
父亲身份	文莱	3	1	2	0
	马来西亚	5	0	6	0
	中国	0	0	1	1
	文莱华人	7	0	9	0
	马来西亚华人	12	0	24	2
	其他	3	0	4	1
总计		30	1	46	4

表 5 父亲身份认同与华裔新生代在阅读中最擅长语言的交叉列表

		您在阅读中最擅长的语言			
		英语	马来语	华文	其他
父亲身份	文莱	3	1	2	0
	马来西亚	7	0	4	0
	中国	1	0	1	0
	文莱华人	9	0	6	1
	马来西亚华人	18	0	18	2
	其他	6	2	0	0
总计		44	3	3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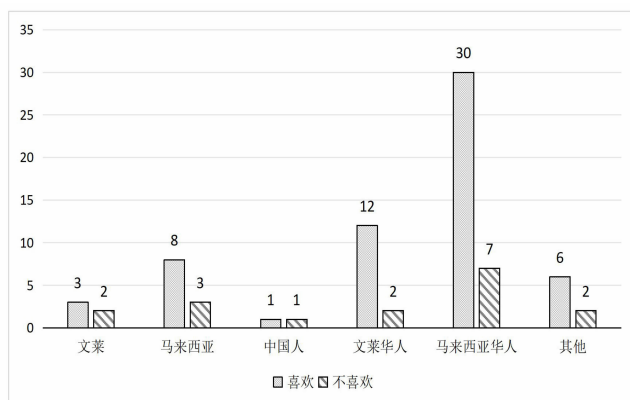


图 3 父亲身份认同对华裔新生代是否喜欢华文的影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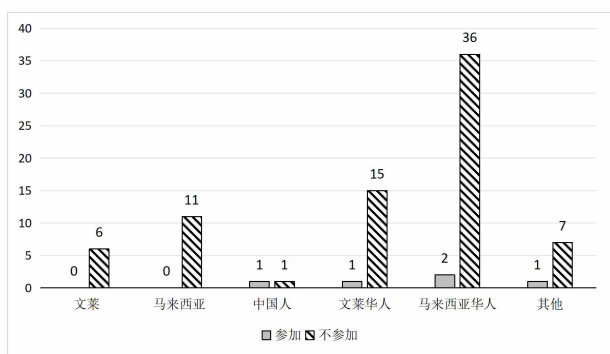


图4 父亲身份认同对华裔新生代参加华文补习的影响情况

父亲身份认同对华裔新生代在交流、阅读时所擅长的语言、是否喜欢华文课程和是否参加华文补习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详见表4、表5、图3、图4。除去选择父亲为“中国人”的研究结果,“父亲的身份认同”和“在交流中最擅长的语言”交叉结果显示,父亲身份选择“马来西亚华人”的华裔新生代擅长普通话(华语)的人数最多,达到24人,占选择普通话总人数的52.2%,比父亲同为“马来西亚华人”“交流中最擅长的语言”交叉选择第二多的“英语”高出了二倍。其次为选择父亲身份是“文莱华人”的华裔新生代,人数为9,占选择普通话人数的20%。选择父亲身份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华裔新生代在“阅读中最擅长语言”交叉选择“英语”和“华文”选项的人数持平,都为18人,选择“英语”选项的人占同选项总人数的41%,选择“华文”选项的人占同选项总人数的58%。“父亲身份认同”对华裔新生代喜爱华文的程度也有很深的影响。在选择父亲为“马来西亚华人”身份中,有81%的华裔新生代喜欢华文。在选择父亲为“文莱华人”身份中,有85.7%的华裔新生代喜欢

表6 母亲身份认同与华裔新生代在交流中最擅长语言的交叉列表

		您在交流中最擅长的语言			
		英语	马来语	普通话(华语)	其他
母亲身份	文莱	4	1	1	1
	马来西亚	7	0	7	0
	中国	2	0	0	1
	文莱华人	4	0	5	0
	马来西亚华人	7	0	27	1
	其他	6	0	6	1
总计		30	1	46	4

华文。在选择父亲身份为“马来西亚华人”的家庭中,华裔新生代华文补习人数占总人数的5.3%。在选择父亲身份为“文莱华人”的家庭中,华裔新生代华文补习占总人数的6.3%。

表7 母亲身份认同与华裔新生代在阅读中最擅长语言的交叉列表

		您在阅读中最擅长的语言			
		英语	马来语	华文	其他
母亲身份	文莱	5	1	1	0
	马来西亚	8	1	5	0
	中国	3	0	0	0
	文莱华人	7	0	2	0
	马来西亚华人	13	0	21	1
	其他	8	1	2	2
总计		44	3	3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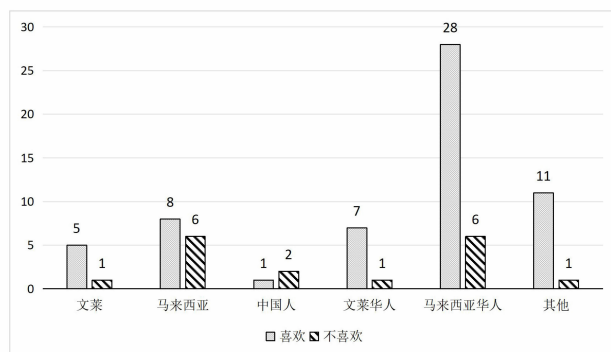


图5 母亲身份认同对华裔新生代是否喜欢华文的影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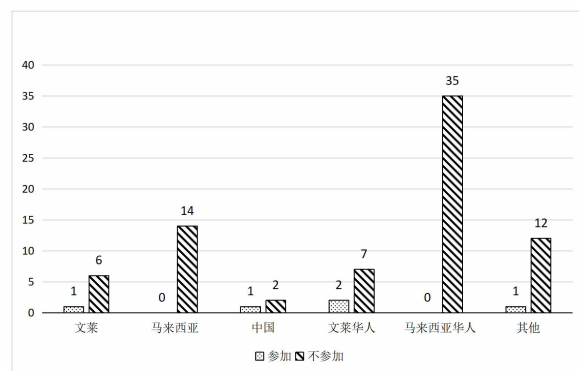


图6 母亲身份认同对华裔新生代参加华文补习的影响情况

在问卷中,选择母亲身份为“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西亚”的文莱华裔新生代在交流中选择擅长普通话的人数分别高于选择母亲身份为“文莱华人”和“文莱人”的人数。选择母亲身份为“中国人”的学生全部认为自己无论在交流还是阅读中最擅长的是英

语,而不是普通话。无论父母身份如何,学生阅读所使用的语言程度较好的都为英语。在语言运用等方面,父母为华人的华裔新生代对华文掌握程度要高于英语或与英语水平持平。整体来看,虽然马来语是文莱的官方语言,但大多数华裔新生代无论在交流还是阅读方面运用马来语的能力相对较弱。华裔新生代中喜欢华文且运用水平较高的,也不会对华文进行额外的补习。

从“父母身份认同选择”与“华裔新生代传承中华文化类别程度”得出的分析数据来看,父母是影响华裔新生代语言使用的最主要因素。当他们语言水平较高后,自然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在行为与精神层面的文化继承中,学生主要是通过学校布置与家长共同完成的作业来展现学习成果,如制作灯笼、风筝等。但是家庭对于传统节日的态度和中华文化礼仪的重视对于新生代的影响较强。如他们在家庭的生活中对农历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等传统的节日文化和习俗都有所传承。有 58.2% 的被访者可以认识到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并对中华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将其认定为是华人的标志。3.8% 的被访者认为华人文化与当地文化并没有不同,36.7% 的被访者选择不清楚这些文化的不同之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文莱华人灵活掌握了文莱政策和文化中的规律,并将中华文化与当地政治制度融合得较好,为华裔新生代创造了一个安全、多元的文化环境。

4. 文莱华裔新生代对华文的使用及认同情况。被访者的家庭中,51 个家庭使用多种语种,30 个家庭单纯使用华文进行沟通。文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国语为马来语,通用语言为英语。华人社会中根据华人不同的祖籍背景,存在闽南话、潮汕话、海南话等多种方言。单纯使用华文沟通的家庭占比达 37%, 在日常的生活和家庭教育中主要以中华文化为主。据调查,在家中使用英语的华裔新生代人数占比为 54.4%, 使用马来语的人数占比为 14%, 使用华文(包含方言)的人数占比高达 81%。在家里会使用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海南话和其他语言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20.3%、1.3%、8.9%、1.3% 和 14%。方言

使用与家庭背景联系最为紧密。

文莱华裔新生代对于华文语言掌握与其家庭成员身份认同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文莱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身份认同的华裔新生代对华文的喜欢程度较高。文莱华文学校为华裔新生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华文学习环境和展示华人文化的平台。然而,英语作为应试语言,对华裔新生代的华文学习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整体来看,文莱华文学校学生的华文水平从增设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开始逐渐下滑,英语水平明显提高。这对华裔新生代再移民欧洲、澳洲等国家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在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方面增添了一定的阻碍。

四、总结与思考

文莱华文学校在教学中融入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为学生提供了解与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在塑造华裔新生代文化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家庭在华裔新生代语言使用和风俗习惯方面影响较大,家长选择让孩子就读华文学校,更多是考虑到新生代未来的发展和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华人社会对于新生代学习中华文化的支持,主要从传承文化、培养接班人和为社会培养人才、造福华人社会等角度出发。华裔新生代对于中华文化的学习,多从实现自身价值收益和社会认可价值的角度进行审视与选择。部分华裔新生代在面临全球化挑战和多元文化交融时,会在身份认同等方面产生困惑,但这些并不会限制他们自身的发展。相反,更多的华裔新生代愿意积极主动地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显示出他们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结。

综上,中国可以从调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角度出发,鼓励国内相关单位加强与文莱华文学校的合作交流,积极邀请华文学校董事、校长、教师和家长与学生定期到中国研学和参加活动,吸引更多优秀的华裔新生代到中国学习和生活,增强华裔新生代对中国的亲近感。鼓励国内教师到文莱华文学校任职任教,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正确传播和阐释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

[参考文献]

- [1]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等.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文莱(2023年版)[M].[出版单位不详],2024:8.
- [2]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知,2022(8).
- [3]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 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 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4-06-07(1).
- [4]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求是,2024(22).
-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6]夏雪.华文夏令营对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及思考[J].当代青年研究,2020(2).
- [7]李雯.文化认同视阈下的海外统战工作[J].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3).

- [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M].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513-520.
-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75.
- [10][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89-92.
- [11]D. S. Ranjit Singh, Brunei, 1839-1983: The Problems of Political Survival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95.
-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祝远娟

(上接第90页)

[参考文献]

- [1]杨磊,李锦鑫.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进程、特色范式、实践路径[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
- [2]陈贻泽.刘宁深入玉林市调研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推进“一区两地”建设[N].广西日报,2024-03-31(1).
- [3]巴玉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的法治保障——基于《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7).
- [4]冯丽,李玉静.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创新与推进路径——“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23(27).
- [5]赵春辉,费艳颖.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WOT分析及对策探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2).
- [6]刘绍卫,徐家贵.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J].当代广西,2024(1).

- [7]申富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N].光明日报,2018-11-26(6).
- [8]马静,程凡,刘金林.边境民族地区推普对农户多维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实证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十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
- [9]孙苓,孙天罡,金明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研究[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23:16.
- [1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责任编辑:潘宏纹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三维探析

姜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

摘 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国和越南两国凭借深厚的历史渊源、共同的思想基础、相邻的地理位置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实现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深入交流合作,并达成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中国和越南两国深化互信合作,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对中越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越命运共同体;独特优势;重要意义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5.015

[中图分类号]D822.3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107-0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2023 年 12 月,习近平访问越南之际,“双方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1]。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对中越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之维: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优势

中国和越南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相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和共同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山水相连的地理位置等,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历史因素:中越友好的历史根基

中越友好是历史的传承。中越两国都经历了被压迫被剥削并奋起反抗从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过程。

20 世纪上半叶,中越两国互相支持、共同奋斗,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为中越建交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一方面,中越两国的革命家联系密切。孙中山曾在越南进行革命活动;胡志明曾在广州成立越南共产党的前身“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于香港成立越南共产党,随后在中国华南、西南及中越边境开展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中越两国互为战斗伙伴。“在越南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1 400 多名中国将士英勇牺牲,长眠在越南的广袤土地上。广西桂林南溪山

收稿日期:2024-07-16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024XYZD17)。

作者简介:姜敏,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医院救助了5000多名受伤的越南战士,育才学校为越南培养了1万多名学生”;越南“洪水将军投身广州起义,参加中国红军长征,是赫赫有名的‘两国将军’”^[2]。1950年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相互帮助,“同志加兄弟”是中越关系的生动诠释。

20世纪下半叶,中越两国以战略眼光共谋发展,携手迈向新世纪。本着共同的奋斗目标,1991年11月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中越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就两党两国关系深入交流、互惠互利,达成许多重要共识。比如1999年2月,中越两党总书记确定了21世纪两国“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十六字指导方针,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定了总体框架。2008年5月,中越两国确定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中越两国多次发表并签署了意义重大的联合声明、合作协定等文件,为中越友好交往打下坚实基础。

(二)思想基础:中越两党的指导思想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来源

“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本国化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3]这就决定了两党具有相同的理想追求,这也是中越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强大动力。

志同道合,共赴未来。毛泽东、胡志明等中越两党领导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结缘,他们都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解放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将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进行本土化发展并用于指导革命建设实践且取得成功。正如胡志明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伟大的十月革命斗争经验的火炬照亮了越南革命的道路。”^[4]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两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中越两国都赢得了革命胜利,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越南而言,胡志明思想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与越南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越南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对于越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新的重要作用。例如,2006年越共十大上总结了革新的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在革新过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5];2021年越共十三大在总结革新事业实践以来的珍贵经验和教训时强调,“坚持、运用和不断发展创造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并把“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作为新阶段应当贯彻的第一条基本指导思想^[6]。就中国而言,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才得以顺利推进。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7]

(三)地缘优势:山水相连的地理位置

山水相连是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地缘优势。中越以北仑河、红河、归春河等河流相连,以法卡山、者阴山、老山、扣林山等山脉连接,有多个省市接壤。此外,中越两国还有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板约)瀑布,由中国侧著名的德天大瀑布和越南侧的板约瀑布共同组成,这是中越两国共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可见,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省市相接,为中越两国人民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提供了天然优势。

人文相亲是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人文优势。得益于山水相连的地缘优势,中越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在风俗习惯、节日文化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中国的壮族和越南的岱依族、依族等,都把春节、灶君节等作为重要节日,且过节的风俗习惯也颇为相似。比如,春节时都注重年夜饭并举办迎新火、迎新水活动,通过整夜燃烧的火把和取新年头一担水等方式,祈求来年红火、吉祥、纯净;都把灶神当作掌管家庭烟火的神灵,通过祭灶以祈求平安顺遂等。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所写:“从依人的自称以及他们的家谱和传说中,表明其祖先原居中国境内,与中国壮族中的依人支系同

源,与岱依人族源亦近。”^[8]这些相似和共同的文化资源是中越人民民心相通的重要体现,更是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独有的人文优势。

习近平强调,中越要秉承“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推动中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9]。“四好”精神中的“好邻居”是对千百年来山水相连、血脉相亲的中越关系的形象诠释。因此,我们要充分把握山水相连的地理优势,将中越两国的地缘优势转变为中越友好的外交优势。

二、现实之维: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是两国密切交往的必然结果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越关系持续向好,政治互信增强、经贸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密切,为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一)政治互信增强:中越高层交流频繁

自2015年以来,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实现三轮互访,就各领域、多方面开展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两国友好合作的实质性效果。2015年和2017年中越两国最高领导人分别完成前两轮互访,就推动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和《中越联合公报》。2022年和2023年中越两国最高领导人完成第三轮互访。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第一时间邀请越南总书记阮富仲访华,而阮富仲同样将中国作为其再次当选越党中央总书记后的首个出访国,这充分显示了双方都把中越关系放在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彰显了中越“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感情。阮富仲在第三次访华时指出:“以越共十三大和中共二十大为标志,越中双方关系已进入关键性的新阶段,越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越中睦邻友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升到新高度。”^[10]2023年12月底,习近平应邀访问越南,双方宣布中越关系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中越关系迈上新台阶^[11]。此外,中越高层间交流频繁,常以互访、互电等形式就两党治

党治国经验及扩大务实合作开展深入交流。在中越交流中,两党两国签署的合作文件涉及共建“一带一路”、部门交流、铁路合作、安全合作、绿色发展等多方面,体现了中越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越高层就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展开频繁交流,如双边互访、互派特使、热线电话、互致信函、年度会晤、多边场合会见等,内容涵盖如何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如何保持党长期执政、如何应对国际危机、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等两党两国关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彰显了中越两党两国政治互信日益增强。

(二)经贸合作加强:中越互联互通程度加深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越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贸易及投资合作成效显著,且保持强劲势头。一方面,联通中越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覆盖面更广的交通网络提高了中越互联互通的效率。一是建设中越智慧口岸。已开工并计划于2024年建成投入运营的友谊口岸将推进中越通关能力迈上新高度,这是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越交流的重要体现;二是开通多列中越班列。截至2023年11月30日,中越班列累计开行1073列,共运送进出口货物59.45万吨^[12];三是建设河内轻轨2号线,有效降低出行的时间成本,成为撬动经济的重要杠杆。另一方面,多领域展开合作,不断增进中越跨境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中国连续多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出口市场,“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突破2000亿美元”^[13]。此外,还开展了中越光伏产业合作、垃圾发电项目合作、跨境旅游合作、友好交流活动等,建立中国越南(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等项目,推进中越双方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三)文化交流互鉴增强:中越友好交流活动开展有声有色

中越友好建交,密切了中越两国人民的交往,使

得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互鉴日益增强,尤其体现在旅游、影视、音乐、教育等方面。第一,两国人员往来密切。2023年1—9月,赴越中国游客数量超过100万人次^[13]。旅游业的强劲发展是增进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也是密切中越关系的重要途径。第二,中越经典著作互译互通。中越双方签署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2023年至2028年间,将共同翻译出版30种两国经典著作,以经典承载文化,推动两国文化深入交流互鉴^[14]。第三,中越影视、音乐等交流密切。2018年起,《红楼梦》《故宫》《美丽乡村》等中国优秀作品被译成越南语并在广西广播电视台与越南数字电视台联合开办的《中国剧场》栏目播出。此外,还开设栏目《联通中越》,以展现中越交流合作的友好面貌。音乐作品是连接中越民众的精神纽带,不少越南年轻人喜爱中国的流行音乐。同样,越南流行歌曲也在中国迅速走红。以影视、音乐交流为载体,中越文化交流日益增强。第四,青年作为活跃群体是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承担着中越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责任。教育合作是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方式,越南来华学习人员较多,2021—2022学年就有2.7万名越南学生在学习^[15]。尤为重要的是,来华学习的越南留学生学成后归国的人数在越南出国留学学生中占比最高,这彰显了中越教育友好合作的显著成效。

三、未来之维: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对中越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乃至全人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越关系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就中越两国而言,有利于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就世界社会主义而言,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全人类而言,有利于增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增强世界人民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

(一)开启中越两国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越关系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的鲜活印证,对开启中越两国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具有重要影响。

中越两国最高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为两国携手迈向现代化开启新篇章。2015年11月,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与阮富仲会谈时首次提出:“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15]2017年习近平对此再次作出强调。2017年11月,阮富仲表示,越方“欢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16]。2023年12月,习近平在访越时指出,要“扎实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就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提出六点意见,涉及政治、安全、务实合作、民意基础、国际地区问题和涉海问题等多方面;对此,阮富仲指出,“越方愿同中方一道,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双方都认为,“作为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好同志,中越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优势”^[17];双方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综上,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国和越南两国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开启两国携手迈向现代化新篇章的重要举措。

(二)助力维护地区和平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地缘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和平来之不易,需要全世界共同维护。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秉持历史惯性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打压制裁,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2023年12月,习近平在同阮富仲会谈时就中越涉海问题提出“要管控分歧”,“双方要积极探讨并开展更多海上合作项目,努力推进海上共同开发,把海上问题带来的挑战转化为双方深化合作的机遇”^[18]。中越两国秉持“同志+兄弟”的关系定位,在经贸、文化、科技、教育和军事等多领域多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既维

护了地区和平,又促进了两国发展。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越两国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好。中越两国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各自走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定位显示了两国双边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就国家发展而言,扩大双边经贸合作,必然会壮大两国经济实力;就国家安全而言,经济强大是国家安全的强心针;就世界社会主义而言,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从两大阵营对比而言,中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增强抵御资本主义国家遏制打压社会主义国家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底气和信心。归根结底,中越两国友好合作,将助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三)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识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传承人类文明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7]。学界对此作出系列阐释,形成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如严书翰指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科学理论^[18]。习近平审视过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指出了解决人类发展难题的方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指出:我们从对和平的殷切渴望中走来,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带领人民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奋勇前行;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变局,人类安危与共、命运与共,我们要携手同行,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共赢共享^[19]。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增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增强世界共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越关系持续向好,两国秉持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外交宗旨,在经贸、政治、安全、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深入交流合作,并取得显著成效。正如2023年12月习近平在越

南《人民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所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从亚洲做起”,以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为契机^[20]。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性的现实证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及其显著成效,有利于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识,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共同的信仰和理想追求、山水相连的地理位置等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越两国互惠互利,取得友好交往的实质性效果。两国应继续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维护地区和平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提出以“五个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21]。我们要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国家间一般差异、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各国在实践中的正确抉择和必然选择^[24]。我们要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将“五个坚持”落实于行动,以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为范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23-12-13(1).
- [2]习近平.赓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12-14(2).
- [3]潘金城.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历史经验与实践动力[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7).

- [4]胡志明.胡志明选集(中文版):第3卷[M].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1963:246.
- [5][越]农德孟.越共十大报告[J].共产杂志,2006(9).
- [6]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在越南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报告[J].覃翊,译.南洋资料译丛,2021(1).
-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
- [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民族》编辑委员会,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353.
- [9]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通电话[N].人民日报,2015-02-12(1).
- [10]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22-11-01(1).
- [11]中越班列开行六周年累计突破1000列[EB/OL].(2023-12-01)[2024-06-25].<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3/12-01/10121115.shtml>.
- [12]张志文,刘刚.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N].人民日报,2023-12-10(1).
-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越南大使熊波就中越关系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接受越媒体联合采访[EB/OL].(2023-10-15)[2024-06-25].http://vn.china-embassy.gov.cn/sgxw/202310/t20231017_11162551.htm.
- [14]中越签署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备[N].人民日报,2023-12-19(3).
- [15]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谈[N].人民日报,2015-11-06(1).
- [16]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17-11-13(1).
- [17]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7.
- [18]严书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意义和理论价值——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J].理论与现代化,2022(5).
- [19]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61-562.
- [20]习近平在越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12-12(1).
- [21]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4-30.

责任编辑:许立坤